

獄中十年



7

譯文叢書

薇娜·妃格念爾著

巴金譯

獄中二十年

回憶錄之二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第五版 印數1—2500册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印刷者
永立印刷所

譯文叢書

獄中二十年

薇娜·妃格念爾著
巴 金 譯

自序

「今日得過且過，勿慮明日。」新的時代需要着新的歌曲，而我的書却是一首已經過去了、完結了、而且永不會回來的時代的歌。

不過，我的書雖然只講到過去的事，對目前的實際生活並沒有絲毫的貢獻，但將來有一天它會有用處的。死了的人不會活起來，可是他們會復活在書裏面。西爾維約·柏立科的我的監獄生活●或德·各斯忒爾的奧伊倫司皮格爾◎在我們看來都是活着的，不管

● Silvio Pellico (1789—1854) 意大利的著作家。他的獄中記原名 *Le mie Prigioni* (1832)。

◎ Charles de Coster (1827—1879) 比利時著作家。奧伊倫司皮格爾原名 *La légende de Thyl*

Ulenspiegel et de Lamme Goedzak (1868) *Eulenspiegel* 是十六世紀一個歌謠家名字。

柏立科的書寫於一八三二年，各斯忒爾在他的書中描寫的是十六世紀的事情。

『寫吧，』那個偉大的悲劇演員愛勒翁諾拉·杜色^②跟我在國外會見的時候，她勸我道，『寫吧。你應當寫；你的經驗不應當白白地失去。』

那麼我就把我在『生命的鐘停了的時候』^③的那一段經驗寫出來，不讓它白白地失去，我希望對那班要在生命的鐘不停地擺動（這鐘的指針是永遠向着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的方向移動的，目的在給俄國給全人類爭取幸福）的情形下面生活的人它會有一點用處^④。

薇娜·妃格念爾。

② Eleonora Duse (1859—1924) 意大利女伶。

③ 妃格念爾的獄中記（即回憶錄的第二卷）一名『生命的鐘停了的時候』。

④ 這是『獄中記』第二卷的『自序』篇末未註明日期，大約是在第一次歐戰前寫的。第一卷和第三卷都另有作者的自序。

目 錄

自序	一
第一天	一
最初的幾年	一五
密拉科夫和麥秀根的死	二五
我找到一個朋友	三一
懲戒室	四七
紙	五九
格拉切夫斯基	六五
同盟絕食	七七

母親的祝禱.....	九三
司令官.....	一〇三
帕奇托諾夫.....	一〇八
別.....	一一四
「沙托夸」.....	一三七
通信.....	一四八
潘克拉托夫和帕立瓦諾夫.....	一五七
工場與花園.....	一六三
鐵絲網.....	一七〇
視察.....	一七四
書籍和雜誌.....	一八一
我們的本哲明.....	一九〇
十八年後.....	一九九
月章.....	二〇六

死的威脅·····	二一七
絞刑·····	二二六
違約·····	二三一
生活的恐懼·····	二三六
母親·····	二四二
前夜·····	二四七
信件的焚燬·····	二五二
「帕龍德拉」·····	二五五
第一次重逢·····	二六五
後記·····	二六九

第一天

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早晨，彼得保羅要塞的監房裏還很陰暗，我的房門突然打開了，一個「保證」看守走進裏面來。這所謂「保證」看守就是指那班退伍的兵士，他們跟憲兵們一塊兒負責管理彼得保羅要塞中的囚人。他是一個最兇惡的禁子，一隻灰色的老鼠，他厭煩他的工作，他的職務和他的責任，而且連他像一隻猛犬似地多年來看守着的那些囚人他如今也討厭起來了。生活顯然並沒有給過他什麼好處；現在他又老，又病，境遇又壞，因此無論遇着誰，只要他能夠，他就會對他或她發洩他對命運的牢騷。

我們剛剛見面，他就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我還記得，我被帶進彼得保羅要塞來的時候，剛進了我的監房，他把房門一關，馬上就動氣地咕嚕道：「這兒不許唱歌！」我吃了一

● Condarmes 通常譯作監兵，但這裏應該是一種政治警察。他們的職務與中國的監兵不同。

驚；我從沒有想到唱歌的事情。我便說：「唱歌？誰還有心腸來想到歌？」不錯，我走進了這要塞的牆垣內，我的靈魂裏不是充滿着嚴肅的情緒和嚴重的思想嗎？在這種時候，唱歌的舉動簡直是把這一塊被許多代人的受苦所聖化了的的地方褻瀆了！

如今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他趁我還在睡眠的時候闖進了我的監房，暴躁地把一雙腫腫的靴放在地上，又擲了一件沒有襯裏的羊皮短襖到我的床上來，一面生氣地叱道：「起來！快點多穿一點衣服！」

「什麼事情？」我問道。「他們要把我怎樣處置？」

自從我被捕以後我就覺得我不再屬於我自己了。我也不再問我自己我要去做什麼事情；我只問他們要把我怎樣處置的。確，失掉一個人的自由就等於失掉他自己的身體的主權。

「他們要把我怎樣處置？究竟怎樣？」我一面匆忙地打扮，一面這樣想道。我的裝束是很簡單的：裹腿用的破布；一雙農人的鞋子；一件又髒又舊，而且蟲蛀過的，軍服布做的襯衫；一件滿是汗漬的囚衣；一塊包頭用的白布帕子。我十天來就沒有肥皂了；他們還不許囚人使用梳子，牙粉和牙刷。

在這時候我就完全想着：「他們要把我怎樣處置？也許他們要把我帶去處死罷？」但是我還記得僅僅在三天以前他們告訴我減刑的事情，那個老典獄莊嚴地宣告說：「終身懲役罪。」我的頭腦昏亂了。我過了整整兩年的獨居禁錮的生活，如今在我的眼裏現實也變成模糊的了；可能的事情和不可能的事情奇怪地顛倒過來，而不可能的事情却彷彿變成可能的了。

「好罷，說不定他們到底會把我處死的？再不然他們並不把我處死，他們只殺我的同志們，不過把我放在他們身邊讓我去目擊，身歷他們的經驗。真的，爲什麼不呢？朶思托也夫斯基和別的人，不是都遇過這樣的事情嗎？爲什麼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一次？但是那麼爲什麼那個「保證」看守又說：「多穿一點衣服」呢？顯然他們要把我帶到別的地方去，帶到什麼遠的寒冷的地方去。但是那麼到什麼地方去呢？是一個中間豎立着校刑架四圍擠滿了人的寬大的廣場去嗎？還是到西伯利亞去？難道他們會把我放在一輛雪橇上面，由兩個憲兵押着，駛到加拉的礦山去，（在那裏我還會遇見別的比我先到的女放流人）」

雖然是在秋天，而且直到昨天地上還沒有見雪，但那藍靴和羊皮短襖却固執似地在我的心裏繪出了一塊遍地積雪的平原，一部雪橇和一輛三頭馬車。

憲兵們押着我經過走廊，下了樓梯走進衛舍前面的一間屋子。典獄穿着制服站在寫字檯前面，還有一個穿便衣的矮胖子站在窗子旁邊，他的背向着我。

「你的手！」典獄說。

我惶惑的伸出了我的手。那個穿着深色便衣的男子立刻掉過身子來，他把我的手顫小心地捏了一會，好像一個醫生給人摸脈一般。「這是什麼意思？」我問道。「這也許是副醫官。他在這裏幹什麼？爲什麼要驗我的脈搏？難道前面有什麼事情會使我暈倒嗎？」一個陰暗的思想掠過我的頭腦。我覺得我的心在我的胸膛裏跳得愈過愈慢了。我把我的全付力量聚集起來。

同時那個我所假定的醫官又向着窗子轉過身去，依舊把背朝着我。典獄又說道：「你的手！」

於是那個深色衣服的東西又掉過身子來正對着我，他手裏捏了一付手銬。我剛纔起的對於未知事情的恐懼現在却讓步給對於現實情形的憤怒了。不能抑制的狂怒抓住了我。「什麼！我還是一個自由的人！他們却要給我上一付手銬，那奴隸的記號！他們想用這手銬來束縛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血液完全停止流動了，我因了憤怒而戰抖着，一面不

住地頓腳；當他們給我上手鐐的時候我狂暴地對典獄說：

「告訴我的母親！告訴她不管他們怎樣處置我，我一點也不會改變！」

「好好，」典獄差不多駭壞了，他喃喃地說。

「告訴她不要傷心。我只要有書讀，我只要時時得到一點她的消息，這就是我所要的東西。」

「好，我會把什麼話都告訴她，」典獄惶亂地喃喃說。

我們走過在衛舍裏立正站着的兩排兵士中間，進了一個小小的天井。在那分隔堡壘廣場與除伯次奎稜堡的大鐵門外邊停了一輛馬車，有兩個穿着外套的憲兵看守着。我向着馬車走去的時候，我無意地看見了那一個最愉快、最和善的看守。他的身材瘦小，有一張紅銅色的臉，再蓋上一臉的紅鬍子，左邊臉頰上有一條大的傷疤，經過他的左眼一直到太陽角上。他常常溫和地望着我，又對我微笑。他好像在說：「呀，太太！我看見你一天變瘦了，變蒼白了。快不要這樣做！我不騙你，生活裏究竟也有快樂的。」那時候我在孤寂中也感到了一點安慰。

現在他顯然是故意來和我見面的：他的面容嚴肅而憂鬱。我們的眼光遇在一起了，好

像有一塊東西阻塞了我的咽喉。這個和善的朋友那麼憐憫地望着我。「呵，薇娜，不要哭，不要想到哭！在這種時候還淌眼淚真是太可恥了。」我不停地暗暗在和自己爭辯。但我又是多麼地感動，多麼地感動。我把他的眼光帶進我的活葬墓去，在那裏牠會給我一點安慰：這一個心地單純的俄國人，一個小兵，他守護着我——他的靈魂是和我在一起的，他同情我，他憐憫我。他是最後一個而且唯一的帶着友情送我到我的暗夜似的新生活去的人。

「他們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坐在馬車裏面的時候，我向典獄問道。

「我不知道，」他這樣回答。

出了彼得保羅要塞，馬車便向右轉彎，沿着涅瓦河岸邊駛去。幾分鐘就像幾點鐘似地長久。馬車終於停住了，我們走了出來，我看見前面有一塊小的跳板和一隻輪船，船上連一個人也看不見。憲兵們捉住我，差不多是把我抬到甲板上去了的。過後他們又把我帶進艙裏去，那房間的窗戶都是很小心地用窗帷遮掩了的。輪船開動了，牠繼續駛行着。

兩三點鐘以後一個軍官跑來問我是不是要吃一點東西。

「不！」

他又跑了來。這一次他問我要不要喝茶。

我堅決地答道：「不。」

我盼望他不要走近我。我盼望他不要問什麼話。我願意靜一下子。我應該靜一下子。我過了二十個月的完全孤獨的生活，每兩個星期只能夠在和母妹會面的二十分鐘裏講一次話，因此我的可憐的聲音就大大地改變了；牠變成了這麼細，這麼無力。牠有一種背叛的調子，牠完全違背了我的意志。

輪船繼續地前進着，牠把我載往未知的地方去。起初我以為他們也許把我送到一個荒僻的港口，然後搭火車或馬車到別處去。也許是到克宿爾門？我早就聽見人說過芬蘭境內的這個堡壘。再不然就到席呂塞爾堡去？我在彼得保羅要塞裏曾從什麼書報上見到一個消息說，席呂塞爾堡內建了一個可以容納四十個人的監獄，是專為民意社的黨員而設的。在審問的時候，我們的一個同志也嚷過：「我們都到席呂塞爾堡去！」

大約過了五個鐘頭，輪船靠了岸。憲兵們忙亂了一會，便帶我到艙面上去。他們捏住我的膀子，做得很敏捷，而且捏得很牢，好像用鐵鉗挾住牠一般。在我的前面現出了石灰石的白塔和白色牆垣。在一個高高的塔尖上有一把金鑰匙在發亮。再沒有疑惑的餘地了——這是席呂塞爾堡。那把鑰匙高高地聳到天空去，好像是一個標記，彷彿在說：一旦進了裏面

以後就決不能夠再走出來了。那隻兩頭的老鷹張開了牠的翅膀覆蓋着席呂塞爾堡的入口，在老鷹上面有一個被風雨剝蝕了的標識，寫着「帝國的」字樣。這個字眼裏含着一種報復的，私人的意味，牠把我刺痛了。

一大羣人過來把我押進了大門，我後來纔知道他們都是些軍官，憲兵和兵士。於是我看見了一個完全不會料想到的景象。這個地方帶了點田園的情調。是一個消夏的別墅？是一個農業的區域？是這一類的東西——平靜的而且樸素的。左邊有一座兩層的白色建築，這本來可以做一所膳宿兼備的女學校，現在却真的做了兵營。右邊有幾所孤單的小屋，牆壁刷得很白，形狀又好看，每一家都有一個小花園，兩家中間就隔着一塊寬廣的草地，上面種了好些樹木。樹葉已經落了，但是在夏天這周圍全是一片綠色，那時候會是多麼地美！在盡頭處還有一所白色的禮拜堂帶了一個金色十字架高聳着。這使人感到和平與安靜；這使人想起了自己的家鄉。

這羣人不停地向前走，不久我就看見一所紅磚建造的兩層的樓房，窗戶是深黑色的，屋頂上還有兩個高的烟囱——這是一所典型的工廠。這樓房前面紅磚砌的牆上開着兩扇紅色油漆的鐵門，他們押着我走了進去，把我帶上一條門廊，這門廊看起來倒還可愛。

我們又穿過一條走廊，後來進了一間頗寬大的拱形房頂的屋子，那就是辦公室。角落裏還放着一個浴盆。

「你的手！」典獄說。

我把手伸出去。他略為驚擾了一下，就打開了手鐐，把牠取了下來。所有的人都走開了，只剩下一個穿着軍醫制服的年青人和一個中年女人，這女人是突然出現的。從她的相貌和舉止看來，她和一個不正當地方的當家人完全相像。

於是醫生在桌子旁邊坐下，把背朝着我，那個女人便動手脫我的衣服。

幾分鐘以後我站在那裏，光赤着身子。

我覺得痛苦嗎？不。

我覺得羞愧嗎？不。

我覺得——完全沒有關係。我的靈魂飛到別的地方去了，再不然牠就躲開，縮成了極小極小的一團。只有我的肉體還留在那裏，牠完全感不到羞愧和道德的痛苦。

醫生站起來，在我周圍走了一轉，把我全身都看過了，在一本簿子上寫了一些話。他便離開了這房間。

他們帶了我到這裏來，要我在這裏住一輩子。我是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地方的。然而他們還以為應該把我全身的衣服剝光，記錄下來我的身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記號。

四年前我的三妹葉夫金尼亞在審判以後也會受過這樣的待遇。我被捕後內務大臣

D·脫爾斯道伯爵來訪問我，我曾經氣憤地把這事情告訴了他。

「那是非法行爲，」他說。「不應該有那種事情。」

然而不管他的話（也許正因為我動了氣的緣故）他們如今却使我也受着同樣的待遇了。我並不抗議，也不叫喊。我並不抓，也不咬。

在我們的幼年我們讀過古羅馬的歷史，知道羅馬皇帝爲了娛樂亂民的緣故把年青的基督教處女帶進了比武場中，然後再放進餓獅去吞噬她們——這讀本怎樣告訴我們呢？

那些女子並不叫喊，也不抵抗。

然而我也有我的上帝，我的宗教：自由，平等，博愛之宗教。爲了這教義的光榮，我也必須忍受一切。

那個女人要我洗澡，這也是非做不可的，也許這樣一來他們就更清楚我是否還藏了

東西在身邊。我洗過澡，她就走了。別的人來把我帶上樓去。

這監獄的兩層房屋是用一個繩網和一條窄狹的走道隔開的，這走道像一個露台似的沿着上層的一排監房伸出去。由於這種布置我們便能夠一下子就看清楚了全個監獄的內部，這四十個監房的鐵門全都看見。

繩網的中央有一條通到二十六號監房去的窄橋，這樣把繩網分開了。「嘆息橋」當我被帶着走過這橋的時候，我不覺這樣想道。我記起了古威尼斯共和國行政官的宮殿，在那裏有着一道這樣名字的橋，這是威尼斯的反叛者從監房走到斷頭台時所必經的路。我每天都走過這席呂塞爾堡的嘆息橋，我要走許多，許多年。我就關在這二十六號監房。房門猛然地關住了，我沒有氣力，一下子就倒在床上。

一個新生活開始了。這是一個在死一般的靜寂中間的生活，這種靜寂，你常常去傾聽牠，而且也聽得見；這種靜寂，它漸漸地制服着你，包圍着你，鑽進你身體的每個毛孔，鑽進你的理性，鑽進你的靈魂。它那種啞啞是多麼可怖，它那種沈默和那偶然的爆發作聲又是多麼可驚。漸漸地有一種感覺從牠那裏悄悄地到了你腦中，你覺得有什麼神祕的事情逼近

目前了；一切都變成不尋常的，曖昧的，彷彿是在一個月夜裏，在孤寂的時候，在一個靜寂的樹林的濃蔭裏一般。一切都是神祕的，不可理解的。在這種靜寂中真實變成模糊與虛幻，想像反而像是真實的東西了。一切都是糾纏在一起，混淆不清。那冗長的，灰色的，單調的日子就像是一個無夢的睡眠，它那種閒懶生活使人夠厭倦了；在夜裏你却有着那樣的光明燦爛的好夢，使你幾乎疑心這不會只是你的想像的結果了。

而且那些聲音！那些可詛咒的聲音，牠們突然地，使你料想不到地打岔你，驚嚇你，然後消失了。在什麼地方起了一個響亮的嚇嚇聲，好像是一條巨蟒從地板下面爬上來，要把你捲在牠的又冷又滑的身子裏面。然而這只是水在下面的水管裏流動作聲。你會想像着有人禁錮在石壁中間。因為你聽見一聲極細弱的捺住的呻吟，好像有人悶在一堆石頭下面似的。然而不是這樣！這只是一個患肺病的囚人的極微弱的乾咳聲。要是什麼地方起了一個碟子的響聲或者金屬的床脚碰在地板上的聲音，你的想像就會給你描繪出帶着腳鍊手鐐的囚人來。

那麼在這裏什麼是真實的呢？什麼才是這裏的真正的情形？什麼才是幻想？這是墳墓裏一般的沈寂和甯靜，要是你忽然聽見門口起了一個低微的沙沙聲，那就是看守已經俯

在門洞眼上窺探了你的動作，現在是關上蓋子走了。這好像一個電池的電線從那裏拉了過來。電流挨了一下你的身子，電擊通過你的全身，通到了你的手和腳；好像一些細針刺進你的指尖，你的全個身子經過那一下猛烈的電擊以後還繼續痛苦地，長久地顫動着。牠懼怕着什麼東西，你的心戰慄着，牠不肯靜靜地躺下去。

至於夜間的夢呢！那些瘋狂的夢！你看見逃走，追緝，憲兵，開槍，逮捕。有什麼人被帶去處死刑。羣衆激動而憤怒了；一些紅面孔帶着怨恨而扭歪了。然而你最常夢見的却是拷打。他們在牆上，天花板上，地板上都安置了無數的細管，從那裏面放出熱氣來拷打你。那熱氣燒着，打着，牠是很可怕的，你不能够逃避。監房鎖着，牠是空的，完全空的，牠裏面只有許多股熱的水流。或者你會夢見他們用電刑拷問你。你坐在一把木頭椅子上面，就像衛舍裏面有的那種木頭椅子，你不能够站起來；有一個看不見的禁子在把電流通到你的身上。一次，兩次——你醒過來——你的兩隻膀子搖動着，再不然你的腿部的筋肉因痙攣而集成了一塊像鐵一般堅硬的東西。

只有一個強健的聲音還留在你的靈魂裏面，牠反覆地對你說：

「薇娜，你要勇敢，你要堅定！不要忘記你的同胞，記着他們是怎樣生活着的！不要忘記

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人，記着他們的那種繁重勞苦的工作，他們的那種沒有絲毫快樂的生活；不要忘記屈辱，饑餓，疾病與貧困。

『你要堅定。倘使他們把你的母親給你帶走了，（他們對於一個貪心的殺人犯或一個無恥的引誘婦女的人也不會加這種刑罰的，）你不要哭。不要為鬥爭的失敗而哭，不要為死亡的同志而哭。不要為你的生活裏的那些廢墟而哭。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這神祕的靜寂裏，在這聾啞的石頭後面，你的朋友們還是無形地存在着。在這裏受着壓迫的並不單是你一個人；他們也在受苦。你且想想他們。他們是看不見的，然而他們還是在這裏。你聽不見他們的聲音，然而他們還是在這裏。他們像脫離了軀殼的靈魂一樣守着你，保護着你。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你不是孤獨的，你不是孤獨的！』

最初的幾年

我們被人剝奪了一切：故鄉和人類；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志和我們的家族；這些我們都失掉了。我們和所有的生物完全隔絕。二重窗的不透明的玻璃遮蔽了陽光，要塞的牆壁遮住了遠的天際，遮住了田野和村落。在全個世界中他們所留給我們的就只有一個窄裏的天井；在那寬闊無垠的天空裏就只有我們在那窄小的圈地裏散步時所看見的一小段。在所有的人中就只有憲兵在這裏，對於我們他們就聳得像一些石像，而且他們的面孔沒有一點表情，好像只是一些面具。

生活像水一樣地流過去，沒有印象，也沒有接觸。雖然它的內部的經驗很複雜，但在外表上它却是非常荒蕪，而且非常單純，差不多是透明的，所以牠就像一場無夢的睡眠；而同時在我們的夢裏却有着種種的活動，人物和色彩又時時在變換，這夢景倒反而近似現實。

了。日子是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一月一月地逝去了。它們混雜地隨意堆積在一起，一個疊在一個上面，好像一疊曬在陰天裏的輪廓不清楚的照相底片。

這裏沒有鐘，然而我們却知道外面的看守們什麼時候換班。他們會帶着沈重而整齊的步子在牢裏走一轉，一直走到有守衛在那裏站崗的高牆邊。我的監房原先本是白色的，不久就變成了一隻陰暗的箱子。瀝青的地上塗了一層黑漆，牆壁上半截是灰色，下半截約有一個人高的光景漆成了深鉛色。每個人一旦走進這種從新油漆過的監房，就禁不住對自己說：「這是一口棺材！」

其實監獄的全內部真像一個墳墓。有一次我違犯了獄規，他們把我帶到懲戒室去，那時候我才看見了這監獄的內部，是在夜裏，燃着燈光。牆壁上懸掛着一些小燈，照亮了這建築的上下兩層，這建築只是被一個窄小的露台和繩網分隔着的。這些光亮就像一個教堂墓地上神龜裏點的小小的長明燈。而那四十扇緊閉着的門很像一排直立着的棺材，在那些門後面囚人們正在寂寞中憔悴地度日子。

祕密和不安包圍着我們。人家不許我們見任何人，也不許我們和家屬通信。任何種類的信息或話語都不能達到我們身邊，我們也不可以給誰送出一點信息。我們連任何消息

都不能送出去，也沒有人可以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或者我們過着什麼樣的生活。

「你的女兒進了墳墓裏的時候，你會得到她的消息的，」我的母親向內務部次官阿爾測夫斯基問起我的消息，他就這樣地回答她。

我們的姓名完全被忘却了。他們不稱呼我們的姓，却使用號數來代替我們，好像我們就是書本或者國家所有的東西一般。我們不知道這要塞四周是什麼樣的地方，有什麼樣的景象，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們被關在裏面的這個建築對於我們是一個祕密。我們不能夠在裏面各處閒走，也不能夠把這建築各處觀察一番。住在這裏面的囚人是彼此不認識的，他們住在同一個屋頂下面，却被厚的石牆分隔開了。每件相熟的，慣常的事物，每件親近的，親愛的，容易理解的事物都消滅了；只有陌生的，古怪的，不可理解的留在這裏。而且在我們全體的上面籠罩着一種難堪的靜寂。這並不是使神經休息的活人的靜寂。不，這是死人的靜寂；當一個人在死屍旁邊留了許久，他的心就會被這靜寂抓住的；就是這樣一種可怕的靜寂。我們傾聽着，躺着，準備着什麼事情的到來，等待着……這靜寂會永遠繼續下去嗎？它一定會終止的。結果會發生一件事情。對於什麼可怕的事物的預感咬着我們的心靈。什麼事情會發生，一定會發生……這一定是可怕的，比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經歷過的一切

還要可怕得多。白天會接連地過去，沒有一點變化；黑夜會接連地來，每夜都是一樣。月來了又去；年來了又去了，這是第一年；這一年就只像是一天和一夜晚。

被帶進席呂塞爾堡來的囚人是不會活得長久的。在頭幾年裏面，就死了十五個。密拉科夫與麥秀根因為有反抗的舉動給人槍斃了；克里門科自縊；格拉切夫斯基自焚而死；席切德林和科那穴維奇發了狂。雪巴林一個時候神經失常，不過後來又復原了。在以後的幾年中尤爾科夫斯基死了，帕奇托諾夫發狂而死。在我們入獄的第八年，蘇菲亞·金斯堡又割斷喉管自殺。我們受了多年的單獨禁錮，她連一個月也不能夠忍受。●席呂塞爾堡的囚人甚至在出獄以後也不能夠生活下去。雅諾維奇和馬爾地諾夫，在西伯利亞用手槍打死了自己，帕立瓦諾夫在外國自殺。席呂塞爾堡的經驗使他們的生活力完全乾涸，所有他們的抗拒生活裏的災禍與不幸的能力全都失掉了；他們再沒有餘力來繼續生活。

在這幾年裏我自己的精神也被窒息而破碎了。其實誰又不會被席呂塞爾堡窒息而

● 蘇菲亞·金斯堡用剪刀自殺。據 A·S·拉坡特說，她是「爲了逃避一種每個高貴的女人看作比死

還可怕的命運」而自盡的。

壓碎呢？我們民意社的黨員關進席呂塞爾堡時懷着什麼樣的思想來安慰自己？革命運動被壓止了，牠的組織被破壞了，而執行委員會連最後一個委員也滅亡了。人民和社會並沒有來支持我們。我們是孤獨的。專制政治的活結拉得更緊了，而我們離開人間以後並不會留下後繼人來繼續進行我們的未完結的鬥爭。

然而席呂塞爾堡也給了我一點東西，這是我不會預料到，而且我也沒有準備來領受的。我生活裏最後的快樂就是我的母親；他們把她給我帶走了。使我的生活充實而且值得活下去的人，在全世界就只有她一個；當我墮入在深淵裏面的時候，我能夠依附的人也就是她。快樂在我的心裏死了，但是牠臨死却給我留下了一個銳敏的哀痛。我未進監獄時，我並沒有和母親住在一起，而且我只有偶爾想到她。那時候我的祖國佔有了我的思想；我的革命的活動佔據了我的心靈；我有強烈的依戀和友情；我有無數的同志。現在連人物全都沒有了。我的母親，那個最後的損失，我的最後一個親愛的人的失去變成我的一切大小的損失之象徵了。

我決不後悔我選擇了把我引到這個地方的那條路。那條路是我的意志選擇了的。這沒有後悔的餘地了。我被剝去了錦衣華裳而穿上有標記的粗布的囚服。●我從不

曾有過一次後悔，我不悔恨；我只受苦。我的心裏只充滿着對於母親的思念——只有她的影像，並沒有別的東西，和她分離的事情使我感到了絕大的悲痛。然而我的一切的苦楚，我的一切的悲痛；我的破碎而受傷的精神的悲痛，我的被壓迫受屈辱的身體的悲痛——這些全都被吸收而包含在那悲痛裏面了。這悲痛表現在我的母親的失去這事情上面，它把我的全部損失和一切的缺陷聚在一起鑄成了一種嚴酷的痛苦，而且變成了廣大而難控制的，這好像那一切從不會自由地表白過却始終潛伏在下意識的奧底的感情所經過的變化一樣。我的陰鬱的靈魂瀕於破碎的險境了。

然而當再進一步就會使我淪於不可挽救的境地中的時候，一個內部的聲音却說了：「站住！」說話的並不是我的怕死的恐懼。死是十分值得願望的；死和殉道的觀念是連接的，在我幼小時候基督教的傳統就教導我把殉道視作神聖，後來為被壓迫者的權利的鬥爭的歷史又鞏固了我的這種觀念。阻攔我去走那最後一步的乃是我對於瘋狂的恐懼，我怕瘋狂，我怕個人的墮落，我怕精神的與肉體的崩壞。但是要不走那一步，就須得努力取回一個正常的人生觀，恢復精神的健全。這時候我的朋友們便來給我幫忙。

● 在俄國囚人衣服的背上縫着一個類似紙牌中方塊形的一點(A)的標記。——德譯本註。

我心裏開始現了一線光亮，就像棕櫚主日^①的蠟燭的微光。蒼啞的牆壁開始說起話來：●我能夠和我的朋友們通信了。他們溫柔地講着，還送來了許多友愛的音信，席呂塞爾堡的冰層在他們的友情的溫暖中融化了。別的影響也發生了效力，那是一些峻嚴的話語和教訓。有一次我的鄰人——一個我以前並不知道的男子問起我在做什麼事情。

「我在想我的母親，我在哭，」我答道。

我的鄰人嚴厲地責備我。他問我讀過西門·麥葉的回憶沒有，是不是還記得船上的那一段，當船顛簸得厲害的時候，人們就開始割「巴黎公社革命者」的頭。他把這個西門·麥葉^②千萬「巴黎公社革命者」中的一個拿來給我作一個榜樣。他對我演講了一番。

① 棕櫚主日是耶穌進耶路撒冷的節日，即復活節前的星期日。

② 指敲壁傳話，這是帝俄監獄中，關在獨房裏的囚人們的一種談話方法。老囚人對新來的囚人的敲壁方法是按照俄文字母的順序反覆敲着。等到彼此能夠簡單地通話之後，便改用簡便方法，即將俄文字母排成六行，每行容五個字母，地位排定了，以後用到一個字母時，只要敲出它在某行某格就成了。譬如用一個V字，得先敲一下，又再敲三下，說明這是第一行第三格中的字母。

③ 西門·麥葉上尉，猶太人，巴黎公社革命時，他是國民軍的軍官。

我吃了一驚，我受了傷害而且生氣了。我讀過西門·麥葉的回憶。我記得船上的那一段，還有別的許多情景我都記得清楚。我不禁想道：「爲什麼要這樣說教？我不需要他的說教！」

然而事實上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倘使我的鄰人同情我，柔情地安慰我，那麼他的話語就不會有一點用處；那種話語會適合我的心境。但是他用很確定的話來批評我；他很明白地指示出來我的責任是什麼，他還使我煩惱。這種煩惱却幫助了我；它和我平日的心境正相反，它和那心境衝突，而且把它打破了。在寂寞裏一件很小的事情有時候會變成非常重要；它會依附在你的意識裏，你很難把它趕走。這次的事情就是如此。我那鄰人的話就盤據在我的心上，使我不能忘記。我們中間的那堵牆壁每天都使我記起我們的那番談話；每一次我記起它，我就起了一種不愉快的激怒和困惱的感覺。這樣一來我的悲痛和渴望就被打斷了，困惱倒反而做了有益的事情。

然而還有別的更大的東西把我救了出來。我的審判是我所參加的革命劇之最後的、終結的一幕，在我得到判決以後我就覺得我的社會活動完結了，我只是一個簡單的人。我被捕以前的年代裏的那種緊張，在我候審期內還能抑制，現在却崩潰了；再沒有工作留給我的意志，在我心裏人的感覺就醒起來了。人現在會受苦，而不能夠自制，而且會屈服於疾

病和死亡的攻擊。我忘記了：我擔任了公共的職務以後再不能夠僅僅做一個單純的人；我比一個簡單的人要多一點或者少一點什麼，並且我所選擇的公共的工作也還沒有完成。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作爲一個革命團體的人員已經把民意社的名字寫在我們這時代的歷史上面了，而且俄國的『巴斯底』●席呂塞爾堡在我們同代人的心中會留下一個大的影響，連我們也會受到牠的光榮。無論是我或我的朋友們都沒有起過這種念頭。我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了，不能夠想到這樣的事情。但是在我入獄後的第五年，在一個未到預定期間就失敗地終止了的同盟絕食以後，我比任何時候都更逼近了死亡，而且也渴望着死，却又不由自主地被人強迫着來生活，我的精神裏充滿了失望，我的神經也破碎了，在那時候我聽見了一個同志說的這一句話。他是我們中間天賦最高的人。他的話並不是對我說的，他在向別人談起我，我無意間聽見了。他說：『薇娜不單是她的朋友們的，她還屬於俄國。』

這一句話把我抬高到一個人不能夠想像的，可怕的高度；這個高度是殘暴的，它把一

● Bastille 法國巴黎的一個要塞，後來改成監獄，囚禁政治犯或未經審訊的囚人。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被革命的民衆攻下，拆毀。

個人的力量所做不到的義務加在他或她的肩上。然而這一句無意間聽來的話語却放了一個理想在我的面前，這是一個達不到的理想，但我應該去爭取它。這一句話給了我的意志以一個工作：努力去做一个有價值的人，和自己戰鬥，征服自己。要努力，要征服，要戰勝自己！要戰勝疾病，瘋狂和死亡！

然而我應該怎樣奮鬥，怎樣克服呢？要克服，就是要驅散那籠罩在我的精神上的黑暗，要趕走那一切阻礙着我的眼睛使牠們見不到光明的東西。這就是說要忘記一切。我力求忘記一切。我驅走了一切的回憶；我把它們全埋在一个墳墓裏面。十年來我埋葬了它們，十年來我努力忘記了一切。十年來在我的意識裏我的母親已等於死了；我對於故鄉，活動，自由等等的渴望也都死了。悲哀死了，愛也死了，雪落下來，用牠的白色的大氈覆蓋了過去的一切。我呢？我還活着。我還很好。

密拉科夫和麥秀根的死

在席呂塞爾堡監獄開設以後最初六個月中，發生了兩次用排槍槍決囚人的事情。我在前一章裏面提說過密拉科夫和麥秀根被他們槍斃了。這兩個人在革命運動中都有着長久的經歷。

密拉科夫一八七九年在阿德沙被判罪。他被遣送到加拉礦山去服懲役，在那裏他圖謀逃走沒有成功，便給人送回歐俄部分來，最初關在彼得保羅要塞裏面，後來席呂塞爾堡改建監獄以後，他又被移到這裏來。所謂席呂塞爾堡的監禁就是希望斷絕的活埋，密拉科夫不願意在這個新的「巴斯底」裏面緩慢地憔悴死去，照他自己在一首詩裏用的那個比喻「像一段木頭掉在泥沼裏慢慢腐爛一樣。」他要求跟他親屬通信的權利，還有接見親屬的權利，又向監獄當局要求書籍和烟草，又實行絕食抗議，最後他打了獄醫查爾刻維

奇的耳光。

當時在獄裏是這樣傳說的：在他實行絕食的時候，獄醫強迫他進食，他便打了獄醫的耳光。然而根據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發見的檔案裏的記載，我們才知道原來密拉科夫胃口不好，他疑心醫生在他的食物裏面放了毒藥，想害死他，才打了那個醫生。他們就因此把這個心理不正常的病人交給軍法審判，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執行槍決，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密拉科夫不肯請求恩赦。

這是一八八四年九月裏的事，這以後一個月我們「十四人案」中受審的同志們和我自己才被帶進席呂塞爾堡裏來。

這年十二月聖誕節那天，全個監獄都被某一個監房裏發生的事情驚嚇住了。我們的晚餐剛剛送來，我們就聽見金屬盆子落在地板上的響聲，扭打的聲音，同時還有一個半被悶塞住的人聲叫着：「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這是麥秀根的聲音，他是俄國革命運動中一個受苦最長久的人物。他原是一個莫斯科的市民，在阿爾巴特區開設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局。他的排字工人都是些有知識的年青人。全體的工人跟麥秀根一塊兒就住在印刷局的那所房屋裏面，過着一種友誼的共同生活。麥秀根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跟

那班準備參加「到民間去」的運動的人有聯絡。他們開始印起違禁書刊來。可是沒有多少時候警察就查出了這件事情；他們實行搜查，把工人們全抓去了。然而麥秀根臨時得着警告，他居然漏了網，後來便去了外國。他在國外想出了去西伯利亞隻手救出巧爾勒雪夫斯基的計劃。他裝扮成一個憲兵隊的軍官，到了巧爾勒雪夫斯基居住的維魯斯克城，去找當地警察局長，拿了一份偽造的第三處^①的命令給那局長，要局長把巧爾勒雪夫斯基交給他押送到聖彼得堡去。然而警察局長起了疑心，要麥秀根先到雅庫次克去見總督，並且派了兩名哥薩克兵護送他。麥秀根知道他的計畫失敗了，他決定設法弄掉這兩個同伴；到了雅庫次克附近，他開槍打死了一個哥薩克兵，另一個却逃掉了。

但是麥秀根也沒有走多遠就給人抓住了，被送到聖彼得堡去，在「一九三人案」中受審判。這次受審的被告們決定了在他們中間推舉出一個發言的人，根據他們共同草擬的一篇宣傳革命的演講稿當庭發表演說。麥秀根便是中選的人，而且他盡力認真地、熱烈

① N·巧爾勒雪夫斯基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俄國前進派青年的領袖，他還是一個有成就的經濟學者。當時被流放在西伯利亞。——英譯本註。

地完成了他這個任務。元老院院長彼德士幾次要岔斷他的辛辣鋒利的演說，都沒有用。彼德士因此不得不宣告暫停審訊，但也沒有用；於是審判停了，憲兵們向着麥秀根撲過去，把他從座位上拉開。別的被告們也連忙上前去保護他們的同志。於是在一陣喧嚷叫號聲中發生了一場混戰，這樣的事在審判史上實在找不出第二件來。

麥秀根在受審之前已經給監禁了三年了，現在又被判處十年的懲役。從一八七八年到一八八〇年中間他被關在哈可夫監獄裏面。受着極壞的待遇。在羅利士·麥里柯夫專政的時期，判了懲役罪的囚人都被移到加拉去了。兩年以後在加拉有幾個囚人合夥地逃走了，麥秀根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居然已經逃到了海參威。在那裏因為沒有適當的聯絡關係，他又被人認出來，捉住，送回到聖彼得堡去。他被關在彼得保羅要塞中的亞歷克賽半月堡裏面，好些民意社的社員正監禁在這裏慢慢地消耗他們的生命。麥秀根好幾次想鼓動同囚的人起來反抗這種殺人的管理方式，可是他的提議並沒有得着響應。半月堡內毫無動靜。後來所有的囚人全被移送到席呂塞爾堡去了。

● Loris-Melikov (1825?—1888) 俄國的將軍和政治家，一八八〇年和一八八一年中間擔任內務大

臣的職務，以鎮壓革命運動著名。

麥秀根這樣移來轉去，在那些個人間地獄中差不多過了十年的長歲月，現在經過了他那一切的審判和流浪之後，他又落在最無希望的俄國的「巴斯底獄」裏面了。這是連他那樣堅定剛毅的精神也忍受不了的。他決心去死——他要侮辱獄中督察長，他希望因此而受審訊。他在法庭上便可以揭發席呂塞爾堡的殘酷的祕密，使全俄國人士都能看見，他以為犧牲他自己的生命可以為他那些在獄的同志們爭到一種較好一點的待遇。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實行了他的計劃，他並未經過法庭公開審訊就被處死刑，在古衛城內一塊空地上執行槍決，三個月前我們的同志密拉科夫也就是在這個地方受刑的。

麥秀根托那個跟他的房監隔得最近的同志通知我們，要大家發動一個普遍的抗議來支持他。然而監獄裏毫無動靜；一點聲息也沒有；我們的監房都是不相連接的，所以他的莊嚴的遺囑只達到了一間單獨的監房。

在他處刑以後內務部次官阿爾測夫斯基到席呂塞爾堡來視察所有監房的情形。我們猜想他的視察跟麥秀根案一定有關係，在這視察以後，我們中間六個身體最壞的囚人便得到了兩個人結伴散步的許可。這六個人都是從亞歷克賽半月堡裏移過來的，他們是莫洛左夫和布撤維奇（布撤維奇不久就因肺病死去了；特利哥尼和格拉切夫斯基

（格拉切夫斯基後來在獄中自焚而死；弗洛林柯和伊沙也夫（伊沙也夫當時患着第一期的肺病。）兩個人一塊兒散步的許可算是把我們這個大石棺敲開了一個裂縫。直到這時為止，雖然牆上掛的獄規上面講得有品行良好的囚人可以享受跟一個同伴一塊兒散步的優待這一類的話，可是從沒有一個人享受過這種特權。然而在阿爾測夫斯基的視察以後，也就再沒有人得到過它；一八八五年全年中，除了那六個人外再也沒有人享受過這種優待，並且死去的人留下的人缺額也不叫別人填補。

這是督察長的意思；顯然我們大家的品行都不「好」。

我找到一個朋友

一八八六年正月初我聽說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伏爾鏗席太因（十四人案件中和我一起受審訊的一個女友）也在這席呂塞爾堡裏面，便向督察長要求，問他們爲什麼不許我散步時在同囚者中間找一個同伴。督察長半晌不作聲，過後便說：「我們可以許你有這個權利，只是你不可以……」他一面彎了食指在門柱上敲着，摹倣我們在監房裏敲壁談話的樣子。我回答道我很少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並不會繼續談下去，我依舊留在孤寂裏，和從前一樣，然而正月十四日他們帶我出去散步，我們所稱爲「第一號籠子」的那個小地方的門一打開，我便看見一個意想不到的女人，她穿着一件粗布短衣，頭上包了塊亞麻布帕子，她急忙走過來擁抱我，我很不容易地認了出來這就是我的同志，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她看見我穿着囚衣，樣子有

些改變，大概也會吃一驚。我們站着，互相擁抱，不知道該笑呢，還是該哭。

在這時候以前，我單只在審訊中見過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我們從前並不會遇見過，祇彼此常聽見別人說起。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的誠實，她的質樸，她的好心立刻感動了我。我們處在這種情形下面，並不需要長時間，便成就了一種這麼深切的友誼，只有在這環境裏纔能夠做到的。我們和那些飄流在無人島上的人有些相像。我們除了彼此而外，在全個世界裏什麼都沒有。不僅是人，便是自然，顏色，聲音，牠們全都消失了。只有一個陰暗的天空，和一排神祕的，用牆壁隔開的囚房，那些不能夠給看見的囚人便在這些監房裏面一天天地憔悴下去；只有一種可怕的沈寂，和那暴行，瘋狂，死亡的空氣。在這種環境裏，兩個朋友必需在彼此的相伴中找到歡樂，而且以後會永久寶貴着這一個最令人感動的回憶，這是很明顯的事情。

坐過監牢的人便知道一個人在禁錮的時候得着一個同伴的同情的柔愛，在他的生活上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帕立瓦諾夫的敘述他在亞歷克賽半月堡的生活的獄中記裏面有一段動人的描寫，說科諾德克維奇怎樣撐着拐杖一顛一跛地走到牆邊用幾句溫柔的話語來安慰他。沒有靈魂的石塊隔開了這兩個囚人，他們被敗血病和寂寞折磨到快死了，

然而透過這沒有靈魂的石塊的一番簡短的談話便是他們的唯一的快樂和支持。帕立瓦洛夫又說過有好幾次憂鬱很厲害地來襲擊他，使他起了自殺的念頭，還虧得科諾德克維奇的友愛的話語把他救了。友愛的同情在監牢裏果然造就了不少真實的奇蹟；敲壁談話的方法摧毀了那個分隔人們的石頭的障礙，倘使沒有這些牆壁上的輕敲，囚人就絕不能夠保持他的生命或精神了。爲着維持這種敲壁制度的鬥爭，是很正當的，一個囚人對獄吏的第一個鬥爭就是這個：這是一個純粹的生存競爭，每個關在監房裏的人都把持住這個方法不肯放鬆。就像一個快淹死的人緊緊抓住一根乾草莖一樣。然而倘使那些單獨禁錮的囚人忽然被允許和他們的同監者見面，不再用暗示的敲壁，而用活的語言來談話，那時候一句溫柔的聲調，一瞥親切的眼光，那裏面所包含的好意和仁愛，還有那友愛的握手，這一切都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快樂，這種快樂，是那般不會失過自由的人所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把什麼給了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然而她却是我的慰藉，我的快樂，我的幸福。我的神經和一般的身體組織已經完全鬆弛。在體質上我很衰弱，在精神上我也是完全竭盡了。我的一般的心情也是反常的；現在突然間我找到了一個朋友，她不會像我這樣被監牢環境折磨到這麼深切，這麼厲害；這個朋友又是溫柔，善良，仁慈的化身。她的

可愛的精神的全部寶藏，她把它們全都慷慨地給我了。我們會面的時候不管我的心境是多麼憂鬱，她總會想法來驅散它，她總會想法來安慰我。只要看見她的微笑，只要看見她的可愛的面孔，我的憂愁就會給趕走了，我的心也歡樂起來了。我和她散步一次以後，回去時我就安心了，好像另外變了一個人；監房也不是那麼陰鬱的了。生活也不是那麼難堪的了。我立刻夢想着我們下次的會面。我們每隔一天會面一次；顯然是獄規認為應該使我們過一天完全孤寂的日子，來減少我們會面時的快樂。然而這事實大概只有使我們對彼此相見的渴望越發銳敏，只有加重我們的「假日的快樂」這種心境我們日後回憶起來也是極其愉快的。

遇着牢裏發生了不幸事情的時候，譬如同伴們的慘死（他們的呻吟和臨死時苦痛的叫號，我們都聽得清清楚楚，因為在這獄牆裏面任何聲音都有很清晰的回聲），我們兩人的臉色都變成了蒼白，都很激動，不說一句話。我們極力不要看見彼此的臉，因此就互相抱着吻個不停，然後默默地在那小路上走來走去，或者坐在地上（這裏沒有凳子），背靠着垣牆，極力避開那個從小守望塔頂上監視着我們行動的憲兵的視線，離得愈遠愈好。在這些日子裏，單是彼此身體上的接近，或者挨着一個朋友的肩頭，都是一個絕大的安慰，可

以減輕生活的重壓。一八八六年裏面有一個月就接連地死了三個囚人：聶馬羅夫斯基、死於敗血病、伊沙也夫死於肺病。至於伊格拉地·伊凡諾夫，我以為他是患了這兩種病死的。並且他又是瘋狂了。

伊沙也夫還活着的時候，他們帶他出去在露天散步，他的高亢的，嘎聲的咳嗽好像是從一個空桶裏發出來的一般，我們聽見這聲音，我們的心就像被撕裂似的痛楚了。有時候他們帶我們去散步，就帶進伊沙也夫剛纔去過的那地方。在雪地上左邊右邊都留着他剛剛咳出來的發亮的紅血。這些血跡不會被人弄掉，也不會被雪蓋着，牠們絞痛了我們的心，牠們便是一個被摧殘的生命的表徵，這是一個同志的生命，科學不能夠爲力了，人力也沒有用……這裏又沒有一塊地方可以讓我們掉開眼睛，不看見那些血跡。這個「籠子」裏面小小的面積都給雪蓋滿了，只留着一條窄路給人來散步，我們必須沿着這小路走。這血跡本來是只用幾鏟子的雪就可以掩蓋了的，他們却冷酷地留下牠來折磨、教訓那些怕看見牠的囚人，這種殘忍的手段是太可恨了。在那些日子裏我們連鏟子也得不着。

伊沙也夫的最後的痛苦是很可怕的。在我們所必須忍受的苦楚中，恐怕這要算是最

大的了。只要一點嗎啡或鴉片一類的東西就可以減輕他的最後掙扎的痛楚，同時也免得我們大家受苦，然而並沒有人來做過這類的事情，牢裏面應該是死一般的沉寂；我們都應該坐着不動，帶着緊張的心情，屏息着呼吸來傾聽這沉寂……沒有一點聲音……於是在這緊張的情調中間突然起了一聲呻吟，更像是一聲哀哭。眼睜睜旁觀着一個人交出他的生命，這是很難堪的，而更難堪更可怕的乃是做了這樣一個被動的關在活葬墓裏的旁觀者。只有在監獄和瘋人院裏面（瘋人院在許多地方都和監獄相似）纔會有這種慘痛的可怕的事情發生……

在這年春天他們給了我和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兩塊小地，都是在菜園裏面，每塊約有二英尺半長九英尺寬。獄中當局隔出了六個小花園，地方毘連着要塞的高牆，而且伸張進監獄裏面十五英尺到二十英尺的光景。他們花了大價錢從別處買來許多土，用船載了進來，一堆一堆的洒在大菜園的地面上。

我們的地很小，是長方形的，並且位置得很不好，差不多完全得不着陽光。一邊是高的石牆，其餘的三面各有一塊九英尺高的板壁；總有東西把陽光遮住！然而便是這塊四面高牆圍着的井一般的地方，在我們看來已經算是天堂了。這裏有着土，真正的土；田野的土，鄉

村的土，黑的，涼的，鬆散的。在這時候以前，我們就只看見我們那個「籠子」裏面的不毛的地，是死的，石頭般的地，一片草也鑽不出來。自然這是故意這樣安排的，爲了便於監視我們，不要我們彼此私下傳遞信件，把紙條藏在草堆裏。這一年他們從河岸運了沙子進來，傾倒在這些小天井裏面，每一處再放了一把木鏟，說是預備來「給犯人練習運動。」這是督察長的說法。他們假定囚人把沙子鏟到木鏟上面，然後再往各處洒去，從一個地面洒到另一個地方，這樣就可以增加他的氣力。後來果然那些得不到花園來種（因爲他們只許很少的人有花園）的人便只得靠洒沙子來消磨時間；然而這是非常沉悶的，我們就給這種無謂的遊戲起了個名稱，叫它做一八四八年法國國民工場的工作。

分配園子的時候，督察長和看守長把囚人領到那地方去給他指定一兩個花壇。於是看守長依舊默默地發給囚人一包種子（小蘿蔔，胡蘿蔔，萊菔，豌豆，卷心菜，罌粟等等）他自己先從裏面抓了一把教囚人怎樣播種，但是依舊不說一句話。他把身子俯到地上，用手指挖了一個小洞，丟一粒種子進去，過後他就默默地跟着督察長退去了，這些時候督察長都留在旁邊靜靜地看着。這裏絕對禁止憲兵和囚人談話，而且連發布平常的必需的命令，也是往往不許可的。在絕對必要的時候看守長會用手勢來表示，因此我們後來就開玩笑

地給他起個綽號叫「啞劇班戲子」。

草木開始發芽的時候，牠們的綠色嫩苗在地上到處伸出頭來，給了我們說不出的溝意。到了夏天，憲兵們先沿着牆邊種下的花一齊開放，那時我們竟然狂喜得像小孩一般。我們渴望着綠草，渴望着田野和草地，一叢綠草居然在我們的枯萎的心中喚起了一個全然意外的情感的波動。每一小片草葉都是我們的寶貝。

我記起來有一次我們走進園子裏面，這地方在前一天有另一個同志去過，我發見牆邊活潑地長着的一株酵母花的嫩芽給誰在上面擲了一堆土掩蓋了。倘使一個母親看見她的孩子窒息在土堆下面，她也絕不會比我更氣憤地跑去把土堆翻開。這是我被捕以來的第一次生氣，我跟誰生氣呢？跟一個同志。然而我却想到，我們處在這種情形下面，不說跟一個同志生氣，便是想起一個同志的壞處也是不行的。

這是我對於植物的態度，但是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却特別喜愛昆蟲和偶爾進到我們日常生活裏面來的少數動物。她把麻雀養得很馴，牠們時常一羣一羣地站在她的膝上啄食她的囚衣上面的麵包屑。常常在我們手挽手地散步的時候，我會忽然發覺她走出了路線，拉着我向旁邊走幾步。我好幾次想不出這道理，可是她把她的理由一旦向我

說明，我就禁不住發笑，過後我又是深深地感動了。原來這個恐怖主義者看見了一隻爬行的蝶蛾類幼蟲或甲虫，害怕她會把牠踏壞！我却從不會想到去注意有沒有小生物在我們的路上經過。後來我們有了覆盆子樹，小蟲開始來吃樹葉，我任是怎樣勸她把這害蟲捉下來放在水盆裏淹死，她總不肯。她甯願讓覆盆子全株死掉，不肯殺死一個生物。另有一次她對待在她監房裏發見的一隻臭蟲的態度（這臭蟲大概是一個憲兵帶進去的）更使人好笑。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用一片紙頭把這臭蟲小心地包好，她出去散步時便帶了牠在身邊，然後更小心地打開紙包，放出臭蟲，讓牠逃去！

這種對待動物的態度很使我感到興味。我會問過她是否她從來就是這樣地對待動物。她回答說對於任何形式的生命她都是永遠這樣地愛惜。在她，這種態度的確不是暫時的牢裏的「情癡」，而是一種真摯的感情，而且和她的可愛的天性完全相合。在待人一方面我很難找到一個比她更善良更溫柔的人；而且在起初幾年她的心靈還不會被那對獄吏的瑣碎的鬥爭摧殘的時候，這種仁愛與好心會放射着一種驚人的光輝。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知道生活，知道人民，她並不會把他們理想化。他們本來是怎樣，她便把他們當作怎樣，她知道他們有光輝面，也有陰暗面。她愛光輝面就把陰暗面寬恕了。她有一種幸

福的能力，可以找出而且從來不會忽略過一個人的好處；她確切地相信，在每個人身上都潛伏得有一種基本善。她堅決地相信善和愛能夠克服一切的惡；因此最有效果的糾正方法並不是嚴厲的斥責和壓制，却是仁愛的話語和同情的、友誼的批評。她的整個私人關係的特徵就是一種無限的慈悲。她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們都得生活，也得讓人家生活。」

我自己對於生活的見解和她這種溫和的觀點完全不同，然而在我被禁錮的起初幾年中間，我和社會鬥爭，我和我平時所接觸的那種緊張的空氣都離開得很遠，我的精神也就漸漸地變軟和了；而且我和這樣一個崇高的愛的表現（不僅是對人類，對個人也是如此）接觸以後，我的心理也起了一個奇異的變化。我感到一種道德上的，同時又是美學上的喜悅：這是愛和美，這種美又和那踏碎一切阻礙物而前進的精力與堅決不屈的意志完全不同，關於那種精力與意志我從前已經見過很多的例子了……

觀察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靜聽她的談話，了解她的個性，誰都會不覺地自問道，她的仁慈與柔愛怎麼會和革命運動的暴力與流血調和。固然發出光與熱，使人幸福，對於這種可愛的天性似乎是一個天然的事業。然而事實却又是兩樣；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畸形與不合理又逼迫她選擇了另一條路。對於勞工階級之殘酷的掠奪更使她變成了

一個社會主義者。在俄國自由的、公開的活動之不可能與夫對於個人之野蠻的壓迫，又把她造成了一個恐怖主義者。只有在革命的抗爭裏面她的可愛的自己犧牲的精神才能夠帶着清白的良心來表示它的利他的熱望，因此她以自己的生命作代價來掃清生活的大道，讓給後人去走。

不管我和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在一起時是如何地快樂，而且結伴散步又是我們的唯一娛樂和慰藉，然而在這年（一八八六）秋天我們便不得不把這特權完全放棄了。事情是這樣的：按照獄規，這種散步和種花園的特權乃是對於「良好品行」的報酬。自然誰也不高興因自己的「行爲」受罰；而且評量我們的行爲的乃是監獄的督察長，或者更可以說他是隨着自己高興而發給特權的，因此便是非常地不公平。我們有好些同伴，他們的日常行爲並不違犯例規，可是依舊享受不到任何特權。固然他們有時候敲壁和鄰人通話，但這事情我們大家都做過。

在牢裏人們必須設法互相通消息。只有那些精神錯亂的人纔不會敲壁通話。那麼倘使一個犯獄規的人得到了和朋友結伴在園裏散步的特權，所有的人也都應該有這種特權。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我們有幾個同志像科比連斯基和斯拉托頗爾斯基竟不會見過

一個朋友的面孔就死去了。別的人像，潘克拉托夫，馬爾地諾夫，拿哥夫斯基，等這種特權已經等了許多年。

人們不惜使用種種的方法想得到跟同志們再見面的機會，例如帕坡夫的事情。有一次忽然「救命」的叫聲把整個監獄都驚動了。帕坡夫的房門打開了，督察長跑了來，他粗聲問道：「有什麼事？」

「我實在忍不下去了，」帕坡夫答道。「讓我跟一個同志再見一次面吧。」

督察長注意地看了他一陣，然後說：「好，我去報告司令官。」

過一會兒司令官來了。他問道：「犯人要做什麼？」

「我實在忍不下去了，」帕坡夫答道。「讓我跟隨便哪一個同志去散步吧。」

司令官答道：「犯人喊着「救命」却要求特權。犯人應該想想，要是我們現在立刻滿足他的要求，那麼對別的犯人算是開了一個怎樣的先例呢。然而要是犯人安安靜靜地等待一些時候，我們會滿足他的要求的。不過要是他再喊一次的話，我們就要送他到別的地方去。」（他指的是老監或懲戒室。）

帕坡夫願意靜候着。過了幾天他便跟雪巴林一塊兒在散步了。

然而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像帕坡夫那樣聰明的，大多數人通常都不作聲。特權的分配，事實上是督察長捏在手裏的一個武器。誰要是不用「您」字回答督察長的「你」字的稱呼，他就會失掉跟一個同志見面的希望，哪怕是他患着重病活不久了。斯拉托顏爾斯基從來沒有跟督察長衝突過，只是偶爾敲壁談話。他吐血——他的體力一天一天地在消失，然而督察長帶着冷靜的殘酷看他在孤寂中死去。科比連斯基的情形也是這樣，他不過用了「你」字回答督察長的「你」字的稱呼。督察長對潘克拉托夫也報了仇。

每當散步回來，想起自己的鄰人連這一點和一個同志見面的快樂也得不到，這情景是很令人難堪的。自己和一個朋友在天井裏面閒步，而就在旁邊很近的地方還有一個同志沒精打彩地踱着，他也很想看見一個朋友的面孔，他也很需要同伴，需要同情，需要朋友，這情景也是很令人難堪的。但是我却沒有想到設法來逃避這種情形。在我看來獄規就和石牆、鐵門、鐵格子一樣地堅定頑固。我們不能夠打破那凌踐我們的獄規，猶如不能夠打破牆壁和門門。

然而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另有一種見解。她想我們應該用各種方法來反抗獄規。督察長分配特權既是如此專斷，如此不公，因此我們便不應該承認這種特權。魯特米

娜·亞歷山德洛夫娜提議採用一種消極的抗議，她的辦法是由我們這般正享有着特權的人來實行自動的放棄。自然我們的放棄必須有一個理由。那麼我們就說所有囚人的行為都是多少相似，因此我們的友誼和同情使我們不能夠安心享受其餘的人所得不到的特權。經過長久的時間我還不能夠決定這樣的一個犧牲。自然我每一起我在享受一種恩惠，我的許多同志却正因了沒有它而悲哀着，這時候我也感到很大的痛苦。但是我又覺得我是生活「在深淵裏面」，我和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的會面乃是我的唯一的快樂。我只願我能夠相信這犧牲會有結果，而我們的自動的放棄會把督察長用來壓迫我們的武器奪取過來！然而我却不相信他們會在這樣一個要點上面表示讓步；而且這次恐怕會弄成自討苦吃，永久的喪失掉特權，因為我們一經發動就不能夠退縮了。加以現在享有這種和同志結伴散步的「特權」的囚人裏面有幾個的確是十分病弱，而且絕對需要朋友的幫助。

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看見我很害怕分離的念頭，她就好些時候不提起這件事情。但是後來這惱人的問題又時時在我們的談話中發生了。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固執地把這問題的新面目指給我看。她說我們應該不僅看重這次反抗的目前的效果。

這次反抗除了它的直接目的外（直接目的便是，使種花園和結伴散步成爲囚人共有的權利，恢復它的常規，不再作一種特權。）它本身還有一種意義。在一般的沉默與屈服中間，監獄當局也會看見我們並不完全被動地忍受別人給我們安排好的一切，而且我們也不是只顧到我們自己如他們所希望的，我們還要同情我們的同伴，還要起來發言保護他們。我們裏面任何一個人在獄吏面前用了『我們』這個代名詞，就會得着這樣一個回答：『只說你自己的事情！』這一次犯人就應該拿出同志的名義來拒絕一件獄吏所認爲是酬報的東西。獄吏們最高興犯人對於他們發出的命令一概謙卑地承認，和被動地服從。在這裏囚人不僅被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甚至連單純的基本的人權也全給奪去了，而且任何方法只要可以摧殘他們的精神，獄吏們就全都使用，那麼這些人就應該把他們自己放在看得比他們的獄吏和劊子手的上面，哪怕就只是暫時也可以；他們應該來判斷牢裏的各種設施，而且指出必須把錯制這種批評的獄規加以改革。

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漸漸說服了我，使我相信她的議論是正當的，我們便聯合了幾個同志實行拒絕享受我們的特權，說非等到這種特權普及全監獄時，我們不願再享受牠。起初有許多贊助我們，然而後來這運動就漸漸支持不下去了，（牢裏的情形往

往是如此；並沒有發生一個多少普遍的抗爭，只有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尤利·波哥達諾維奇，帕坡夫，雪巴林和我，我們五個人是堅持到底的。整整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們不會種過花園，也不會在一起散步過。

懲戒室

在最初幾年裏面，我就跟大多數新進監牢處在生疏而含敵意的環境中的囚人一樣，我的精神十分頹喪，我好像找到了一個唯一的藏身地方，那就是沈默，我甘心忍受着那種手脚都被縛住的囚人的命運。我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不只是因為我明白在這裏任何反抗，任何鬥爭都沒有用處，而且是不可能的，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凡是像我這樣有時候也會受到基督精神的影響的人，（基督爲了他的理想忍受了侮辱、痛苦、和死亡；）凡是在幼年和青年時期把基督當作理想人物，把基督的一生當作自己犧牲的愛的榜樣的人，一定會了解一個爲了自由的緣故而被丟進活葬墓去的新判罪的革命者的心境。審訊完結之後被判罪的犯人會感到一種特殊的心情。他安靜而覺得輕鬆，他不再拚命抓住他剛剛分別了的一切，他堅定地向前面看，正視着未來，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要來的事是無法逃避的，

並且也是無法改變的。

基督教的思想，（從我們還是小小嬰孩的時候起，基督教的思想就開始有意或無意地灌輸給我們大家了，）再加上一切爲理想犧牲生命的殉道者的生平事蹟，在這種囚人的心上自然會產生影響，會給他造成一種安慰的感覺；他的考驗的時候已經到了。他作爲一個爲人民，爲社會，爲後代（而不是爲着他這個渺小短暫的自己，）爭取安樂與福利的戰士，他的愛是否堅強，他的精神是否剛毅，現在正在受着試驗。我們有着這樣一種心境，我們自然不會想到跟那羣禁卒和劊子手去作什麼言語上或行動上的鬥爭了。難道耶穌受侮辱挨人打的時候抵抗過嗎？要是想到耶穌會抵抗，不免會起一種褻瀆了他那純潔的精神和溫良的品格之感覺。

雖然是這樣，雖然我當時有着這種「無抵抗」的心境，可是在我和我的朋友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分開後六個月，我跟獄方發生了衝突，那衝突很有產生悲劇的結果的可能。

在「降靈節」以前幾天中某一個晚上，九點鐘光景，督察長正在循例視察獄中各

● 「復活節」以後的第七個星期日。

囚房，在每個門上的「洞眼」裏望望，帕坡夫忽然從他的監房裏高聲敲着牆壁喚我，他的監房在我監房的下面，只隔了幾道門。我很倦。監獄裏的白天又長，又無聊，又空虛。我只想在我的吊床上躺下來睡一覺，可是我也不願意拒絕一個同志的呼喚，所以我回答了他。然而等到帕坡夫再敲起壁來時，他的第一句話還沒有敲完，就在半途中斷了。我聽見門砰然一響，接着是一些人的脚步朝出口的方向跑去，然後一切又回到寂靜中了。我立刻明白了：督察長把帕坡夫帶到懲戒室去了。

懲戒室是督察長常常帶着威嚇的口氣講起的那個地方，他說：「我要把你關到一個沒有一個活人會聽見你聲音的地方去。」沒有一個活人——這想起來太可怕了。

在這兒我們全體囚人都是在要塞的同一個屋簷下面；我們四周都是朋友們，各人在各人的石頭囚房裏，這樣大家都算有了保護。要是你不得不叫喊，你的叫聲也會給別人聽見。要是你不得不呻喚，他們也會聽到你的呻喚聲。可是「關到那兒去」呢？那兒「沒有一個活人會聽見你的聲音。」

我知道，不太多時候以前，帕坡夫曾經給「關到那兒去」過，又挨了很厲害的打。我想到他現在又會給人關到那個可怕的地方去，他孤單單一個人，沒有一點抵抗力，又會讓一

大羣憲兵撲到他的身上，我這樣一想，我覺得太可怕了，我便下了決心：我要叫他們把我也關到那兒去；至少我得讓他知道他不是孤獨的，並且——要是他受到虐待拷打的話，他還有一個見證。

我敲打門，要人去請督察長來。他來了，打開門上的小窗，帶怒地問道：「你要什麼？」

「兩個人談話，單懲罰一個人，那是不公平的，」我說。「把我也帶到懲戒室去吧。」

「很好，」督察長馬上答道，他開了鎖把門打開了。

於是我第一次看見在夜晚給燈照亮着的，我們這監獄的內部了：沿着我們這墳墓的牆點了好些小燈；四十扇沈重的黑門立在那兒，就跟豎立起來的棺材一樣，在每扇門後面一個同志，一個俘虜單獨在那兒受苦；憔悴，患病，等着自己的死期。我剛剛經過我的「嘆息橋，」走近石階的時候，忽然聽見我的鄰人叫起來：「他們把薇娜帶到懲戒室去了！」接着許多隻手瘋狂地打着門，許多聲音齊叫着：「把我們也帶去！」

在這使我十分激動的我四周的陰暗景物的中間，那些看不見的人的熟習的和不熟悉習的聲音，那許多我好些年來沒有聽見了的同志們的聲音給我喚起了一種帶痛苦的，強烈的喜悅！我們給人分開了，但我們還是聯在一塊兒的；我們的精神還是一個整體。

然而督察長氣得不得了。我們由三四個憲兵護送着走進天井的時候，他舉起他那隻緊緊捏着一串監牢鑰匙的拳頭。他的臉氣得歪扭起來，他的鬍子顫抖着，他向我叱罵：「在那兒，你敢再弄出一個響聲，我就要給你顏色看！」

我害怕這個人。我聽見人說過他怎樣命令憲兵對囚人用殘酷的體刑，我想道：「要是他們打我，我會死的。」可是我卻安靜地答道：「我不是到那兒去敲壁傳消息的，」我的聲音居然是那樣地安靜，聽起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似的。

衛城的寬大的木門打呵欠似的開了，我的恐懼立刻被喜悅趕走了。五年來我沒有看見過夜晚的天空和星羣。現在我的頭上就是天空，天上的星星對我射下光來。古衛城的高牆閃着一片白光，而五月的夜的銀輝滿注在牆內幽深的井似的方形院子裏。整個空地上長滿了草。草生得密，又涼，又新鮮，輕輕地刷着人的腳，它使人聯想到一片自由的田野上帶露的碧草。一所低矮的白色建築沿着牆伸展出去，從一面牆伸到了另一面牆，一棵孤單的樹高高的黑黑的立在角落裏。這個漂亮的生物幾百年來就孤獨的生長在那兒，始終沒有一個同伴，這樣它在孤寂中自由自在的地長成了那頂華麗的王冠。這所白色的建築就是所謂「老」監，裏面一共只有十個囚人。鑰匙發出擦響的聲音，好像鎖起了鏽似的，他們化了

相當力氣才打開了監獄的外門，跨過這門便進到一間暗黑的小小的前堂。一股霉味迎面撲過來，這是一間又冷又潮濕，沒人居住的房屋的發霉氣味。在我面前伸展着一條寬闊走廊的毫無隱蔽的石頭，走廊的遠遠的另一端閃着一盞小燈的光亮。在這寒冷的微光裏，憲兵們的模糊的形影，囚室門的不清晰的輪廓，黑暗的角落——這一切看起來都像帶着不吉的預兆似的，因此我不由得要想到這地方真正是一個拷打人的暗牢了，督察長說過他有一個不會讓一個活人聽見我們的聲音的地方，他說的倒是真話。過了片刻他們打開了一道左邊的門，放了一盞燃着的小燈在裏面，門又砰的一聲給關上了，我一個人留在房裏。

我被關在一個又小又冷的監房裏，這屋子從來就沒有給人打掃過。牆壁很髒，好些地方都因為年久失修的緣故剝落了。地是瀝青的，有一張固定在地上的小木桌，還帶着一個座位，另外還有一張鐵的長凳，上面沒有放蓆子，也沒有放任何被褥一類的東西。

周圍是一片靜寂。

我白白等候着憲兵們回來帶給我一床蓆子和一幅可以給我蓋在身上的東西；我身上只穿了一件薄棉布襯衫，一條薄棉布裙子，和一件牢裏穿的外衫，我開始冷得發抖。我想，人怎麼能夠在這種類似吊床的鐵格子上面睡覺呢？可是始終沒有人送了被褥來；我不得

不在這張『拉黑麥多夫床』上躺下。然而在這張長凳上面不僅是不能夠睡覺，連在那些鐵條上多躺一會兒也不行。挨到那些鐵條，從地上從石頭牆壁上傳來的冷氣立刻浸進我的身體裏來了。

第二天他們連這個東西也取消了。他們把這吊床弄起來，用掛鎖鎖它在壁上。夜裏我只好躺在瀝青地上塵埃中間了。我不能夠把我的頭放在地上，地太冷，還不用說上面那些齷齪東西。爲了要救我的頭，我只好犧牲我的腳。我脫下我那雙粗靴子，用它們來做了一個枕頭。我的食物是又陳又硬的黑麵包。我劈開麵包，裏面那些小孔裏全是帶青色的髒東西。我只能吃一點麵包皮。他們不給我鹽，更不用提洗臉帕和肥皂了。

我到懲戒室去的時候，我完全沒有存着敲壁傳話的心思；我去那兒只是爲了減輕帕坡夫的難堪的孤寂。然而帕坡夫却不想沈默：在第二天早晨他就開始敲壁喚我了，我的身體很弱，不能夠回答他。他又敲起來，可是他剛剛敲着牆壁，憲兵們就搶先抓起木頭之類的東西，用力打我們的門。一陣人想像不到的鬧聲起來了。要是一個人沒有在監牢裏這種墳

●拉黑麥多夫是巧爾勒雪夫斯基的長篇小說何爲中的一個人物，他主張並且自己過着一種極刻苦的

生活方式。

墓般的靜寂中生活過許多年，要是他的耳朵沒有變成不習慣聽聲音的話，他絕對想像不到我這聽慣了長期的靜寂而變得柔弱的耳朵這時候所感受到的痛苦。

我無法制止他們的狂敲亂打，我生起氣來，我變成歇斯特里了，我也用拳頭去打憲兵正在外面播着的門。我沒有力量再忍受下去了。然而帕坡夫仍舊時時敲壁想傳話給我，這更惹起憲兵們發脾氣，叫這種折磨人的打門的戰鬥一直繼續着。最後憲兵們的忍耐力竭盡了。於是這種地獄的鬧聲突然中斷了。督察長的沈重的脚步在走廊上跑着，他們在作什麼奇怪的準備，他們在低聲談話，像在商量作什麼不利於我們的事——只有這些聲音打破了這可怕的靜寂。

『現在他去開帕坡夫的門了，他們開始打他了。我能夠爲這種野蠻刑罰當一個被動的見證嗎？不，我忍受不了！』我這樣想道。

我嚷着要見督察長。

他開了監房門上的小窗，我立刻用激動的粗澀的聲音對他說：『你想打帕坡夫。不要打他！你已經打過他一次了——將來連你也逃不掉責任的。』

『我們並沒有打過他，』督察長說，我沒有料想到他現在居然在替自己辯解了。『我

們把他縛起來，他在掙扎，就是這麼一回事。」

「不，你們打他！」我憤激地說，我覺得自己的脚跟立得很穩。「你們打他。還有些見證在。」我接着又說：「他不會再敲壁了。我要告訴他，他會停止的。」

「好的！」督察長順口答應道。

我便敲壁喚帕坡夫，告訴他，像這樣一種鬥爭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我求他不要再敲壁傳話……於是又回復到靜寂裏去。

第二天他們給我送來茶和草薦，可是帕坡夫卻沒有，我把茶潑在地上督察長腳邊，我拒絕使用草薦。然後我劈開一塊麵包，把裏面的髒東西指給他看，對他說：「你始終只給我們吃麵包，喝白水；你且看看你給我們吃的是什麼麵包。」

督察長紅了臉。「給她另外拿點麵包來。」他吩咐憲兵道，五分鐘內他們就給我拿來一塊又軟又新鮮的麵包。

這以後一連三夜，我都是睡在瀝青地上，骯髒東西的中間，寒氣包圍着我，我只有一雙牢裏的靴子做我的枕頭。我躺在那兒思索着，反覆思索着……我第二步應該怎樣做法？顯然，這以後跟監獄當局衝突的機會是很多的。那麼究竟在什麼情形之下我應當違抗獄規，

反對監獄當局的設施，究竟在什麼情形之下這種反抗是可能的而且於我有利的呢？我應當用什麼方法反抗？我怎樣來表示我的抗議呢？我應該永遠保護我的同志嗎？我的第一個衝動說：『永遠。』可是我的同志就永遠是對的嗎？我已經經過一個試驗了，這個試驗是很嚴格的。我把過去幾天裏面發生的每一樁事情都仔仔細細地思索了一番；我把自己的行爲和帕坡夫的行爲都省察過了，我還問我自己：我願意，並且我有力量，使用帕坡夫的方法來鬥爭嗎？帕坡夫有着鐵一樣堅強的體格，絕大的自制力，和無比的反抗能力，這都是在加拉鑛坑裏和亞歷克賽半月堡中鍛鍊出來的；他是一個冷靜的、頑強的、鋼鐵般的戰士。要是看守們侮辱他，虐待他，他也會用同樣方法對付他們。看守們的粗蠻的對待和憲兵們的吵鬧的毆打，他一點都不在乎。他們縛起他，打他；好幾次他們打他打得很厲害；他都受下去了，他並不報復；他還能夠活下去。可是我呢？我卻辦不到。我們兩個人的路明明是分歧的。我沒有充分的體力，也沒有充分的精神力來從事像他在進行的那種戰鬥；而且從道德的觀點上來說，我也不願意發動一個我恐怕自己不能堅持到底的抗議。現在我應當想妥我未來的舉動，揀定一個堅實的立足點，並且將內外的條件全部衡量一下，最後一勞永逸地決定下來我究竟應當怎樣行動，這樣才免得有軟弱或猶豫的機會。對那些細小的日常爭吵，

那些結果總離不了屈辱的衝突，我已經感到厭惡了，我決定不用這種戰鬥方法。我已經明白了我的力量的大小，我並且確實知道什麼是我所能夠做的，而且什麼是我所願意做的。我決定下來：凡是我所能夠忍受的，我都忍受下去；然而要是遇到什麼值得我用生命去保衛的道理的話，我一定要出來保衛它，一直抗爭到死。

在我給關在懲戒室裏的第五天，督察長來對我說：『第五號犯人已經得到了一床草薦和一些別的東西了。』

我精疲力盡，身體非常衰弱，好像害過了一場重病似的，現在我終於能夠躺在我的床上了，這正是要緊的關頭；我的耳朵裏不停地響着叫吼聲和鈴子聲，我覺得暈眩，而且感覺遲鈍，陷在半睡半醒的狀態裏面。黃昏時分我昏昏睡地躺在那兒，忽然聽到了歌聲。唱歌的是一個愉快的，音質不尋常的上低音，這使我空泛地記起了什麼人或什麼事情，但我又說不出來。這是一首樸素的民歌，它的主題是很簡單很單調的。誰在唱歌？誰會在這個地方唱歌呢？我驚奇地想着。難道有什麼工人給放進來做點修補的工作嗎？這是不可能的。那麼這歌聲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它好像是從外面來的。那麼有人在修補這個建築的屋頂吧？

誰在唱歌，這對我是一個謎。我許久都得不到解答，甚至我給人帶出懲戒室以後，我還

在想着它。後來我畢竟想出了那個歌者的姓名：格拉切夫斯基，可是那時他已經自焚身死了。以後我果然聽見人說起，我給他們關在老監裏的時候，他也在那兒。

又過了兩天。督察長打開門，對我說：『散步去。』這是說，我的懲戒期滿了。

我退縮到角落裏去，一面說：『要是你只放我一個人，我就不去。』過後我又害怕地加添了一句：『你不會動武拖我出去吧？』

督察長把我這個躲在角落裏的病弱的俯着的身子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他聳了聳肩頭，帶着輕蔑的口氣說：『還用得着拖嗎！』過後他又添上一句：『第五號已經出來了。』我便跟着他走了出去。

我走回到我原來的監房以後，我用水打濕那塊寫字用的石板，對着它那個小小的鏡子似的表面看我自己。我看到的這張臉，在七天中間老了十年。滿臉都是細小的皺紋，多得數不盡。這些皺紋不要許多時間就全消滅了，可是這些日子的印象卻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靈上。

紙

在我被捕後的第五年，也是在我給關在席呂塞爾堡中的第三年（我已經度過了那三年最困苦的歲月了），他們第一次拿紙給我們。這是一件大事。然而在最初一陣衝動的高興之後，我們開始感到疑惑和驚奇了：我們怎樣來使用這紙呢？我們應當寫些什麼呢？督察長拿出一冊編好頁碼的抄本給我時，他還說：「你把這個抄本寫滿了，得交進去，他們會換本新的給你。」這就是說我們寫好的東西得先送給監獄裏的官員們看，然後再轉到警察總署去。這麼一來，我們剛纔那一點過節日似的興奮，又變成平日的那種平淡無聊了。

在我們這個貧弱的圖書室裏，並沒有純文藝的作品，不論是散文，或是詩，這裏都找不到。我記得我最初寫在我的抄本上面的是聶克拉紹夫的長詩在俄羅斯誰能夠快樂和自由中的一節。隨後我又寫下別的一些我能背誦出的詩。然而不久我們發見了一個新的材

料的寶庫。樂巴丁經過幾個朋友的手（用敲壁的方法）輾轉傳給我這一首詩：

「我詛咒那一天，它照亮了我走到這高牆裏來的路

讓我在這兒永別了自由，

我詛咒那一天，它把我帶到這地上來

不讓我母親殺死她還新生的嬰孩。」

以後還有五六句都是以這樣的詛咒的疊句開始的。

我自己的心境以及我的多數同志們的心境（這是我後來知道的）跟這種可怕的悲觀論調相距很遠，所以這首詩使我非常驚奇。在我進監獄以前的時候我從沒有寫過詩，可是現在我忽然想起寫一首詩來回答他，我也拜托那幾個朋友將我的答詩輾轉敲給他：

「我們有幸為自由犧牲自己，

我們受苦，我們死亡，但我們決不逃避。

我們忍受，我們不發怨言，但我們謙遜地和平地走近

那個就在近旁等待我們的仁善的黑暗……那死……

我們的強壯的年青同胞們，他們會聽見

我們的沈默的呼聲，呼喚他們起來戰鬥：

爲着自由，爲着正義。

所有我們的同志全稱許我的答詩，樂巴丁還送來回話，說這首詩把他感動到快流眼淚了。

這樣的成功給我喚起了一種欲望，我要用詩句來表達那些我不得不時常壓抑住的情緒。我便寫了給我的母親，給我的妹妹，我的老家等詩。我的同志們學着我的榜樣，大家都寫起詩來。四面八方都在吟詩。馬上就出現了十六個詩人，各人依照自己愛好的調子寫他的詩；席呂塞爾堡變成了『詩府』。每個詩人都是那麼忙碌地敲出他的詩，住在下一層監房裏面的莫洛左夫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據他說，這種響法好像整個監牢都給鬼佔據了似的。我們中間最嚴肅的人也有了靈感來了。連帕坡夫和弗洛林柯，我們的那兩位實在

論者也各寫了一首詩。只有魯加雪維奇，雅諾維奇，阿新布倫勒爾和另外兩三個人沒有寫。我們寫了各種體的詩：離合體詩和十四行詩，短歌和抒情詩。潘克拉托夫在他的詩篇裏描寫了洛斯托甫。下層社會的生活，拿哥夫斯基在他的詩句中頌揚革命的旗幟和別的崇高的題材。有的人寫慷慨激昂的詩篇，有的人寫哀傷的輓歌，各人依照各人的興趣和才能寫詩。回憶成了大多數的題目，這種調子倒跟我們在最初幾年牢獄生活中所常有的抒情的心境很和諧。我現在不談這些詩的好壞問題；但有一件事倒是確定了的：寫詩減輕了我們的生活的痛苦，因為它給我們的幽閉多年的情緒找到了一條出路。在另一方面我們互相交換着誦讀友人的詩句，這樣也給我們的孤寂的生活中帶來一點變化和愉快，有時甚至於帶給我們極大的快樂。在一個人的生日或命名日，他或她有時候會收到令人感動的禮物，就像樂巴丁在九月十七日送給我的那樣：

「雖然活埋在這個兇殘可怕的墳墓裏，

我們的愛仍舊圍繞在你四周，接近而親密。

● 洛斯托甫是俄國東南部的一個城市，在頓河岸上。

雖然你被奪去了光明，失掉了住居，

分別了你的親人，然而朋友們在你的近旁。

你並不會喪失一切，

友情的溫語永爲你的伴侶。」

這種用紙的特權不但使我們能夠傾吐我們的感情，減輕我們的愁悶，它在另一方面（完全不同的方面）還替我們做了一件事。

在最初的三年裏面每個星期六我們每人都要受到一次全身的搜查。我們從來沒有藏過什麼東西；實在也沒有可以藏起來的東西，然而每到星期六那天我們還是要去受這種侮辱。男的囚人就由憲兵們粗暴地在身上搜查，我却被帶進一間空屋，那裏面有一個專爲搜查我來的女人在等着我。她把我身上穿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脫下來，從略微開着的門縫裏遞出去，交給走廊上的憲兵。起初這個職務是由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擔任的，這個婦人倒有點像妓院裏的老鴇，我在描寫我們席呂塞爾堡的生活的第一章中已經提說過了。她總是拿她的手從我的光裸的肩頭摸下來，把我全身都摸遍了，連我的耳朵和手指都摸到了。有一次另外換了一個年青的女人，從外表上看，她比較細一點。她穿一件時樣的黑絨

衣服，前胸掛了一條金鏈。督察長把我帶進屋子裏交給她的時候，他摸摸他的耳朵又摸摸他的嘴，說：「她是個聾子又是啞吧。」其實這是不用解說也容易明白的。這個女人顯然不慣於做這種事情，她露出了窘相。她臉都紅了。我就只見過她這一次。以後又換了一個人，她不是芬蘭人，就是愛沙尼亞人，也許還是一個廚娘，她沒有受過教育，很粗魯，出身農家，長了一對白眉毛。她老要搜查我的頭髮，用她那骯髒的手指將我的頭髮一股一股地搔着，把我的頭粗暴地搖來搖去，就像它是一個大木球似的。每次我都是含着眼淚走出去的。●

然而當我們這些詩人正在推敲詩體和韻腳的時候，工人馬爾地諾夫却用散文來表達他的思想。他按日寫着日記，等他把那一冊抄本寫滿了，他便將它交到督察長那裏去，督察長再把它送給警察總署。馬爾地諾夫在日記裏描寫了好些事，星期六的搜查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定描寫得很詳細，很生動。不知道是因為這個緣故，還是因為我們應該被搜查的時期已經過去，總之搜查的辦法是突然取消了。不過我們堅決地相信馬爾地諾夫的日記跟取消搜查的事大有關係。

● 我得說一句公道話：有一次督察長發覺我在哭，他問我有什麼苦惱。「這個女人太粗魯了，」我答道。「我會對她說的，」沙科羅夫短短地說，從那時候起她便不再拉我的頭髮了。——原註。

格拉切夫斯基

一八八七年秋天民意社執行委員會的同志M·F·格拉切夫斯基用一種殘酷的方法死去了。他的一生是一首完完全全的史詩。二十年前他還只十八歲，他便離開師範學校，出來做民衆學校的教員，他『懷着強烈的志願要做一點有益於農民的事情。』他辛苦地做了四年教員之後，又改行去做鐵路上的鎖匠，並且在他的同事們中間做起文化、教育的工作來；隨後他到聖彼得堡，在那裏加入了柴可夫斯基團。●這個團體要他到莫斯科去，在工人中間做宣傳社會主義的工作。他到了莫斯科不久，他的事情就敗露了，他被逮捕，在牢裏關了三年半才受審訊。在一八七八年審判終於舉行了，他被判處三個月的徒刑。可是格拉切夫斯基並未得到真正的自由。這年八月他毫無原因地又在阿德沙被捕了，未經

● 柴可夫斯基團是當時知識階級青年中間宣傳社會主義的團體。柴可夫斯基是一個重要團員的名字。

法庭審訊，便由第三處下令將他流放在阿堪遮斯克去。他充滿着精力和體力，自然不願意把他的生命消耗在流放生活中，他便設法逃走，可是他在中途迷了路，誤入北部的沼地，被人抓住，由憲兵們押送回阿堪遮斯克去。然而他在半路上又從車中跳下來，躲在森林裏面，經歷過各種的驚險，終於遇到了一些在流放中的同志們；他們把他隱藏了一些時候，後來他便動身到彼得堡去。那時民意社已經組織起來了。有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很成熟的格拉切夫斯基便加入了這個革命團體。一八八〇年我們的第一家印刷局被警察破獲了，格拉切夫斯基便接受委托來另外創辦一所。

格拉切夫斯基後來做了民意社執行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以後，他更用全力從事黨的工作。在一八八二年，那時民意社中留下的黨員已經不多了，格拉切夫斯基還成立了一個實驗室再來製造炸彈。他身兼管理者和工作者兩個職務。當時他弄到了一張假護照，他相信自己非常安全，卻不知道警察已經在暗中尾隨着他以及跟他有來往的每一個人了。

結果在七月裏格拉切夫斯基和所有在實驗室裏工作的同志同時被捕了。格拉切夫

● 這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民意社黨員暗殺的日子。關於這事本書第一卷中有詳細的敘述。

斯基認為他的同志們的災禍是他一個人造成的，這種想法使他非常痛苦。在他那信仰堅強的革命者和恐怖主義者的嚴厲冷酷的外表下面隱藏着一顆熱烈的心。他現在不能夠繼續做黨的工作了，他便把他的愛專注在同志們身上，因此他看見這些受難的青年人在等着被判重刑，他十分難過。這種心情決定了他在法庭上的態度：他毫無懼怕地把一切責任全拉到他一個人的肩上，甘願由此判處死刑，同時他還盡力為受審的同志們開脫。

一八八三年他在審訊終結時當庭的發表演說中說：

「我只要求一點：至少把我的精神上的痛苦減去一部分吧，這十個月來我一直感受到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它比起最厲害的肉體上的痛苦來，還要強過若干倍。實驗室是我一個人辦起來的，沒有別人參加這個工作；我是實驗室的，而且是唯一的罪人，因此要求讓我一個人接受全部的處罰。」

格拉切夫斯基把他這種道德上引咎的重擔一直挑到他的活葬墓裏去。他被判死刑，然而又被減為終身懲役罪。他起初給關在亞歷克賽半月堡裏，後來再轉到席呂塞爾堡來。

亞歷克賽半月堡中的生活對於格拉切夫斯基簡直是慢性的死亡。那個監牢就是一間死屋。在那兒是不會有抗議的。格拉切夫斯基的聲音再也聽不到了。

因此他給監禁在席呂塞爾堡的三年中間，他總是不斷地跟督察長沙科羅夫鬥爭。好像是這樣的情形：要是他那引咎自責的痛苦減輕了一點，他還可以忽略或忍受許多事情。然而他身心兩方面受的打擊很大，完全失去了平衡，他的神經系已經擴張到最外的境界線上了。除開席呂塞爾堡和亞歷克賽半月堡的囚人所身受的精神和物質的苦痛外，這裏還有一種最厲害的刑罰：靜寂。不錯，靜寂，在這裏整個地方都讓靜寂統治着……獄規上規定着得保持這種靜寂。靜寂是監獄管理方法上最完滿的成就。監獄裏不論日夜都應該是毫無生氣，它得像墳墓裏那樣死寂。這裏唯一的不可避免的響聲就是沈重的鐵門的開關聲和遞送食物時滑溜的關閉聲。門門的聲音低沈地響着，叫人記起住在這個建築物裏面的不單是我們這少數的囚人……此外就沒有一點聲音了。

在自由的世界中靜寂是那班神經衰弱的人的難得的幸福，對於受着刺激的神經，它正是一付非常靈驗的藥。然而這種永遠的靜寂，這種沒有終結的死一樣的靜寂卻是很可怕的。再沒有比這個更有效的損害神經的方法了。這種連續不斷永遠存在的安靜損壞了

我們的聽覺；我們的聽覺會越來越精細越銳敏，到後來稍微一點雜音它都忍受不了。許多人已經開始現出了病象，他們一聽見雜音就不由自主地發出叫喊來，而且還有一種奇怪的現象：響聲越是細微越是平常，反動越強。連最細微的雜音都會引起抽泣，要是聲音定期地反覆重響，那麼痛苦更是不能忍受的了。

在夜間這種細微的雜音也會使人失眠，並且刺激人的神經很深，使人完全失去自制的力量，只想叫喊，只想打人，爲着終止肉體的痛苦。並且還有憲兵們故意弄出一切聲音來折磨囚人。那些特別害怕聽某一些聲音的人更倒楣！而不能忍耐容易發脾氣的人還要糟。要是誰因爲這個緣故開始認真地跟獄方鬥爭，他結果一定會毀滅。囚人越是激烈，越是堅強，他越難中止這種鬥爭。他會戰鬥下去；他要申說，要抗議，要辱罵，要叫喊。而且這些一旦開始，就會重複不已，不會只是一次，會到千百次的。鬧了一次又會鬧第二次，第三次的。最後發展到了極點，於是痛苦、憤怒、反抗都集了在一塊兒，使得囚人只有一個念頭：當面侮辱敵人，然後死去。

這種鬥爭的幾個步驟格拉切夫斯基一地全經歷過了。他不斷地抗議，他決不放過每個可以抗議的機會。他每天都要跟憲兵和督察長沙科羅夫起衝突。

格拉切夫斯基的監房是在下面的一層；在他的監房下面便是堆積木柴和煤炭的地窖。整個監獄都是由這裏生火取暖的。不論是白天或夜晚都有聲音，人來人去，生火，到處丟柴。這種鬧聲不過是一串數不清的痛苦的鬧端。加之，他正害着失眠症，服着水化氫醇；早晨他總是在床上躺很久。然而在被單下面靜靜不動地躺着，這在監牢裏是不許可的，這樣會驚動了憲兵。……或許他死了吧？再不然他逃走了吧？他們時不時地偷偷走到門口，推回滑窗前的窗栓，朝監房裏看了一下，又把窗栓弄得發出大的響聲。……他們清清楚楚地知道這樣會使囚人的銳敏的聽覺發生很大的反應。而實際上這種響聲對所有的人都是一種痛苦，並且使得許多神經衰弱的人因而發狂。格拉切夫斯基的情形也是這樣。並且還不只是這樣。格拉切夫斯基每次向要塞司令官發過了牢騷以後，督察長沙科羅夫總要用千倍的報復手段來對付他。

一八八六年三月監牢裏有兩個囚人病得很厲害，這是聶馬羅夫斯基和黑立斯。我們清清楚楚地聽見了他們的呻喚聲。憲兵們發覺垂死的病人的痛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便決定把他們搬到老監裏去。然而老監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可厭又可怕的地方。那裏整個的設計佈置都是比較我們住的新監加倍地陰暗，可怕，可疑的。我們在新監裏面，雖然是分開

監禁的，可是大家都在一處。單獨地死去，不在我們大家住的同一個建築物裏面……死在那兒，死在老監裏，在我們看來比較死在這兒，死在我們的近旁更加可怕。

病態的幻想引起了垂危的病人的憤世嫉俗的態度。我們在這兒固然寂寞、孤獨，可是在那兒還更是孤單淒涼。我們的病人要求我們讓人把他們活着抬到墓地去。然而他們終於被帶走了，聶馬羅夫斯基自己走下去。黑立斯是給人抬走的。他們把他放在一張帆布上面，在病人的呻喚聲和其他的囚人們一致的叫喊聲中抬走了他……格拉切夫斯基發動抗議。他叫人把司令官請了來，告發了督察長。督察長替自己辯護說病人驚擾了整個監獄，所以把他們搬開。可是抗議也生了效，至少黑立斯給抬回來了。然而聶馬羅夫斯基在四月初死在老監裏面。

沙科羅夫夫把怨恨藏在心裏，他便在極小的地方對格拉切夫斯基報仇。譬如他發覺格拉切夫斯基連一點微小的鬧聲也受不了，他便故意不斷地做出這種聲音，一直到他達到了目的為止。格拉切夫斯基給弄得連一點自制力也沒有了。因此他接連不斷地跟督察長發生衝突，在這長期的鬥爭中他完全受着那個人的專橫和粗暴的控制。不久他放棄了散

● 席呂塞爾堡原先是一個要塞，所以它的最高的長官是司令官。

步的權利，不久他又開始了絕食。一八八六年十月他絕食了十八天（根據另一個報告，應該是二十八天），沙科羅夫爲了不使其他的囚人們知道這事情起見，他用了最狡猾的方法把格拉切夫斯基搬到老監去了。

格拉切夫斯基在老監裏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書遞給內務大臣脫爾斯道伯爵。他詳細地描寫着席呂塞爾堡和亞歷克賽半月堡中囚人們所身受的一切。他堅決地相信他這次的揭發會產生一些改良監獄制度和改善囚人生活的措施。

不用說，這只是一個幻想。並且這份報告書究竟送到內務大臣那兒沒有，還是一個問題。可是它的直接的結果，卻是他們馬上把紙、筆、墨水、書籍甚至藥都給他拿走了。時間慢慢地過去了，格拉切夫斯基又決定了新的計畫，要是他的報告書沒有結果的話，他要用別的方法逼着當局實施改革。

一八八七年五月裏有許多同志給關進懲戒室裏去了。格拉切夫斯基便敲壁告訴他的鄰人說：「我不能忍受下去了，我要發狂了……明天我要打醫生的耳光。」

懇求和勸告都沒有用。第二天早晨他實行了他的計畫，打了查爾刻維奇醫生的臉頰，這醫生是一個卑怯的人，督察長在監牢裏幹的那些可怕的虐待囚人的事情都是由他說

法掩蓋了的。

格拉切夫斯基立刻把這件事情告訴他的鄰人，並且添加說他用這種方法逼着當局舉行軍法會審，他可以當庭揭發獄中的黑暗情形。然而當局並不想判處他死刑，只想慢慢地磨死他。他又被他們關到老監裏去了，在那兒等候他們的處罰。幾個月過去了，他所期待的審訊並沒有舉行。他對自己所計劃的那一類行動方法完全絕了望，他也明白他不能再期望什麼公開的審判了，（他們藉口說他的神經失常，不給他這種特權，）然而他還是抱定宗旨要用任何手段和任何代價將他和他的同志們所身受的一切痛苦和虐待揭露出來。他實行了一個他早已想好了的計劃，在一八八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他把監房裏那盞大燈中的火油倒了一身，活活地燒死了自己。

這一幕可以跟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殘酷相比的大慘劇發生了。它是在十九世紀中發生的，發生的地方離一個文明國家的帝都不過五十基羅米突的光景……那個地方跟全世界完全隔開了，沒有一個囚人能夠把他的抗議的聲音叫出來，讓外面的人聽見。在那兒密拉科夫死了，他是給人槍斃了的。他發動了抗議，逼着獄方給了他一次審判。他相信藉着審判可以訴於國內輿論，他希望能夠公開發表他的意見……麥秀根的情形也是一樣。他

也給人槍決了。他也發動過抗議，爲着想受一次軍法會審，把監獄中的黑暗和囚人所遭受的殘酷的待遇當庭揭發。

格拉切夫斯基也是這樣地死去……他燒死了自己。他也會抗議過，他也會要求過一次審判……他願意付出任何的代價換得一次公審。

然而他的努力並沒有用……他在這個歷史上的老監獄席呂塞爾堡中墓道的圍牆裏面點燃了一根不祥的活人的火把。他關在那兒，跟我們大家全隔開了：那是一個大的房間，跟從前宗教裁判官們的會議廳一樣。一排陰暗的，鎖牢了的門，死死地一動也不動，好像它們給人決定了永不打開似的。陰暗而潮濕。在這空闊的背景裏憲兵們的陰沈的臉貌顯得古怪可怕。他們就像是劊子手，又好像那個被人收買到倫敦塔中行刺的兇手……靜得很，死一般的靜寂……突然發生了騷動，驚擾。一切都活動了，震動了。警鐘的聲音已經狂亂地響了起來。

門沒有動，是鎖住了的……他的門鎖牢了，鑰匙不在那兒。門後面昂然立着一個瘦長的身子，帶着一副活屍般的枯瘦面孔。他挺直地站在那裏，在煙霧和火焰當中越來越看不

● 指暗殺英國幼王愛德華五世和他兄弟的兇手。

清楚了。火帶着亮紅的火舌從四面八方包圍了他。這根火把，它燃着，冒着煙；這根火把是一個活的東西；是一個人！

沙科羅夫終於邁着沈重的，急速的步子走來了。他痠攣地捏緊着那串鑰匙。臉上的表情顯出了非常的激動。他用熟練的手開了鎖。門打開了。房間裏充滿了煙和火。一個人站在那兒……完全給煙霧和火焰包圍了……還有火油的氣味和東西燒焦的氣味……慘劇完成了。在煙霧與火雲的中間一個人的知覺喪失了……幾聲呻吟……含糊的、窒息的呻吟……於是人死了。

三天以後柏特洛夫將軍到席呂塞爾堡來視察，這以後不久沙科羅夫督察長就不見了；他是因了『玩忽職守』的罪名被撤職的。格拉切夫斯基的犧牲結了菓實，我們的監獄生活裏有了一個改變了……死了的人不能復活，可是活着的人卻呼吸得較為暢快了。席呂塞爾堡仍舊存在，然而馬柳塔·司庫拉托夫卻去了。

沙科羅夫是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去職的。他走了以後整整有半年中間沒有新的督察長來接事。他的職務暫時由一個憲兵隊的軍官代管着。後來在一八八八年四月新督察長

費多洛夫來了。我們漸漸地才知道他是個討厭的老頭兒，不過他不兇，他講究手續，注重紀律，卻又喜歡搬弄是非。在他的管理下面，我們的抗議算是達到了目的了，我又可以跟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見面了。現在所有的同志們全得到了這個權利，共同散步已經是條規上載明了的的一種權利了。

同盟絕食

我給關過懲戒室以後又過去了兩年。在這兩年中間許多的日子都是平淡、單調、灰暗無光的，我已經記不起它們來了。自然也有一些日子裏面我的心靈在苦苦地掙扎，它激盪得厲害；還有一些別的日子，在那時候我的心十分悵鬱，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也有種種的跟獄方的衝突和一些牢獄生活的多多少少顯著的事實。可是別的我都略去了，現在我只敘述一段我們用絕食十天的方法來表示我們的集體抗議的故事。

我們的監獄跟一切的國家機關一樣，也得經過定期的視察。這種視察向例是每年兩次，每次都會使我們大受驚擾。在我們所處的單調的環境中凡是破壞我們這種呆板的每日常務的任何辦法或舉動都使我們感到難堪，每一件破壞獄中生活的常規的事情，都使人感到痛苦的刺戟；我們緊張、不安、頭痛，好久都不能恢復鎮定。監房的門會一道一道地陸

續打開，許多人的脚步聲會在走廊上嘈雜地響起來，於是人聲喧鬧成一片。原來他們正走進你的監房來了。他們是一大堆人，讓憲兵們護衛着，都是些陌生的不能接近的人，有時候很冷淡，有時候又帶着厭惡的樣子，然而却總是完全不能了解我們的。他們問過一些話，有的也許會笨拙地觸到了我們心靈中的創傷。這是一種叫人討厭的官方的問話，我們只能匆忙地糊里糊塗地回答個『是』字或者『不』字；而憲兵們則排在那位貴人的兩旁，兩眼直瞪着你，好像你是一隻野獸，會傷害到尊貴的來客，需要他們隨時準備着用他們的胸膛去保護他似的……後來他們走了——然而那個囚人還是激動不安，他的生活的常規讓人破壞了，他銳敏地感到自己是一個俘虜，他不停地在監房裏踱來踱去，只想恢復自己的安靜。

啊，那些參觀！那種視察！那種打擾！並且就跟每個國家機關的情形一樣，在視察之前，監獄的官員們就從一個肯幫忙的朋友那裏得到祕密的通知，在頭幾年他們還守着祕密，只是暗中準備着視察大員的降臨，可是後來他們却更公開地佈置一切了。

在一八八九年的秋天督察長費多洛夫就得着這類的警告，他便到各個監房去巡視了一通，吩咐我們每個人要小心，不得把額外的圖書放在顯眼的地方；要不是把它們還回

給圖書館，就得藏起它們來。他所謂額外的圖書就是指我們關進席呂塞爾堡時隨身帶來的書，那些書經過我們多次的要求監獄圖書館才答應收藏了，大概並沒有先將書單送給聖彼得堡上峯去審查過。他的勸告倒是好的，我們都遵從了，就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警察總署署長杜爾諾渥從容地到每個監房裏看過了。他走進了二十八號的監房，那是賽爾該·伊凡諾夫住的地方。在那放下來睡箱^①上躺着一本書。杜爾諾渥拾起它來。「哼！哼！」他不高興地哼道。這是米涅^②的法國革命史。他們走出這個監房以後，他對督察長表示他的驚訝，說他想不到怎麼會讓這種書在監牢裏傳誦。隨後他就下令檢查圖書館的書目，凡是跟囚人的政治與社會的見解多少有關的書籍一律拿開。這樣被拿開的書一共有三十五部，都是我們這個小小圖書館中最好的書，我們的心智方面的活動就是單單靠着他們來供給的。那些書是瑪特立^③的荷蘭共和國建國史（二卷）；傑微拿斯^④的

① Durnovo 在一九〇五—六六年間做了內務大臣，他用了殘酷的武力鎮壓的方法摧毀了當時的革命運動。他後來還是被恐怖主義者暗殺了。——英譯者。

② 白天放下作椅，夜晚拉起做床的木箱。

③ 米涅 (F. Mignet, 1796—1884) 法國歷史家。法國革命史共二卷，出版於一八二四年。

十九世紀史（五卷）斯賓塞^①的社會學原理和社會靜學；莫茲立^②的身與心（英文）林肯傳一冊；美國內戰史一冊；皮沙列夫^③的著作（一卷）還有別的著作。這些都是我們帶進監裏來的書，而且是我们看得最寶貴的。然而這些已經得到認可的圖書現在又遭擯斥了，並且不許我們親近了。他們奪去了我們唯一的精神的財產，誰又能夠給我們保證在這第一次的劫奪之後不會接連地發生第二次、第三次的事情呢？這是一個精神上的災禍，把整個監獄都驚動，擾亂了。

在這件事發生以前不多久，有幾個特別渴想跟別的同伴談話的同志發見了監房中的水管並不是每根單獨的，却是互相連結，只有在四個地方是隔開了的。因此在管子空着

① J. L. Motley (1814—1877) 美國歷史學家。荷蘭共和國建國史出版於一八五六年。

② G. G. Gervinus (1805—1871) 德國歷史學家。

③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英國哲學家。社會靜學出版於一八五一年；社會學原理共三卷於一八七六—一八八二—一八九六年分期刊行。

④ H. Maudsley (1835—1918) 英國精神病研究者，身與心出版於一八七〇年。

⑤ D. I. Pisarev (1841—1868) 俄國虛無主義（極端的唯物論）的文學批評家。

的時候，每一部分監房的囚人都可以和同一部分監房的囚人們互相通話，就跟在聖彼得堡拘留所中的情形一樣。爲了便於傳達消息起見，我們分別成立了四組。所以當我們的書籍被搜去的時候，我們便可以大家一塊兒來討論這個問題了。各組敲着監房內靠走廊的牆壁互通消息，這是一種極不完備的談話方法，不過當時在費多洛夫管理下面，敲壁已經不再是應去受處罰的犯罪行爲了。等到大家全知道這些書籍被拿走以後，我們便商量着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付辦法。全體一致認爲對這件事不來一個抗議是不行的。圖書館中本來就沒有幾本書，我們又不能夠再得到新書；現在他們却把我們有的寥寥幾本書裏面那些最寶貴的拿走了。要是我們默默地不作聲，難道他們不會再把別的也給我們搶走嗎？

有幾個人提出我們用拒絕戶外散步的辦法表示抗議。自然，坐在自己的監房裏面，並不是一件困難事情；可是誰會注意到這個呢？命令是警察總署署長下的，但警察總署就一定不會注意到這上面來。放棄我們的散步的權利，失去呼吸新鮮空氣（雖然每天就只有這麼短短的一個鐘點）的可能性！永遠關在監房裏面，用這種磨折自己的方法消耗生命，後來便會明白這種辦法毫無用處，終於不會達到目的，又慢慢地走出監房來！不！我們還是採用消極的抗議吧，不過不要是太長期的，而且要較爲嚴重的，——別的人和我都特別堅

持地這樣說；我們提議全體一致不進飲食，並且這不只是三四天的事情，我們要絕食到死。我們甚至設想到這事的結果不僅會使一個人犧牲，而且會有幾個人因此死去；但是我們應該保衛我們看書的權利，那些書是唯一的使我們的生活有點快樂和希望的東西。

因此現在就有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了。多數的人（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和她的鄰人們也都在裏面）都主張拒絕參加戶外運動。少數的人却相信這種辦法是不澈底的，堅持着要來一次全體絕食。我是在這少數人裏面。這樣一來，顯然是不能夠得到一個全體一致的決定了，我們這少數派一共只有五個人，我們却不顧多數人的意見，決定開始單獨絕食。我們實行了。這次我們犯了一個大錯。只有在好些年以後（在一九〇一年卡爾帕維奇絕食的時候，）我纔明白我們所做的這件事情的完全的意義。我後來纔知道我們的決定是難實行的，而且是不公平的。倘使別的同志們並不同情這種抗議而且不肯參加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單獨由個人或一個小集團來發動這抗議。實際的情形總是這樣：同盟絕食繼續下去的時候，別的人一定會被拖進去參加的，而且並不是出於他們的自願的。任是什麼人，只要一想到就在他或她旁邊，有些同志爲着某一個目的而實行絕食，他或她一定忍受不了。不管他或她願意不願意，遲早會被自己的同志感情和同情逼迫着去參加。

這個抗議的。可是我們却不能期望由這些動機來推動的抗議會支持長久。然而據我看來，同盟絕食並不是可以輕易實行的，要是實行了，就得用決心和毅力使它堅持到底。自然誰也不會故意違反別人的意志，單用他們對於絕食者的同情做個托辭，就把他們拖到死亡裏去；而暫時的支持和最後的退出却會招致全盤失敗的結局。

不幸，當時我一點兒也沒有想到這一點，我完全不注意其餘的同志們的感情和思想，我反而因為他們不贊成我們的意見就生他們的氣。我認爲他們不同意我們的計劃只是由於他們的軟弱，我不高興他們那種保全自己的精神。我想道：「他們不肯拿他們的生命冒險，可是人總得冒險，這是值得的！」

我們行動的結果很不利，尤其是對於我。我們的同盟絕食一開始，所有先前反對我們這種主張的人全都馬上加入了。我們後來才知道他們已經在暗中決定了這樣一個辦法：他們盡全力阻止我們實行我們的計畫，然而要是我們堅持實行絕食的話，他們便參加我們的行動。我們隨便地決定了：茶是可以喝的，不過不放糖；並且女人比男人遲兩天實行絕食。差不多全監獄的囚人一致參加這個抗議。沒有加入的人只有這幾個：樂巴丁，他從未參加過我們的抗議，並且他在一般的原則上就不贊成用聯合行動支持任何計畫的辦法，他

認爲這種辦法在監牢裏是辦不到的，安托諾夫，他只相信積極的抗議，阿新布倫勒爾，他坦白地承認他害怕他不能堅持到底，瓦西里·伊凡諾夫和滿除洛夫，他們不贊成同盟絕食，不肯公開參加。（他們兩人假裝吃東西，却把食物倒了在便所裏面。他們担心自己不能夠支持到最後，一旦放棄絕食，這種近似叛離的舉動會損害了公共的事情。）

我們這一組的幾個人：尤可夫斯基，帕坡夫，馬爾地諾夫，斯塔洛得伏爾斯基和我，我們整天躺在睡箱上，差不多不講一句話。然而在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的一組裏面，他們却時時講話，互相詢問各人的感覺怎樣。幾天以後他們中間有一個人頭發昏，另一個人不能夠站立；布清斯基吐起血來，荒謬的是他們請獄醫那利席金給他看病。獄醫很有理由地回答說，醫生沒法治療那些絕食自殺的人，他不肯去診病。

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們實行絕食的第九天。不久布清斯基的一個鄰人便提議終止絕食，他的提議被監獄東北部的囚人的大多數接受了。帕坡夫告訴我這個消息，他還說，因爲這是大多數人的決定，他要遵守它，不打算繼續絕食了。馬爾地諾夫是一個強壯、健康的人。可是他一點也經不起考驗，他在第三天就進食了。我當時非常嚴正，一生氣就跟他絕了交。斯塔洛得伏爾斯基說過他要死得像辛尼加。那樣，他割開自己的動脈自殺，却做得很笨。

拙。憲兵們注意到了他在做什麼事，就把他送到老監去，他給他們關在那兒以後，據他自己後來講，他感到一種強烈的求生的慾望，他沒法抵抗它，只得吃一點東西。這樣一來就只剩下尤可夫斯基跟我兩人了。他敲壁傳話給我說，他願意照我的做法做，我回答他道，我的習慣是這樣：我自己發動的事我總要做到底，我不以為我自己應該受大多數人的意見的拘束，我要繼續抗議下去。

我的同志們的退縮給了我一個大的打擊。不用說，被人離棄的孤立的感覺使我痛苦。然而使我尤其苦痛難堪的却是另一件事。五年以前我給關進這個監獄裏時，我心目中就有一個理想的革命黨人的概念，對革命黨人尤其對革命黨人的團結精神我都有了一個理想的目標。我的這個「革命黨人永不遲疑永不退縮」的概念還是熱利亞博夫、弗洛林科和執行委員會的其他委員給我打下基礎的。而民意社執行委員會的絕對的團結一

● 辛尼加 (Lucius Annaeus Seneca) 羅馬政治家和哲學家，大約生在紀元前四年，在紀元後六五年，奉尼羅王命，自殺。

● A. Zhelezov (1877—1881) 民意社執行委員會委員，因參加三月一日事件被判死刑，同年四月三日受絞刑。

致又給了我一個革命黨的共同意志的觀念。可是現在我却不得不放棄這些概念了。考驗來了，它完全摧毀了我的精神。

我周圍的全是革命黨人，他們說過，表明過準備死的決心。他們說起過犧牲，說起過抗議到底的話。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他們是不是真心說的？他們在騙自己，還是他們想騙別人？那麼他們想騙誰呢？是獄官們嗎？因為我們敲着管子談話的時候，敲聲是很容易聽見的，憲兵們會把我們的全部談話向獄官報告。或者這些談論是一種口頭示威故意用來恐嚇禁子們的嗎？難道它們真是空洞的威脅，難道那些說話的人明明知道不會有人去死，不會有人拿生命為這次抗議冒險嗎？然而為什麼我的同志們當時不給我一個警告呢？倘使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幕趣劇，那麼一個革命黨人還值得去幹它嗎？革命黨人不應當背信，就是對待敵人也不應該。在另一方面倘使他們的話，他們的用意是認真的，那麼他們的退縮便是他們的軟弱的表現，他們沒有勇氣去完成他們已經開頭的事情。然而我的同志們却是有毅力有決心的人，而且是俄國裏面最強的人。要不然，他們在自由的時候在他們來到這個石頭墳墓之前，決不會做出那些事情來。不錯，他們是強壯的人，並且應當是強壯的。然而，他們話倒說過了，他們却並沒有照自己的話做去。

這是一個極大的幻滅，它使我充滿了不能控制的憤怒。我心上起了不公道的、怨恨的猜疑，我好像對每個人都憎恨。我的同志們，他們是我生活裏殘留着的唯一的親近的人，可以說是唯一的東西；現在他們出賣了自己以後，在我看來他們好像是一些陌生了。我會經相信過他們，相信過他們的堅定，相信過他們的不屈不撓的意志；我現在才看出來在我面前的並不是我所想像的那個牢固地結合起來的羣體，却只是一些游移不定的個人，他們軟弱，不堅定，並且跟常人一般地準備着隨時放棄共同的目的。我的整個心靈都讓這些思想折磨着而且破碎了。我的絕食已經繼續了好些日子，而我那堅持到底的決心也跟着一天天地增強了。在經歷過了那一切的事情以後，我覺得死還比較活着容易。我整個身心都在渴望着死。是的，我要絕食至死。我要把這件事已經做起了頭的工作一直做到最後。讓「他們」拋棄他們的目的，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可是我要實行我決定了的主張，達到我要求的目的！

我已經跨過了那一道界線，（走出了這界線堅定的意志便不能再回頭了，）我已經準備好了拋棄這生活，擺脫這個可憐的、屈辱的、短暫的生存，然而在那時候，我這一班同志中間有兩個人又給了我一個新的打擊。

一個有着自主自制的力量的人，他對自己所做的事又有充分的認識，他既然決定了做一件事，要是有人去干涉他，阻止他表白他的堅決的意志並且逼他屈服讓步，那麼對他再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侮辱了。這種干涉，這種對於一個人的力量的損害無異於對這個人的精神的完整的侵害，對他那天賦的決定他自己的行爲，表示他自己的個性，創造他自己的生活形態等等的權利的侵害。現在我的同志們侵犯了我的這個決定，損害了我的意志。

尤可夫斯基跟我已經又單獨絕食了兩天了，然而帕坡夫，和斯塔洛得伏爾斯基兩個人，事先並沒有商量過，却分別地先後通知我，倘使我因絕食死去，他們也要自殺。這是道德上的要挾，它激怒了我。想想看！這兩個人事前是贊成我的主張的，可是事後並不先徵求我的意見就背棄了我們的共同目標，現在居然敢來要求我做那同樣的事。他們的男性的虛榮不能容忍一個女人表現得比他們更堅定，而且更有恆心。他們自己不好意思，把我拉下來，拉到他們的水平線上，他們自己不願意死。所以他們強迫我活着！我也許應當嘲笑他們的這種表白，應當不相信它，可是他們的話裏却有着使我不得不相信它的地方。對這兩個剛纔還表示過他們珍重自己的生命願意活下去的人，我真的能夠把他們領到死亡的路上去嗎？不，我不能夠違背他們自己的意志把他們拖到墳墓裏去。我不願意叫他們不是

爲着共同的目標，却單單因爲我一個人的緣故死去。

於是我停止了絕食，然而我是懷着萬分絕望的心情去做的。從這時候起我中斷了我跟整個監獄的精神上的連繫，我自己立下一個莊嚴的誓願，我把這個誓願通知了我的同志們，我說：從現在起我與他們的團體完全脫離關係；我不再參加任何集體的抗議；我倘使要抗議，一定由我自己發動，單獨地抗議，因爲我們這次同盟絕食使我明白了連兩個真正同心同意的人也沒有。以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決定我自己的行動，決定我自己的做法。

若拿積極的結果來說，我們這次的同盟絕食自然是失敗了的，監獄當局並沒有因此感到絲毫的驚擾；那些書也沒有發還給我們。絕食反而多給我們帶來一重壓迫。我還在絕食的時候，有一天司令官多布洛節也夫（我記得他只做了一個月光景的司令官，就給調走了）來視察監房。他宣讀了一道命令說，我們每個人當初關進要塞裏的時候身邊帶的錢全數沒收，當由我們的親屬去領回。●可是在絕食的事發生以前不多幾時，我們已經得到允許可用這筆小款來充實我們圖書館。這事情是部分地辦到了；莫洛左夫訂購了一部鄒英野的卷帙浩繁的世界大地理。●我們其餘的人却没有利用過這個機會，現在我們完全丟掉這機會了。

我們監獄歷史的這一章就這樣地結束了，我不能忘記：它給我們大家帶來了這許多的痛苦，它還把我放在滅亡的邊緣上。我所經歷的道德上的災禍把我在絕食等死的期間中所保持着的沈默和平靜破壞了。我整個的內心都給震動了，一直到好些年以後我的精神纔恢復了原狀。可是我這一段經歷的記憶與後果在今天還是很鮮明的。

在我不吃食物的那九天中間，我一點也沒有感到饑餓的苦。我那班身體比我的強壯，神經比我的健全的同志們在絕食的第二天第三天中所感受的痛苦我完全不會感到。那個強壯結實的馬爾地諾夫連三天也支持不了。相反的，我絲毫沒有想吃東西的欲望，我也看不出我自己的感覺有什麼變態的地方。我平和地躺在睡箱上讀書。我的頭腦非常清楚，我高高興興地讀着法文原本的莫理哀戲劇；我讀着，覺得阿爾巴公和他跟廚子的談話好笑，可是鞋匠變為紳士這個戲特別使我開心。只有後來我才漸漸地感覺到自己身體的

● 事實上歐子並未發還給我們的家園——原註。

● 那可侶 (Elise Reclus, 1830—1905) 法國地理學家，著有人與地，地與人，世界大地理，及進化與革命等書。

● 法國劇作家莫理哀 (Moliere, 1622—1673) 的名劇財狂中的男主角。

虛弱，到了第九天以後，我一走動時，眼前立刻發黑，這是一般在床上躺久了的的人的通常的情形。所以我堅持我繼續絕食的決心，事實上用不着多大的努力，也不需要任何忍耐力。在這方面我的處境比較我那些有着不同的心境的老志們容易得多。我之所以完全感覺不到身體的痛苦，也許是一部分由於我在絕食的開始就抱了安靜的堅定的決心。可是我的身體雖然經過了這次真正絕食的大試驗並沒有失敗，但是那餘威却是很可怕的。除了精神沮喪意氣銷沈外，我的整個神經系統全給破壞了；每個控制的中心都失了作用。在好些方面我的意志力似乎並沒有減弱，可是它却完全消失了。我對於聲音的反應以前就是很銳敏的，現在却是叫人不能相信地越發厲害了。從前每一個意外的響聲都會使我激動地戰抖起來，現在我一聽見那聲音就會不由自主地大叫，再後來我甚至會抽泣，使得整個監獄都給我的嗚咽聲擾亂了；最糟的是我自己一點兒也不想止住它們。要不是我無意間聽見了樂巴丁對別人講到我的那句話（我在本書這一卷的第二章中提起過，）我不知道這種紊亂狀態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樂巴丁的話使我的精神更新了。

一個社會的義務！一個社會的使命！難道在這兒，在生活的界線以外，仍然能夠有一個我可以擔任的使命嗎？難道我真的是別人所需要的，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和我朋友們的嗎？

我以前相信社會躲避我，生活不要我，把我趕了出來。難道真的還可能有什麼給我生存的理由嗎？

我從前說過，我覺得我的社會的工作完結了，我扮的脚色也已經演到最後一句話和最後一個動作了。在我還沒有被捕入獄的時候，我總認為我所擔任的職務是不重要的，我從來不會想到會有人記着我們的姓名。我覺得我們距離我們所希望的目標仍舊非常遠，因此我們很可以把我們生活的這個時期看作只是一個（譬如說吧）地質學上的很早的時期，而我們民意社的社員們也可以比作那些微生物，那些極小的有孔蟲類，牠們一天天地一年一年地陸續死去，沈到海底，經過了千萬年之後，用它們的屍骨構成了巨大的石灰岩的地層。一個單獨的微生物是肉眼所看不見的，細小易脆的甲殼是渺小不足道的，可是整個的羣體，石灰岩的地層却是強大的，它構成了整匹的山。

我反覆地思索着我無意間聽到的那句話，我開始感覺到，我開始相信對於我們獄牆外面的一切我還沒有完全死去；現在獄牆好像裂開了，我的眼睛注視着遠方，望着我從前曾經在過的遠方，爲着它的緣故我應當保持着一個相當的高度。

母親的 祝福

在我所寶貴的物件中間，有一座廉價的小磁像。這是在我的審訊完畢後我們母女分別之前我母親拿來祝福我的。我最愛這座像，我小心翼翼地收檢着它，看得比我的任何東西都貴重。他們也沒有把它給我拿走；我帶它到席呂塞爾堡來了，就是現在我還是一樣地寶貝它。這像的一面有一個刻得很精巧的人像跪在所謂上帝母親的面前，另一面刻着一行字：「意外的快樂之聖處女。」

我母親在祝福我的時候，她說：「也許有時候連你也會了解一種意外的快樂的。」

在我們母女分別之前我母親對我說這句話（不是別的話，就是這一句）的時候，她心裏想的究竟是什麼呢？她指的是我的運氣的轉變，指的是我跟她再見的快樂嗎？或者她想用她的祝福的話來激勵我，鼓舞我嗎？再不然她想使我明白，不管生命怎樣殘酷地被人

摧殘了，生活也不能沒有快樂嗎？

歲月一年一年地過去了，然而快樂，重見母親的快樂始終沒有來。我漸漸地離開了「現在」越離越遠，我不再朝前面看，卻只是回顧「過去」在這些時候我總是想在我們牢獄生活的大小事情中找出母親的祝福的一個應驗，我身邊那座小磁像使我常常想起我母親的祝福來。難道在席呂塞爾堡裏面還有快樂嗎？是有的。確的，要是這兒沒有一點快樂，我們還能夠忍受下去活到今天嗎？最初的幾年是一個初進監牢的人的最大難關，那幾年中間我們唯一的快樂就是跟同志們「交際」用敲壁的方法默默地互相問好；用敲壁的方法傳誦彼此的詩；慶祝彼此的生日和命名日；在紙條上寫幾句關切的話偷偷夾在書裏面，藉此傳遞——所有這些事都使我們多麼激動，多麼高興！然而這些快樂裏面總含着一點痛苦，含着什麼叫人掉眼淚的東西。在我們應該忘記的時候，它們却喚起了我們的回憶來……幾月過去了，又給我帶來一些別的，純粹的快樂。

這一類快樂的第一樁便是一份報紙——一張報紙。有一個時期那個有歷史性質的老監中的小工場全是由一個身材高高的漂亮的軍官管理着的，我們通常在那些小工場裏作工，想用鐵鎚和粗鎚的聲音，驅散我們這班默默地在這兒消耗了生命的人的單調，完

長的回憶。有一天我們正在作工的時候，那個軍官來了，他手裏拿着一張報紙，他讀完報以後，就把它放下來，也許他並不是無意地留下報來的，或者他想，誰要這張報，經過那兒時，只要沒有給人看見，就可以把它收檢起來帶走的吧。果然是這樣的情形，報紙從一個人的手傳到另一個人的手中，輾轉地傳遍了整個監獄。

坐在『弗南號』上駛向北極，在不動的冰山叢中快凍僵了的南森，或者穿過中非洲處女森林記錄下這第一條路的司坦來，要是忽然得着一份憑空飛來的報紙，這張新鮮的日報給他們引起的快樂，絕不會像它現在給我們這班絕望地監禁在一個要塞裏面的人帶來的那樣多。報紙上刊載的全是些國內生活的乾燥無味的記載，而且都是讓檢查官弄得極乾枯了的。顯而易見的，這些年來，在我們俄國這片廣大的荒野上連一棵小樹，連一根新苗都沒有生出來過。可是在那張報上我們找到一篇關於德國的文章，它給我們打開了一個廣大而遼遠的天際。

● F. Nansen (南森, 1861—1930) 挪威博物學家，北冰洋的探險者。『弗南號』(Fram) 是他的探險船。

● H. M. Stanley (1841—1904) 英國人，非洲探險家。

這篇文章講到德皇威廉企圖召開全歐會議商討勞動立法的問題時，還說起德國政府已將仇視社會主義者的法令取消；這篇文章更說到社會民主黨運動脫離了祕密活動的階段，打破了這個束縛着它的鎗鐐以後，發展得很快，而且以不可抗拒之勢傳遍了全德國。我們帶了快樂的激動讀着關於集會和會議的消息，關於一家工人的社會主義的報社的發展以及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大量增加等等的記載。這一切雖然發生在德國，而不是俄國的事情，但這個毫無關係。對於我們這班在「國際」的旗幟下面長成的社會主義者，各國勞工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是關係極密切的。

我們非常高興；因為我們監獄的高牆第一次退寬了，而且開了一點兒。我們看見了片刻的光亮，呼吸了一口自由的氣息。

第二個快樂是——一本書。

我們的監獄圖書館起初可以說是毫不足道的。藏書一共只有二百六十種，這裏面除開倫理和宗教方面的書籍外，就只是些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舊書；一八四六年出版的印度雜記（某英國軍官著）；巴西爾的君士坦丁堡旅行記和希臘旅行記（一八四幾年刊

行) 德文蒙古西藏旅行記; 法文比利時的地質學; 高加索的風俗習慣和傳說; 鄧加波爾斯基的關於俄國生產力 (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講起的) 著作等等。經過三四年的努力和懇求，我們纔得到許可將我們中間有的人從前帶進監來的少數書籍拿出來供衆人借讀。然而這些書很快地就被大家讀光了。至於由警察總署送來的新書起初是數量極少，後來索性一本也不來了。

一八九四年我們因為缺少有益的閱讀物，特別感到生活無聊，我想起了一個補救的方法，我便向司令官韓加爾特提出這樣一個要求：既然獄中圖書館內書籍非常缺乏，他是否可以給我們向聖彼得堡的公立圖書館登記幾個名額，由憲兵代我們去借書還書。這個要求只算是一種嘗試，我們認為很少有希望辦到的，因為要是它給辦到了，那麼我們這個石頭的棺木一般的要塞就跟一個自由的機構建立起聯繫來了。可是韓加爾特居然回答說：「好吧。我會安排它！」

幾天以後我們收到了一份目錄，再過一些日子一整箱我們挑選的書跟着來了。我們的快樂不用說是很大的。落到我手中來的第一本書是顏述爾夫人著的一冊論英國的小書。就是在正常的生活情形之下，這本書也會產生一個良好的印象；我現在在監牢裏讀到

它，它簡直是一個清水的泉源，一個完全的啓示。只有在監禁生活的憔悴凋零的氣氛中纔會有我這樣的感覺，我讀到英國的大規模的職工組合，組織得非常之好的煤礦工人的罷工，英國合作團體的特殊的发展以及英國知識分子中的合作運動（在「民衆大學」和「大學區」等等組織中表現出來的）時，我真高興得不得了。

英國知識分子跟七十年代的俄國青年一樣，把他的知識和他們的愛帶進倫敦，曼徹斯特，利勿浦等等的工業區裏去——這事實不是可以鼓舞我們，溫暖我們的僵冷了的靈魂嗎？面對着這個蓬勃的生命和它那爲民衆謀幸福的新的分枝，我忘記了我的監獄，忘記了我的不能活動的處境，忘記了我自己個人。

報紙來到我們這兒，只有一張報，它像電光似的，在黑暗中一閃，就消滅了。接着是書來到這兒，書本把監獄的高牆推開了，使得監牢亮起來，但也只是一會兒，不久又消滅了……警察總署堅決地禁止我們在公立圖書館裏借書。

然而不久一個新的勇氣和力量的泉源又給我們開放了。快樂跟着它同來。莫洛左夫偶然從獄醫的口中聽說聖彼得堡有一所流動博物館，收藏極富，博物學各部門的東西都很完備。醫生給他帶來一兩盒，從這個博物館借來的化石標本。魯加雪維奇，莫洛左夫和

諾瓦魯斯基對於自然科學的興趣特別高，至於我呢？我這兩年來就在準備溫習我從前在沮利克唸醫科時所荒疏了的幾門功課。要研究博物學，我們非常需要那些豐富的收藏；因此我們便起了向博物館借用標本的念頭，我們決定去要求監獄當局允許我們使用它們。莫洛左夫向韓加爾特提出了這個要求，韓加爾特一向都是盡力給我們幫忙的。可是這一次他卻說我們應當向警察總署去要求，他自己並沒有權處置這個事情。

我們應該怎樣對警察總署說明我們這個請求的意思呢？莫洛左夫想來想去，最後纔決定先陳述他的請求，然後解釋道，他正在寫一篇關於物質的構成的論文，需要那些石頭參考。

我們完全沒有想到他會用這樣一個荒謬的解釋，我們都笑他，認為這不會有什麼用處；然而不許我們在外面借讀書籍的警察總署，卻居然答應我們借用石頭了。

從那時候起差不多一共有四年的功夫，柏茲洛得諾夫醫生●給我們出了很大的力，他做我們跟博物館中間的聯絡人。每隔一個星期他會給我們帶來整盒整盒的科學儀器和標本，以後再由他送還給博物館。這樣我們居然能夠在空暇時候飽覽博物館中地質學，

●他是奈米素夫的後任——原註。

古生物學、礦物學方面的豐富的成套標本，使用它的物理學的儀器；參考它的乾臘植物標本以及組織學和動物學的標本——總之我們儘量使用了博物館的豐富珍貴的收藏了。

我們的特權漸次擴大了它的範圍，而且可以說是相當地大了。醫生開始在博物館替我們借了些科學書籍來，隨後又給我們帶來一般性的書。再後博物館方面提議聘我們為工作人員。博物館給我們送來不少昆蟲學、植物學、礦物學方面的原料，委託我們做成各型的成套標本和乾臘植物標本，預備給小學和中學採用。那時候我們自己手邊也有很多做乾臘植物用的原料。我們在各人的花園地段中一共種了幾百株種類不同的植物，而我們監獄所在的這個島上的土壤是屬於火成岩的古地層，充滿着志留利亞紀的沖積沈澱物的標本。倘使我們要採集花崗石、片麻岩，或者別的礦物標本，不論多少，只要我們俯下身去，就可以採到。監獄裏現在充滿了工作的聲音。細木匠、轆轤匠、編籃匠，都在工作；他們繪圖、設計、碾細、磨光；他們製造木盒，他們改良並且發明種種新的裝置標本的方法。他們黏貼紙板盒子，將各種磨石製成板、片；而愛好博物學的人又製造大批乾臘植物標本，如苔和地衣、海藻和蕈、菓子和種子等等，都依據組織和構造分類排列，成為整套標本。他們做了幾百張玻璃片來說明一朵花的各個不同的部分，收集了成套的火成岩、礦石、生礦的標本，採集了大

量的昆蟲的標本，還做了其他這一類的事情。這一切東西做好之後，都由醫生送交博物館，還有那幾十箱的物理儀器，也是由醫生代我們送還的。

這幾年是值得回憶的。在這些日子裏，究竟有些可觸摸的實在的東西來佔去我們的時間；有種種的困難和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博物館的工作（可以說我們用了我們的勞力使博物館的收藏更加豐富了）結成了連繫死人與活人的一根帶子。因我們這種毫無用處浪費光陰的生存而引起的痛苦也漸漸地消失了。因我們被人永久地從廣大世界拖開，知道我們永遠失去了社會工作和社會目標而引起的始終無法排遣的悲哀也漸漸地平靜了。

然而後來他們連這個工作也給我們剝奪去了。韓加爾特離開了席呂塞爾堡，連柏茲洛得諾夫醫生也走了。監獄中充滿了不安的情緒，規程也改變了。這種使我們精神的欲望得到了滿足的工作，現在也被人從我們手中奪走了。

重見我母親的快樂並沒有來——牠永遠沒有來。然而預言應驗了：我的生活裏並不會完全失去快樂。在悲哀與痛苦的黑漆一團中，還閃爍着一股一股的金線，它們是有着一個晴天裏的光亮的；快樂是有的——那些大的快樂，我母親曾經鼓舞地對我說起過的，我

那個小磁像現在慰藉地給我提醒的那些「意外的快樂。」

司 令 官

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和我是席呂塞爾堡中僅有的兩個女人。我們只能夠跟彼此見面，而那班可以結伴散步的男人，不久就爭取到了更換同伴的權利。照這個辦法他們可以一個一個替換地互相會面認識了。他們還想使我們也能夠享受這種權利，他們決定要去掉那個隔開我們的障礙。因此他們從工場裏帶了器具出來，起初在那些分隔我們散步的小院子和我們種花種菜的小園子的板壁和籬笆上面開了一個很小的口，後來就漸漸地把口開大。這樣一來我們便可以自由地交談，見面了。

督察長和憲兵對於這種破壞我們的單獨禁錮的獄規的舉動非常不高興，可是司令官却裝作沒有看見或者沒有聽見什麼的樣子，其實他在窗戶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我們談話的情形。因此我們這次的重大勝利纔能夠保持下來。

我不能够說我當時十分重視這個勝利。孤寂給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我已經漸漸地感到不到跟人們交際的需要了。一個——兩個朋友對我就很夠了；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跟我恰恰相反，她是一個好交際的人，監獄生活並不會使她改變了一點兒。她很喜歡社交。她能夠跟同志們一連談幾個鐘頭的話；相反的，我却止不住地渴想避開他們。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蘇非亞·金斯堡被押送到席呂塞爾堡裏來了，說是奉了警察總署的命令，她應當跟我們完全隔開，單獨監禁在老監中一個監房裏面。這時獄方藉口說工場需要修理，就把它們暫時關閉了。蘇非亞·金斯堡僅僅忍受了三十八天這種可怕的孤寂的痛苦。尤其使她痛苦難堪的是她隔壁監房裏還關着一個狂人席切德林。到了一八九二年一月七日她使用她爲着縫補內衣而弄到的剪刀割開她的脈管自殺了。

我們一點也沒有料到她給關在老監裏面，至於她的死我們還是好些年以後才知道的。

在我給關在席呂塞爾堡裏面的二十年中間，要塞的司令官已經換了好幾個，在那些人裏面，韓加爾特無疑地佔了一個完全特殊的地位。在我們的牢獄生活中，除去密拉科夫、麥秀根和格拉切夫斯基犧牲他們生命給我們爭來的一部分改善外，除去由於我們自己

共同的努力而得到的一部分的權利外，另外的一切較大的生活的改善都是由韓加爾特實行的。他總是設法不讓警察總署和內務大臣的復仇的手挨近我們。他以為，失去自由、工作、親戚、朋友，這已經是一個重的處罰了，要是再給我們添加什麼的話，那就是過分地殘酷了。無疑地那些在政府的內部佔勢力的反動分子對民意社的黨員抱着強烈的復仇心。尤其是像杜爾諾渥和卜列威那樣的人，他們的復仇心最強，他們注意的並不是民意社反對專制政治的整個鬪爭，却是在這個鬪爭中我們每個單獨的人所擔任的職務，所做過的事情。

韓加爾特就職以後，他一定看到了我們自己開的窗洞；可是他並不把它們填滿，恢復單獨禁錮的狀態，他却為我們做了一件有利的事。他不願意用暴力和報復手段打消我們的這個勝利，他反而請求警察總署准許他將籬笆的上面部分改裝為木欄。他的理由是園裏缺少陽光，因為要塞的圍牆太高，而籬笆又把陽光完全擋住了。我們把自己在細木作裏做好的長凳放在籬笆前面，我們不只是可以從上面的木欄縫裏見面、交談，我們還可以做

● V. K. Plevé (1846—1904) 曾任俄國秘密警察領袖和內務大臣，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被革

命黨人沙若諾夫暗殺。

研究的工作。這等於是我們生活裏的一個合法的革命。只要韓加爾特在席呂塞爾堡中做司令官的時候，就沒有一個憲兵敢用手指頭挨我們一下，韓加爾特會經營着我們的面對憲兵們發過這樣的命令。

在韓加爾特做司令官的時候，小工場的數目也增加了，每個囚人只要自己高興，就可以每天到小工場裏去作工。在那時候我跟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兩人管理着一個細木作。在韓加爾特的籌畫下，兩架很好的車床買來了，他許可我們接受有酬報的工作。這樣一來我們使用我們自己慢慢地學出來的細木匠、轆轤匠、鎖匠的技藝掙了一些錢。這筆錢裏面有一部分給用了來改善我們的伙食，並且後來又用了來為我們的圖書館添購書籍，這自然是靠了韓加爾特的幫忙纔辦到的。對我們這是一個天大的喜事。

在韓加爾特的籌畫下，獄裏又成立了兩個裝訂作，他藉口說給我們做訂書的工作，却使我們讀到了很好的書籍和雜誌。

在韓加爾特做席呂塞爾堡司令官的兩年中間，他為我們做了不少的事情。他讓我們有自治的機會，使我們因此省却了跟督察長或憲兵發生衝突的麻煩，在以前衝突的事差不多天天都有。後來在一個短的時期裏面，他還使我們有機會從聖彼得堡的國立圖書館

裏借書進來。

他究竟靠了什麼方法，居然能夠爲我們做了那麼多的事情？難道在我們監禁期的第二個十年裏面政治的路線有了新的改變？或者是他跟警察總署有密切的關係，他可以照自己意思辦事不受上級機關的支配嗎？大概他在接事以前曾經提過條件，要得着對待我們處置事情的全權吧。他爲了改善我們的生活的確做過很多的事情。我們想着他就不得不充滿了感激，他曾經幫助我們：渡過了這個痛苦的時期，保全了這麼多的力量，在他不能完全作主的條件之下這已經是他的極大的努力了。

帕奇托諾夫

我已經說過我們裏面有幾個精神病患者。席切德林、伊格拉地、伊凡諾夫和安龍齊克給人關進席呂塞爾堡裏來的時候，他們的神經已經不是健全的了，在正常的環境裏，他們是應該讓人送進瘋人院去的。柯那穴維奇開始發病的時候，我們彼此間的聯繫還很有限，所以我們不能看出他的病症來。可是帕奇托諾夫呢？我們明明看着他生病，從他的肉體發生最初的病象起一直到他的精神完全崩壞為止，我們都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

帕奇托諾夫以民意社軍事組織的參加者的罪名被判決死刑，然而他遞了一份請求減刑的呈文給沙皇，因此免掉一死，給關進席呂塞爾堡裏來。他是一個有教養的、智力發達的人，可是他却缺乏特殊的精力和毅力，性格也不堅強。他生性柔弱，需要着同志們的支持。他愛生活與生活的歡樂。席呂塞爾堡的生活對於這個嬌生慣養了的軍官是比對

於任何別的人都更難受。他在這地方的生活的確是充滿了痛苦的，並且到頭來還得着一個悲慘的收場。

有一個事實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在監牢裏，想着同志們在近旁跟自己一塊兒受苦這一個思想常常給人以忍受的力量。無疑地在頭幾年中間這種想法在帕奇托諾夫的身上也是有影響的。而像我和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這樣跟他一樣地在困苦情形中生活着的女人，我們的命運尤其使他感動。在一八八八年他給我的一張字條上就這樣地寫着：「要是沒有你這個例子，我絕不能夠在這兒生活下去……」

外國語文的研究，讀書，體力勞動等等佔據了帕奇托諾夫在席呂塞爾堡中的全部時間。他特別愛好木匠手藝，而他的特長是在轆轤匠的工作上。一直到一八九五年他的健康狀態還是很好的。由於他那活潑的天性，他老是忙着活動，並且充滿着創意力，他的一切的勞動都是爲着換取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的快樂的。他爲她製造了各種的小樹和椅子，書物架，小盒子以及其他許多小東西。到了聖誕節他居然做成功一棵聖誕樹，一棵真正的道地的聖誕節，上面還插了許多支顏色蠟燭。

然而不管這一切監牢中有的勞動和分心的事情，他的熱情還是不斷地折磨着他。有

一次他高興地散步歸來，帶着發光的眼睛對我們說：「醫生剛剛給我檢查過，他說它已經在我身上『開始』了！」他指的是肺結核。

另一次他甚至對着魯加雪維奇說，他不能夠活下去了，他要自殺。

帕奇托諾夫終於瘋狂了。在從不注意的人看來，這是突然發生的。然而事實上一個精神病學者早就可以斷定他的病已經開始了。他以前是一個軟弱、溫順的人，現在却突然變得急躁、傲慢了。他的許多古怪的不近人情的行為當時實在叫人不能相信；只有在後來他的理性完全喪失了的時候，我們才明白。

目擊着一個友人的精神的逐漸崩潰，這在我們，實在是說不出的痛苦。到了一八九五年九月中旬，事情已經十分明白：帕奇托諾夫是完了。在這時候他不再跟同監的人來往交談了。他不肯離開監房，整天就躺在床上，說是在生病。

憲兵們對待他跟對待健康的人一樣，並沒有什麼分別；所有的囚人都得一樣地受苦。他完全不到工場裏去了，好像他完全忘掉了它們的存在似的；而憲兵們也不再帶他去那個地方。

別的囚人們看到帕奇托諾夫的病象一天一天地增加，感到很大的痛苦，大家神經上

受到的刺戟已經達到頂點了。我們都在等待着，一件可怕的事就要發生了。這情形看來是沒有出路的，因為除去帕奇托諾夫以外，監牢裏面還有兩個患精神病的囚人，席切德林和柯拿穴維奇，他們已經在這兒痛苦地挨了兩年了……

有一次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幾乎要引到了一個流血的結局。那天差不多全體囚人都在老監內那些小工場裏面做工，那些專為男囚人開設的工作店都開着，只有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跟我兩人工作的工作店是關着的。馬爾地諾夫突然出現了，他非常激動地向大家說，憲兵在打帕奇托諾夫。所有的人全憤激地聚集在走廊上；有些人在叫，有些人痛罵憲兵。憲兵們申辯着，說不會有這種事情。可是馬爾地諾夫堅持說他不會錯。那個憲兵還是堅決地否認他打過病人，於是雅諾維奇激動地大叫：「你是一個渾蛋！」那個受了侮辱的憲兵便用全力拉警鐘，這警鐘是通到看守本部的，同時他又把那扇將走廊跟前室隔開的格子門關上了。我們來不及思索，就聽見了急忙的脚步聲，並且從格子門望見了一些槍上插上刺刀的兵。槍彈大概就要飛出來了。帕立瓦諾夫在激動中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跑進工場裏去抓起一把斧頭來保護自己。幸而瓦西里·伊凡諾夫及時把這個危險的器具從他手中奪去。同時那個把兵找來的憲兵也醒悟過來，設法把兵遣開了。

爲着這個事件獄方的唯一的處罰，就是將馬爾地諾夫的散步的權利取消三天，「因爲散布不實的謠言。」另一方面，司令官答應把這次騷動的真正原因向外面公布，並且採取步驟將帕奇托諾夫移送到病院裏去。獄醫向我們提議暫時先把這個病人移到老監裏去。可是我們想到將我們生病的同志孤單地關在那個隔離的建築物裏面，讓看守們隨意去處置擺佈——那班看守們的拳頭我們好些年前就已經嘗過了，這些年中間它們一定沒有變軟的吧——我們實在不能忍受這個想法。我們經過一番討論後便決定從我們中間派一個人陪着帕奇托諾夫到老監去看護他，免得他遭受看守們的任意的虐待。這是十分要緊的，因爲他的病勢發展得很快。尊大狂，癡狂的發作和自毅的渴望攙合在一塊兒成了一種最厲害、最頑強的精神錯亂，在他發狂的時候，必須靠體力去制止他。我們選出魯加雪維奇去陪他，魯加雪維奇已經跟他很熟了。他一方面有着堅強的體力，另一方面又有善良的心。獄方贊同了我們的建議。魯加雪維奇還可以在散步的時候將病人的狀況和所受的待遇詳細地告訴我們。

帕奇托諾夫的病勢發展得極快。後來警察總署答應了監獄當局的要求把他移到聖彼得堡一個病院裏去。一八九六年二月五日我們忽然看見醫生住處的附近停着一輛黑

色馬車。他們把帕奇托諾夫搬走了。獄醫陪着他去，這醫生倒始終是囚人們的朋友，對我們一向都不錯。還有一個穿便衣的憲兵坐在車台上。

十二年前帕奇托諾夫給人押進席呂塞爾堡裏來時，他是一個健壯、活潑的青年人。現在他給人從這裏帶走，却只是一具沒有理性的活屍了；他完全失去了人的思想和人的感覺。

帕奇托諾夫進了聖彼得堡的陸軍醫院。他就死在這一年。對於那些愛他的人，對於那些跟他一樣在爭自由的戰爭中倒下並且爲着自由受苦的同志們，他放下了簾帷，不讓他們看見他最後日子裏的痛苦，他是應該被祝福的！

別

「從這兒他們只有給人抬出去，他們絕不會走出去的。」某一位官員參觀我們這個要塞時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的確有許多許多人是抬出去的，然而關在這裏的也並不只是些被判決了終身懲役的人（俄國人叫他們做「老沒根」）這裏還有一些囚人，他們的徒刑是有期限的，等到期限一滿，他們便離開我們了。

第一個釋放出去的是海軍軍官尤瓦切夫。他是跟我同時受審訊的，他的刑期並未服完，就早早地被赦免了。

尤瓦切夫是由阿新布倫勒爾拉進民意社的軍事組織裏面的，他隸屬於海軍官佐們

● 「老沒根」倒是中國用語，照原文直譯，應該是「永遠永遠的。」

● I. P. 尤瓦切夫寫過一本「回憶錄」叫做俄國的巴斯底，有拉坡坡特的英譯本，一九〇九年倫敦版。

的尼可拉也夫團。這團體的團員，在水兵中間作革命宣傳時的熱心，使得那個比較冷靜得多的阿新布倫勒爾大為驚歎。在審訊的時候，尤瓦切夫並未給人留下一個明確的印象，他竭力否認他參加過黨的任何革命活動，而他還是跟軍事團體的其他團員一起被判決了死刑，後來他遞了一份請求減刑的呈文上去。他的死刑纔改作了十五年的懲役罪。他到了席呂塞爾堡以後不多久，就漸漸地發起變態性的宗教狂來。監獄當局存心要拯救我們的靈魂，給我們每個人送了聖經來，尤瓦切夫常常整天跪着讀他那本聖經或者祈禱。逢着星期三和星期五，獄方要我們實行部分的斷食，尤瓦切夫却不滿意這種不徹底的辦法，他在這些日子裏連一點東西也不吃。他的宗教的熱誠，自然不久就被獄方注意到了，他們做了報告到警察總署去。他只給關了兩年，到一八八六年他就被帶出席呂塞爾堡，流放到薩加鄰島上去，在當地充當一名海軍軍官。靠着這個職務，他纔有機會去島上各處觀察流放人的生活，以及當地官廳跟這班被奪去了人權和法權的流放人之間的關係，而描寫出來。

第二個離開席呂塞爾堡的囚人是瓦西里·安德烈也夫·加老羅夫，他是在一八八

● 宗教上的斷食，禁絕平日的全部或一部分的食物，以表示節慾、懺悔等。

四年基輔的「十二人案」(十二個民意社的黨員的審判)中被判決了四年的懲役罪。加老羅夫是一八八三年俄國亡命者狄可米洛夫和阿現尼娜在巴黎組織的委員會的委員。他以外的委員還有樂巴丁、沙羅瓦、賽爾該·伊凡諾夫和蘇雄林，他們跟他一樣，當時都在國外。他們回國以後又加入了一個尤可豪維奇—麥爾新。可是還不到一年他們全體被捕了。他們從事於恢復民意社的這種沒有希望的努力，在一八八三年這個團體重建起來了，可是在黨的核心活動着那個奸細——特務賽爾該·德加葉夫。●

加老羅夫是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被判刑的，一個月以後他就跟他那班共同受審的同志雪巴林、馬爾地諾夫、潘克拉托夫等一起給關進席呂塞爾堡裏來。一八八一年，我還沒有被捕的時候，我在聖彼得堡見過加老羅夫一兩次。他是一個世人所謂的「漂亮結實的漢子」，身材魁梧，肩膀寬大，活潑愉快，臉頰上充滿了所謂「血和奶」的顏色。然而在他被監禁的四年中間，他老是生病；他有出血症，不只一次病得快死去了。他或許是因了生病的緣故，或許是因了刑期短暫，有出獄希望的緣故，他在牢裏非常安靜，謹慎。他並不參加我們爭取敲壁傳話的權利的鬥爭，也不參加我們爭取結伴散步的權利的消極抗議，他從來不

● 德加葉夫的事見本書第一卷。妃格念爾的被捕便是由於德加葉夫的告密。

會跟獄方爭執過什麼。

一八八六年加老羅夫出獄之前我們就拜托他辦點小事情，要他帶個口信給我們的親屬。我把我那首給母親的詩敲壁傳給他，他答應用心記住，以後抄寫出來郵寄我的母親。然而使我們大為驚訝的是，他出獄後雖然住在像克刺斯諾雅斯克●那樣一個大的城市裏，但我們拜托他的事情他一件也不會辦到。我們猜想大概是像外間所謠傳的那樣，他受到了當局的威脅，據說如果他吐出一句半句關於我們任何一個囚人的話，他就得回到席呂塞爾堡去。不過他自己在幾年以後曾經發表文章聲明他並未受到任何威脅。

加老羅夫出獄後他的政治信仰也改變了。後來他被選為第一屆帝國議會●中立憲民主黨●議員。他不再擁護民意社所主張的普選；根據他的修改後的主張，俄國民衆知識程度還不夠實行普選的水準；土地問題本是我們綱領的中心點，然而他對這問題的態度也已由那個支持他競選的政黨的資產階級的要求來決定了。加老羅夫在「都瑪」中是

● 西伯利亞的一個大城。

● 即都瑪 (Duma)，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國會。

●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米留科夫等創立的俄國自由黨。

個風頭人物，他爲了堅決而能幹地擁護信教自由，博得一般人的尊敬。「黑百人黨」在議會中辱罵他爲「罪囚」，他勇敢而巧妙地答覆了這個侮辱。他大聲說：「你們現在可以坐在這兒開會，還是靠着我也流過一滴血呢！」他這話倒是真的，他爲着人民代議制（民意社當時就爲着這個鬥爭）不只流了一滴血，他流過許多滴血。這個大力士一般的人初進監獄時身體非常健康結實，但離開席呂塞爾堡的時候，臉上却毫無血色，就跟死人的臉一樣。他在西伯利亞纔漸次恢復了健康。他在一九〇七年病故以後，一般的「舊信仰者」爲了感激他替他們爭取信教自由的權利起見，在他的墓上立了一塊紀念碑。可是專制政府忍受不了這種「反叛行爲」，下令將那塊石板移開了。

在一八八八年以後，中間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期，沒有人給關進我們這個監獄裏來，也沒有人給釋放出去，在一八九〇年拿哥夫斯基的刑期滿了，他們應該給他自由。

● 當時俄國反動派所組織的黨目的在打倒，撲滅自由黨和急進分子，黨的名稱本來是「俄國人民聯合會」因手段殘酷，被人稱爲「黑百人黨」

● 一六五四年俄國正教教會中發生分裂。一班守舊派不贊成教長尼公（Nikon）的改革，脫離教會，稱爲「舊信仰者」，大多數都是貧窮的人，幾百年來備受政府和教會的迫害。

這個人的命運是相當悲慘的。我們大家都是經過所謂審判後定罪的，惟獨他連一次審訊也沒有，就讓人關到席呂塞爾堡裏來，並未經過任何法律手續，只是由內務大臣下個命令把他在這個要塞中監禁五年。他原是一個砲兵軍官，一八八三年受着充軍的處分被派到托木斯克去，他在半路上逃走了，加入了民意社。一八八四年三月他在聖彼得堡大街上被捕。他身上帶着一種製造新的爆炸物的方式，這就足以使他不經審判被送到我們這裏來了。他到席呂塞爾堡的日期是一八八五年十月。

他在席呂塞爾堡中第一年的生活倒是相當安靜的，他並沒有跟獄方發生過特殊的衝突。然而到了一八八七年秋天，那時還是沙科羅夫在做督察長，他就因了敲壁傳話的緣故被移到老監裏去過了，正是在格拉切夫斯基在那兒燒死自己的時候。這以後他又不間斷地爲着一些小事故跟新督察長費多洛夫鬥爭。他的監房的窗戶正對着囚人們散步的花園。拿哥夫斯基看見同志們時，便跳上窗台，用手緊緊抓住窗框。任是怎樣申斥或懲罰都不能夠叫他退回去。他們送他進過懲戒室，給他穿過「緊背心」給他戴上鐐銬，並且使勁地把他推到地上去，弄得他失去知覺，血染全身。然而他始終不屈服，永遠把督察長認作一個

大仇人。

最後他五年的刑期滿了。不祇是他，連我們大家都很興奮，懷着希望，又帶着疑慮，不知道他會不會得到自由。

就在他應該出獄的那一天，司令官親自走進他的監房裏來，對他朗讀一遍內務大臣的手令：拿哥夫斯基在牢中『品行不好』，應將他的刑期延長五年。

這五年又過去了。他們釋放了拿哥夫斯基。他還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妹妹，他非常愛她們。他很久都找不到她們；在他被監禁的整整十年中間，他沒有接到過她們寫來的一句話或一個字，因為在那些時候我們並沒有享受到通信的特權。拿哥夫斯基起初被流放到加拉科爾去，後來在一八九八年他又搬到薩拉多甫，在巴拿夏甫城度過他的最後幾年的歲月。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九日他在珂卜拉洗澡給淹死了。

拿哥夫斯基出獄後不久，我們大家所愛的同志阿瓦勒斯·滿路查洛夫（我們都簡稱他爲『滿』）的十年的徒刑也在這一年中滿期了。

滿路查洛夫在哈爾可夫被捕的時候，他曾開槍拒捕，他毫無殺死任何一個警察的意

● 東俄的一個城市，在伏爾加河岸上。

思，他不過想利用這場騷擾警告他的同志們和朋友們，他耽心他們會在他家裏遇到埋伏。他給關在哈爾可夫的監牢裏，但他居然設法逃出來了，可是，又給人抓住，在一八八四年受過審訊後，他纔被押送到席呂塞爾堡裏來。

他是一個亞美尼亞人，既未受過高等教育，也無動人的外表，然而我們却很難找到一個比他更可愛、更善良的人了。他正直、敏捷，並且能夠容忍別人的意見，在我們監獄生活的困苦情形中，實在找不到一個比他更好的同志了；他對每個人的利益都很關心，對一切個人的問題也很虛心研究，所以他常常爲別人做了一些事情，那都是任何別一個人做不了的。他對我們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因此他的刑期滿了，他還不肯離開我們；只有在司令官韓加爾特直截了當地對他說要動手把他拖出去時，他纔無可奈何地答應離開了。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在那裏結了婚，可是在一九〇九年他就因了心臟病早逝了，遺下一個小小的男孩。

滿路查洛夫出獄以後不過一兩年的光景，我意外地在韓加爾特給我們那本一八九六年的某一期俄國財富中讀到一首我自己的詩：

告訴我，我敬愛的朋友，告訴我爲什麼

春天的太陽是這麼明媚，溫暖，

一切的生物都沐浴在它的光輝中，

爲什麼只我一人是如此憂煩？

告訴我：這個晴明的蔚藍的天，

它溫柔地回視着我仰望的眼，

爲什麼它把那些接連不斷的愁煩日子

裝滿了難堪的苦難？

告訴我：爲什麼我這麼寂寞，無聊，

帶着苦悶地癡立，

從不抬起我憔悴的眼睛

望一望光輝的旭日？

要是你知道，我求你告訴我

爲什麼我祇在溫暖明媚的五月陽光中

停留片刻便匆匆離去，

在我的空闊的監房裏消磨長日，

我翻過這一頁，在另一面上印着答詩：

當你的心裏充滿着痛苦，

你不由自主地又掉下眼淚，

你躺在你那簡陋的小床上

想着那些深愛你的人們

（他們住在你的母國內

捱着那漫長的艱苦的歲月）——

當憂愁守在身邊

你還在希望，仍舊存着希望——

勇敢地壓下方生的恐懼——

你並不會死去。

生活與愛仍舊可以屬於你，

知心的朋友會將你的手緊握。

在船失事後怒濤洶湧的海灘上

總有一個好夢獲救而存在。

墳墓不能關住一切

可愛的東西不能全遭殺害

憤怒的霹靂也不能將希望全燬。

黑暗並弄不死的東西，

那日子即刻就要到來。

看，黑影在驚愕中倉皇失色，

因為黎明已快來臨！

這首詩後面署了一個首寫字母「M。」我忽然想起了一個姓名——米海羅夫斯基！
●我還用得着提說那種使我感動得流淚的喜悅嗎？我的聲音居然飛過要塞的高牆，到了我朋友們的面前，又引了他們的愛的話語越過石頭障壁回到我身邊來。這個快樂是親愛

● Mikhailovsky (1842—1904) (俄國社會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素來同情民意社等革命黨)

的「滿」給了我的，（他把我的詩轉寄給米海羅夫斯基了。）

這以後在一八九六年又有人離開席呂塞爾堡，這次出獄的五個同志，是一塊兒給帶出去的。

一八九四年尼古拉二世做了沙皇。他的父親並非兇死，却是病故的。我們都興奮了一陣；我們相信一定會有一次大赦——說不定連我們也會給赦免的。獄方相信席呂塞爾堡會空了出來。督察長費多洛夫恭賀我們快得着自由了。「馬上你就要再過着太太樣的生活了。」他帶着愉快的微笑對我說，他顯然以為世間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事情了。

那位管理工場的軍官原是個贊成自由主義的人，這時更放任我們，讓我們在工場裏多留些時候。我們大家聚集在細木匠店內；同志們把我同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伏爾鏗席太，因兩人圍住，雪巴林起先拉住我隨後又拉住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要我們跟他跳瓦爾茲舞。我們的快樂的確表現得太早了。韓加爾特對於俄國官場情形比較熟悉，他並不存一點幻想，他把那個軍官申斥了幾句。於是那軍官提早給了我們的自由又取消了，而我們的高揚的心情也因之而消失了。我們再看不到一點自由到來以前的象徵了。以後我們的生活中始終沒有發生一點新的變化，漸漸地我們也就絕了望，不再等候自

由了。

一年又這樣地過去了。然而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初我們正在老監的小工場裏面工作，看守忽然走進來，陸續帶了幾個人出去，說是要塞司令官傳見他們，魯特米娜也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每個人都驚惶着，激動着，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然而他們不久就回來了。他們很興奮地敘述那事情：根據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禮的勅令，瓦西里·伊凡諾夫、阿新布倫勒爾、斯塔洛得伏爾斯基和帕立瓦諾夫的無期徒刑給減成二十年監禁；而潘克拉托夫、蘇洛夫柴夫、雅諾維奇和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伏爾鏗席太因四個人的刑期則減為三分之一，因此魯特米娜、蘇洛夫柴夫和雅諾維奇三個人便應該馬上離開席呂塞爾堡。這個不公平的特赦使我們另一部分同志的情形毫無變更，牠並不會給那些遇赦的人帶來一點快樂，而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甚至因此異常惱怒。可是我們一想起居然還有幾個人會離開這個墳墓，我們也覺得高興，便急忙給她道賀，然而她氣憤着，連理也不理，只有後來纔慢慢兒平了氣，承認了這事實。於是各人開始忙着出獄的準備。

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和我們同住丁這許多年，經過了種種的人事變遷以後，要離開我們的確是一件難堪的事情。她愛我們，而且知道我們裏面有幾個人簡直離不開

她，就像她是陽光和空氣一樣。在她和我最後幾次的談話中，她時時表示對這幾個同志的柔愛的關切，她要我牢記住對於他們她的分離是特別難堪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她和別的四個同志瑪爾地諾夫和雪巴林（他們的十二年的徒刑剛滿期）雅諾維奇和蘇洛夫柴夫（他們剛遇着特赦）五個人一起被帶出席呂塞爾堡了。

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出獄前的最後一點鐘是在我的監房裏度過的。她不停地哭着，我安慰她。臨行時她深深感動地說，她把她一生中所認識的最好的幾個人留在席呂塞爾堡而獨自去了。

在下午一點鐘我們這幾個出發的同志陸續地被帶出了他們的監房，然後再被人領出監獄。他們走出獄牆正進入要塞的天井裏時，每個人都止了步，默默無言地和我們「訣別。」我們從各人監房的窗戶裏，注視着他們的漸漸退去的背影。他們全都轉過身子向着我們，深深地鞠一個躬；每個男人脫下他的帽子揮動着，表示問好的意思，而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却站住了兩三次揮舞着她的手帕，我們也拿了白手帕在手裏，監房的兩重窗戶和鐵格子遮攔不住牠們，牠們也可以容易地給他們看見。我們的眼光跟隨着這幾個

回到人間去的朋友，同時一個新的黑暗的空虛似乎在我們身邊湧現出來。他們走到大口，便不見了。對於我們他們是不再生存了，彷彿一個大洋張開巨口把他們吞食了一般；至於他們以後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再沒有一點消息可以傳到我們這裏來了……一個變幻不定的陰影籠罩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好像是梅特林克的那「一羣盲人」了。……

五個同伴的離去在我們的生活裏留下了一個空隙。魯特米娜·伏爾鏗太因在這空隙裏自然佔着一個特殊的地位；至於別的同鄉呢，雪巴林和雅諾維奇由於他們的性情和品格得着我們大家的熱愛，而蘇洛夫柴夫更是一個難得的人。

魯特維席·雅諾維奇是波蘭革命黨「無產階級同盟」的黨員，一八八六年進席呂塞爾堡來的。他在被捕的時候實行武裝抵抗，並且傷了一個祕密警察。人絕不會相信像他這樣一個謹慎安靜的人會做這種事情。我們並不需要多久的時間就會看出他「不是這個世界的人」。他絲毫不看重一切物品的價值。我相信要不是憲兵在一定的時間內給他送食物進去，他連飲食也會忘記的。他在這要塞裏也不設法保持他的健康，這一類的事他

● 莫利司·梅特林克生於一八六二年，是比利時的詩人和戲劇家。「一羣盲人」是他在一八九〇年發表的一個獨幕戲。

一點也不做。他整天坐在陰濕的監房裏，自然對他的身體會有損害。可是他並不去找醫生。他永遠捧了一本書坐在那裏埋頭讀着。他的興趣偏重在國民經濟，他專心在研究統計學。他離開席呂塞爾堡的時候，還帶了一堆訂好的抄本出去，抄本上全是些關於經濟問題和俄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波蘭工業的發展等等的摘錄，統計表，表解和成篇的論文。魯特維席·雅諾維奇還給我編製了一本統計學手冊，凡是一個俄國社會主義者所應具有的關於他本國的一切的知識他都用簡明的格式表示出來。要是這本書出版了，它會是第一本簡明的俄國統計學的入門書。雅諾維奇在他的科學研究中是非常謹慎的，而且很誠實很客觀的；他絕不輕易拿出一個主張，沒有經過一番批判，他不會接受一種學理。

雅諾維奇永遠埋頭在做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不大管我們那些日常的事務，他專心致志於他的精神的勞働。在我們的同志中間他特別喜歡那些熱心研究學問的人。除開一八八九年死去的瓦林斯基以外，魯加雪維奇便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將他們兩人聯繫在一起的，不僅是純粹科學的和學理的問題，並且還有那共同的國籍，他們兩個都是立陶宛人。我們看出來，他精神上的痛苦很大。有一次他跟我兩人在我們的「籠子」裏各自單獨散步，大概當時我們都沒有感到結伴的需要，可是我却想知道我的鄰人是誰，我便從縫隙裏

望過去；然而我馬上就把頭掉開了。雅諾維奇額頭皺緊，兩眼陷入，不停地走來走去；他那慘白消瘦的臉上悲哀和憂鬱的表情是很可怕的，他的整個外貌給人一種無限痛苦的印象，使得我的心也搖動起來了。他的面貌給我印下的這憂鬱的印記常常使我驚擾不安。

從他身上發出來的純潔與真實的氣息實在是脫離了日常生活的拘束的神聖的東西。他的節制的天性使他不能跟別人發生密切的關係，可是大家都非常敬愛他，而我們跟他常常接觸的人更加愛他，雅諾維奇的肖像是它自己永久刻印在我們的心靈上的。

跟雅諾維奇同時離開席呂塞爾堡的馬爾地諾夫是和加老羅夫，潘克拉托夫，雪巴林一起在「十二人案」中被判處十二年懲役罪的。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他和他那幾個命運相同的同志一塊兒給押送到席呂塞爾堡來，在這兒一直住到一八九六年。他關在要塞裏的時候，跟督察長費多洛夫有過一次激烈的衝突，把我們大家都驚動了。他不滿意兩人結伴散步的辦法，因此每逢同志們在散步的時候，他總要抓住窗板爬上去看他們一眼。有一天督察長接連捉到他三次。督察長申斥他幾句，他却吐了一口痰在督察長的臉上。像這種舉動在監獄裏算是對官吏的重大的冒犯，依照軍法是應該判處死刑的。我們怎麼能夠袖手旁觀讓馬爾地諾夫一個人去受刑呢？這件事情發生過後他們就把馬爾地諾夫移

到老監去了。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認為我們不應該讓他一個人關進老監去，我們應當要求全體都跟着他關到那兒去。

這個提議使我很爲難。我並不贊成馬爾地諾夫的行爲。他是一個人，督察長也是一個人，像馬爾地諾夫對督察長施過的侮辱，不管是對什麼人，我都認爲是絕對不應當的。爲着這件事我對馬爾地諾夫的反感很深，我費了大力纔止住我自己沒有向督察長表示我對這件事情的歉意。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要脫離同志們單獨行動是不可能的。

然而這醞釀中的集體抗議並未成爲事實。馬爾地諾夫並沒有受軍法審判。我們遞了一份詳細報告到警察總署，又派了樂巴丁去陳述馬爾地諾夫的病情，說他正患着一種癩痢病。

馬爾地諾夫在老監裏住了一個月。他給戴上了腳鐐。他的散步和讀書的權利都給取消了。過後那件事情也就慢慢地被人忘記了。

一八九六年離開席呂塞爾堡的同志們中間的第三個人是米海爾·雪巴林。他是一個數學家。他在大學唸書的時候就已經爲我們的黨做過了種種的事情。

一八八三年春天由於雅苦博維奇的建議，雪巴林成立了一所專印革命傳單的祕密

石印局。以後又決定再創辦一個專印書報的印刷所。雪巴林假裝和卜拉斯科夫亞·波哥拉斯結了婚，然後在一八八三年四月夫婦一塊兒搬到那個預備作印刷所的住處去。一個聰明的少女瑪利亞·苦利亞卜科扮作老媽子。他們三個人對印書的技術一點也不懂。可是他們非常熱心，不久印刷所居然印出了一些傳單，一本小冊子，和許多別的東西。印刷所同外界的聯繫工作是由德加葉夫擔任的。那時德加葉夫在彼得堡的特務活動已經發覺了。這年八月或九月德加葉夫便動身到國外去，他在國外見到狄可米洛夫和瑪利亞·阿現尼娜，向他們認罪，表示願意脫離特務的關係。狄可米洛夫和阿現尼娜跟他談好了條件：倘使他能幫忙黨把蘇傑庚殺死，則他的生命可以保全。德加葉夫帶着這個命令回到俄國，繼續扮演他那特務的角色。

德加葉夫在他殺死蘇傑庚之前不多久，曾經勸告雪巴林離開彼得堡並且另外取一個名字。雪巴林真的離開了彼得堡，先到莫斯科去，後來又到了基輔，不過他並沒有改換姓名。在基輔他又繼續着印刷的工作。因此不久在一八八四年三月四日他的印刷局就被警察查封，他們夫婦同時也被逮捕了。

● 蘇傑庚是俄國政府派去跟德加葉夫聯絡的靈兵隊軍官。

這年秋天經過了審訊的手續，卜拉斯科夫亞·雪巴林被判決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米海爾·雪巴林得到十二年的懲役罪，給關到席呂塞爾堡裏來。

他關進席呂塞爾堡的最初半年中間，他要求遣送到西伯利亞去，並且爲着這事情絕食了三十二天。據他自己說，他前十天裏面很感痛苦，可是過了十天以後，他的饑餓的感覺就沒有了，他反而覺得毫無所謂了。監獄當局想盡方法使他停止這個絕食的抗議。阿爾測夫斯基想來說服他：他想用那種方法達到目的是不可能的。雪巴林問這個內務部次官爲什麼把他的西伯利亞的懲役罪改成了席呂塞爾堡中的監禁，阿爾測夫斯基回答說這是沙皇的命令。人們爲了想引誘絕食的人進食起見，每天放了一罐牛奶在他的近旁。雪巴林說，他在第三十二天裏，看見一隻蒼蠅落進牛奶裏面，他完全機械地撈了牠出來，不知不覺地把手伸到唇邊舔了舔。從此他就終止了絕食。他一口氣喝光了整罐的牛奶。

在席呂塞爾堡中雪巴林專心研究數學和外國語……他已經在牢裏度過了十年的長歲月，忽然在一八九五年得到了警察總署來的通知：他的妻子和小孩還來不及押送到西伯利亞，就在一八八五年病死在莫斯科的兵站監獄裏了。

第四個人是狄米特里·蘇洛夫柴夫。他是一個鄉村教士的兒子，在渥那格達的神學

校裏唸書畢了業。他有着沈靜、平和的天性，因此對一切學理的與思想的論辯他都不參加。可是很奇怪地他竟然加入了我們的黨。雖然他是反對任何的暴力的，他却接受了我們的建議，担任印刷局老闆的脚色。

在一八八二年我們便不得不把印刷局從莫斯科搬到阿德沙去；在阿德沙改由賽爾該·德加葉夫充任老闆，而由蘇洛夫柴夫担任排字的工作。可是一個月以後印刷局就被查抄，工作人員全體被捕。蘇洛夫柴夫得着十五年懲役的判決。

在席呂塞爾堡中蘇洛夫柴夫變成了一個托爾斯太主義者。憑着他那單純、溫和的心靈，他居然向警察總署要求，希望能允許他將他的兩個小孩，一男一女，帶到席呂塞爾堡裏來，由他自己教育，並且由他自己做工來養活他們。蘇洛夫柴夫的想法使我們大吃一驚，我們更驚奇的是他對於警察總署的好心會有那麼天真的信仰。我們自然勸他不要把請求書送去，這個除了引起官吏們的譏笑侮辱外不會再產生別的結果。蘇洛夫柴夫又反對對於任何生物的殘殺，因此他是一個素食主義者，起初看守給我們送肉來吃的時候，他總是堅決地拒絕。

蘇洛夫柴夫在被捕以前便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禁慾者；我在莫斯科團體的分裂。

以後在渥洛涅日看到他，他當時正患着瘧疾，住在一隻小船上，天氣壞的時候他却把船邊出去，並且只吃馬鈴薯過活。他在監牢裏也是這樣，出獄以後仍舊是這樣。他在這次（一八九六年）遇赦出獄後就被流放到雅庫次克去，在那裏他永遠做着繁重的辛苦的工作，後來他回到歐俄以後，他一直是做着這種繁重的苦工。他像一個真正的農人那樣在地上工作。他從來不顧到自己的需要，他總是準備着拿他自己有的那一點東西去幫助別人。一九一八年俄國發生饑荒的時候，有些朋友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專門幫助從前在席呂塞爾堡裏面關過的人，也按月送了三百盧布給他，他當時生活很苦，也需要錢，可是他立刻把這筆款子送給渥那格達的學校作為償還他三十五年前領用過的公費。

一九二〇年我知道他遷居在渥那格達，住在托特瑪的一所自己修的小屋裏。他自己種着一塊小小的菜園，靠了菜園的出產，維持他半年的生活，其餘的半年中間他就靠着他按月領到的十五磅的麵粉過活。（這個小城裏的居民都是按月領到這些麵粉的。）這

● 指土地與自由社的分裂，這分裂是在渥洛涅日大會中發生的，後來又在奈斯諾開會，決定取消土地與

自由社，另外組織兩個團體，多數派的是民意社。

● 歐俄即俄國的歐洲部份，指俄國本部，雅庫次克在東部，屬於亞洲部份。

麼一點東西實在不夠維持他的生活，他只好挨餓忍苦，後來他便把屋頂上的釘子拔出來，拿去交換食糧。他寫信給我說：「七根釘子可以換到二十磅馬鈴薯。」爲了禦寒他拆下他的籬笆生火。」等着春天到來，我會到林子裏去採折樹枝編個新籬笆。」他在那封信裏還說過這樣的話。

然而他仍舊是十分謙虛的，任何的困苦都不能阻止他不去幫助別人。

莫斯科的看守和西伯利亞的警察對蘇洛夫柴夫非常信任，而且都很尊敬他。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們讓他一個人在前院裏散步，在那兒逃走的机会是有的。然而蘇洛夫柴夫完全沒有想到：「我怎麼能孤負別人對我的信任呢？」有一次他跟我談起那件事情，他這樣對我說。

事實上他那不自私的犧牲精神，他那對於外表和物質的淡漠，他那對於人與生活的孩子般的單純的信仰使他高出於一般人之上。

「沙托夸」

在一八九二年或一八九三年，司令官韓加爾特要我們替他裝訂一本大得出奇的雜誌處女地，這是由烏爾夫刊行的。在這刊物裏我讀到一篇短文，它給我的思想指示了一個新的方向，它引導我開始了那些構成我監獄生活中一個新階段（一個充滿了光輝和健全的快樂的階段）的研究。在這篇論文裏我讀到在美國發生了一個爲着成年人開設補習課程的運動；這運動的起因是：一班中年人在實際活動與生活的擾攘中大都忘掉了他們在學校裏所學的東西，他們盼望着有溫習的機會。這種思想本身雖然很簡單，可是它好像是一個啓示似的，並且得着了大多數人的擁護。這運動的大本營是在沙托夸（美國的一個大湖）岸上的一個小城裏面，這個地方很快地就讓那班渴想溫習並且增加自己的學識的成年男女擠滿了。「我現在四十歲了，」我想道，「我也要把我在大學裏面學過的

功課有系統地溫習一番，並且還要開始研究那些我從前忽略了的問題。」

在這個時候以前，凡是在我們圖書館裏找到的書我全讀過了，可是我從來不會做過有系統的研究。我受過醫學的訓練，然而我跟別的沮利克的學生一樣，對於我們在大學頭兩年中間唸的自然科學的功課並不注意。我聽過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物理學、化學的課，因為那幾門功課是必修的。可是在這些學科中間只有化學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唸過門德烈也夫編的教科書，在百倫我又在席瓦程巴赫教授的實驗室裏面實習過；而別的學科却被我忽略了。我雖然承認自然界是一個美學的快樂之泉源，而非常重視它，並且對於自然界的美十分敏感，可是在當時我絕不想多知道一點自然界的事情。國內女學校中教的那些可憐的零碎知識只宜於毀滅人家對那門學科的一切興趣。醫科課程的狹窄的眼界培養了我的這種對自然界的淡漠，而後來革命的活動又把我的興趣集中在一切跟革命運動有關的問題上面，此外的任何興趣都遭受排斥。只有在關進了席呂塞爾堡以後，我離開了人羣，離開了社會，在這兒我的整個的宇宙就只有這麼小小的一片天空和這麼

① D. I. Mendelyev (1834—1907) 俄國化學家。

② Bern (Berne) 瑞士的一郡。

小小的一塊土地，到這時我的對自然界的態度才改變了。我纔明白我對於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其實是一無所知的。我不知道天空的歷史，也不知道大地的產生和發展，更不知道岩層的構成和進化。（我們要塞的圍牆就是用這種岩石建築的，我們腳下踐踏的也是它的碎片。）要是我俯下身子，在一個沙堆上抓起一把給春天太陽晒熱了的沙粒，然後慢慢地傾倒下去，像一道細流似地從我的手裏流下來那些淺紅色的碎屑和漂亮的發光小粒，那些透明的小東西究竟是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這兒有種草跟我們村莊公墓裏面長的完全一樣；還有一種花是我們從前採集鈴蘭時我在林子裏常常看見過的，可是我叫不出它們的名字，我也認不清它們。我起了許多疑問，我自己却回答不出來。

我這種遲緩的覺悟（即是對於自己知識淺陋的自覺）確實是我讀到關於沙托夸計劃的論文時發生的，可是起先我却走了一條錯路。我關進席呂塞爾堡的時候，我所有的醫學書都帶了在我的身邊，這次我便下了決心要把它們全溫習一遍。然而剛一開頭我就明白我這種辦法是錯誤的。既然我永無希望我把的醫學知識應用在實生活上，那麼我為什麼還要重讀病理學和治療學呢？既然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領域還有很多，那麼我為什麼還要溫習『過去』呢？『過去』並不會擴大我的視野的。自然科學便是這樣的一個

領域，我便專心去注意它了。

我們的圖書館在那時候是十分貧乏的，然而在這個圖書館裏面却有一本很好的書，奧爾士華特的植物學講義，還有着精美的彩色插圖。我熱心地讀完了這本書，然後開始在顯微鏡下面研究植物的組織。我們有了一架顯微鏡。這是韓加爾特用了五十個盧布替我們買來的，這五十盧布還是我們一班同志在彼得大帝的陣亡將士（他們是在彼得一世攻取席呂塞爾堡時●戰死的）的公墓四周修築一道圍牆時候掙來的錢。我們需要的試藥却是由獄醫奈米索夫給我們弄來的，他很周到地供應我們的一切的需要。

這時候我也開始在研究化學。我又在研讀着門德烈也夫的那本廣博卓絕的教科書化學基礎，我在大學裏唸書的時候，這本書給我的知識真不少。可是這一切並不能使我滿意——我希望的是聶人的語言，是我那些更有學識的同志們的指導。在我們中間有一個自然科學家I. D. 魯加雪維奇，他是在一八八七年他快要畢業的時候被捕的。他在大學唸書的時候，教授們對他抱着很高的期望，他們還想留他在大學裏繼續研究。他非常熟悉科學研究的方法，又有着完備而精確的知識，因此對於他那門學問中的任何問題他都可以

給一個十分確定的回答。他對自己的學識非常謙虛，他做概括時絕不草率，接受假定期時也很小心。同時他並不是獨佔知識，只要有人找他幫忙，他就肯把他的知識分給任何人。我也去找他，請他給我們來幾次有系統的講課，並且指導我們對自然科學作實際的研究。魯加雪維奇答應了我的要求，於是諾瓦魯斯基、莫洛左夫，跟我一塊兒做他的聽講者，潘克拉托夫偶爾也來參加。諾瓦魯斯基加入聽講，全是因為他以前受的是神學校的教育，他完全不懂自然科學；而莫洛左夫從小就喜歡研究自然，連對他自己已經知道的東西，他也從來聽不厭，所以他也來聽講。

魯加雪維奇跟莫洛左夫同伴在「第五號籠子」裏散步，在那兒他有一塊臨時的畫圖用的黑板，我當時也在他的隔壁「第六號籠子」裏散步，所以能夠聽見他的話，而潘克拉托夫和諾瓦魯斯基兩人那時候正在第一號園子裏面作工，他的話他們也聽得見。我們就這樣地學完了無脊椎動物學和植物學的課程，關於植物學我們圖書館裏倒有幾種好書。魯加雪維奇的靈活的手用日本蠟做了一些精美的標本作爲講解的說明，在這些標本裏面，他的刺衝水母和薩爾帕是非常之好，而他那些組織學的標本和許多幅圖更使他的講解十分明白易懂。

到了一八九六年我們開始從聖彼得堡的流動博物館裏借來它的豐富的收藏時，我們便能夠詳細地研究我們極感興趣的礦物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了。後來博物館方面把我們由被動的閱覽人的地位提升到增加博物學方面的寶藏的主動的合作者的地位，那時製造乾臘植物標本和採集礦石的實際工作又使我們從書本上以及從魯加雪維奇的講解中得來的知識更加充實了。諾瓦魯斯基有一次把我們經過柏茲洛得諾夫醫生的手送到博物館去的東西統計了一下列出一個表來，我們自己也想不到我們居然在三、四年中間替那個開明的文教機關做了這麼多的工作。可是我們出獄以後才知道我們做的東西並沒有完全交到博物館去，許多的標本顯然是遺失了，這是一件痛心的事。魯加雪維奇、諾瓦魯斯基和我把成千的植物弄乾來做乾臘植物標本，牠們整堆地放在我的工場裏面，等候着諾瓦魯斯基跟我兩人來把牠們貼在白色的紙板上（我們叫它做太太的紙板）那些保存得的很好的草在白紙板上看起來十分美麗可愛。對於這種工作我們後來變成熟練的專家了，我們擅長把帶有纖美的葉子的植物製乾，然後貼在白色紙板上，結果顏色的新鮮和設計的美麗不僅博得我們一班同志的稱讚（他們在獄中要求過展覽我們的出品）並且在巴黎博覽會中還得到了一致的讚揚，那是由博物館送去的，自然不會說明

這些標本是從俄國的巴斯底裏面來的。

一方面我們有着很多的空暇，另一方面在監牢裏又必須用少的東西求得大的效果。這樣一來，便大大地增加了我們一班同志的發明的才能，提高了他們的技巧，他們的確做出了許多的奇蹟。他們爲了研究物理學，便將就我們所能使用的那一點點的材料製造了一個簡單的起電盤，一個驗電器，連一架小的發電機也製造出來了。諾瓦魯斯基非常熱心地在採集昆蟲學的標本；他爲了想得到昆蟲發育的各個階段的材料起見，便在牢裏養起昆蟲來。爲着這個目的，他造了一座兩層的玻璃小屋，裏面再隔成許多小房間，我把他的這座玩具般的小屋叫做「孤立的監獄。」他就把各種的雌雄兩性的昆蟲分鎖在這些小房間裏面。牠們就在那兒下卵，從那些卵又孵出了幼蟲來。各種的昆蟲都需要新鮮的植物做食料，諾瓦魯斯基居然有耐性每天花掉兩個鐘頭的光景到處去找尋牠們需要的植物。他的這個大家庭漸漸地興旺起來了，等到昆蟲發育的各個階段全有了的時候，他便拿牠們做起標本來。這些標本都是放在精美的小盒子裏，外面糊上一層花紙，蓋頂是玻璃的。盒子裏面放得有完整的昆蟲，另外又放得有那昆蟲的分解了的肢體，連最小的觸角和管狀吸喇器官都是很完備的，他就只靠了一把廓大鏡和一把小鑷子的幫助居然完成了這

件工作。在某一個盒子裏面他還把昆蟲的化成的各個階段（從卵變到成熟的生物）完全地展覽了出來。

當我們需要着材料來製造孢子生殖的植物的乾臘標本時，魯加雪維奇表現了他的絕頂的聰明；照着他的要求，從溫室裏弄來了一磅乾的海藻，從雜貨店裏弄來了一磅地衣，地衣是拿來培養黏泥的。他小心翼翼地把牠們分開，他懷着極大的耐性把牠們浸濕，他又非常仔細地修整牠們，壓榨牠們，然後靠了一把廓大鏡，一架顯微鏡，和一個移液管把牠們一一分類，最後才交給莫洛左夫，諾瓦魯斯基和我做成乾臘植物標本。

我們研究地質學的時候，魯加雪維奇繪了一些很漂亮的彩色圖。圖上面有一直欄畫着動物和植物的形態，並且用圖來說明牠們在岩石下層發達的各個時期中的進化。另一欄說明在這些時期中地面的變化，第三欄又列舉每一個時期中的岩層。魯加雪維奇還不滿意這些圖，他又做了一個長而直的房子，配合着動植物生活的圖畫，安放了這些岩層的小標本，這盒子並且代表着一個地心的直的橫截面。我們爲了實習起見，靠着從博物館借來的偏光顯微鏡的幫助，把我們採集的鑽石和岩石標本拿來跟博物館借給我們的標本比較了一番，並且根據它們的表面來分了類。至於結晶學的研究，魯加雪維奇用木頭做了

許多的模型，有簡單的，也有複雜的，我們就練習從這些模型中認出各種不同的形狀。這個工作在諾瓦魯斯基做起來，是很容易的，可是我却常常因了我的忽促而錯誤的分類引得他們發笑。一個人的眼睛怎樣逐漸地給訓練好了，觀察起來倒是很奇怪的。譬如一個旅行家剛剛到了日本或中國，不能夠辨別每個日本人或中國人的特徵，却以為他們全是一樣的相貌，我的情形就是這樣的，我起初在那些複雜的標本中間就只看出了一種形狀。後來我的眼睛漸漸地學會了在角、脊、面的中間看出種種的區別來。

博物館派給我們做的工作中間有一件是裝置花的標本，就是把花和它們的各個部分完全配置好，用玻璃保護起來。這個工作由諾瓦魯斯基和我兩人擔任，我們做了幾百件這一類的美麗的標本裝置，每一件都附了說明。諾瓦魯斯基特別熱心地替博物館做這種工作，他比我們全都熱心。我以為在他之後就要算我了，莫洛左夫應該列在第三名，他專門採集青苔和地衣，他非常仔細地把它們裝置在一些乾淨的硬紙盒子裏面。

我們也沒有忘記研究化學。在魯加雪維奇的指導之下，諾瓦魯斯基和我完成了一課分析化學的實驗，這一門學科在我算是復習，而在諾瓦魯斯基，它却是完全新的東西。當時在老監裏面有一個專為我個人工作的舖子，我們就用這樣的方法做我們的分析的實驗。

我站在我舖子門上那個小窗洞的旁邊，而魯加雪維奇和諾瓦魯斯基却站在外面走廊上。這樣一來我們都可以看見我們想觀察的化學的反應了。每次我們做完了一套實驗以後，我就會轉身向着魯加雪維奇，高興地對他說：『魯加，你真想不到，你灌注在我心上的光明使我多麼快樂！』過後我又會添上一句：『可是這兒還有一個黑暗的角落，你把它也照亮吧！』於是我們又準備着別的更進一步的研究了。

因此在幾年中間我們把自然科學的幾個最重要的部門都一一地研究過了。對於我，這些講解和這些集體的實地研究使我這空虛的監獄生活也有了意義。除去精神勞動所給我的快樂以外，我還有另一種滿足：觀察我們這位沒有人比得上的講師的無限制的利他心（爲了幫助別人他從不吝惜他的時間和精力）便是一個流不盡的滿足的泉源。我們一方面因爲想着自己參加了有文化價值的工作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我們自己的手所做出來的東西還使我們得到大的美學的快樂。監獄裏面沒有一樣美麗的東西，然而我們却創造出令人不能不讚美的美麗、精巧的東西來。

這一切對自然科學的興趣把魯加雪維奇、莫洛左夫、諾瓦魯斯基和我四個人結合成一個親密的圈子，由於共同的工作和繼續不斷的見面來往，我們的友情逐漸地增加了，並

且在大家離開席呂塞爾堡以後，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

通 信

來遲了的快樂並不能溫暖我們的心，所以經歷了十三年的牢獄生活以後，我們得到了通信的權利，當時我沒有一點高興。在這十三年的長時期中間，我的家族親戚們都已經漸漸地退到遠處去了。我們的生活的路分歧了，而且愈走愈隔得遠。在我的眼睛裏他們好像是死了一樣。像這樣長期的沒有再見希望的分別不是就跟死一樣嗎？倘使當初我們進監獄的時候就有着通信的權利——那一定會是多大的幸福；接觸我們的親屬就等於接觸活的世界。可是他們不願意我們這樣，連這一點權利他們也給我們剝奪了；他們故意給我們安排一種反常的處境，使我們跟一切習慣的正常的事物隔絕，想由此爲我們造一個奇怪的野蠻世界，一個『洪荒世界』讓我們住在這裏面。

通信的權利也許會恢復我們跟我們親屬的聯繫，縮短我們中間的距離，增加我們的

感情，可是我們一年裏面只能收兩次來信發兩次回信。只有兩次！就是這個限制妨礙着親密的接觸，迫使我們的熱情冷卻。並且，我們還不可以保存外面的來信，讀過的信函都得一一退回。可是誰都知道，人在某一種的心境之下重讀舊信，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我不知道別人的感覺怎樣，在我呢，看見親人的筆跡的確是一件愉快的事；當我看着一封信的時候，在我的心上就湧現了寫信的人的面貌，並且跟着這外形同時還出現了他的主要的精神狀態。用打字機打出來的信件却不同了，它們是沒有人性的，我一點兒也不想收藏這樣的信件，它們並沒有筆跡的分別，並且只有在看到簽名以後才能夠斷定寫信的人是誰。

在我們這樣的生活情形裏面，外面的來信並不會給我們帶來快樂，它們帶來的反而是焦慮；我們很興奮，然而沒有快樂的感覺。這是一種痛苦的興奮，這樣的興奮是那班寧願忘記一切的人纔有的，當他們的平靜的心境因一件使他們記起外面世界的東西的闖入，而被擾亂了的時候。

岡查洛夫 ● 告訴我們，在阿布羅莫夫村裏，收到一封信，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它擾亂了

● I. Goncharov (1813—1891), 俄國小說家，阿布羅莫夫是他的長篇小說阿布羅莫夫中的主人公。

阿布羅莫夫的身上體現了當時一部分俄國人的惰性和多愁的性格。

阿布羅莫夫村裏人的日常生活，給他們帶來了紊亂。在他們看來，信就是苦惱和麻煩的使者，那裏面不會有什麼好的東西，他們並不忙着拆信，却讓它等一會兒！得讓他們看慣了那個信封，準備好了接受那信的內容——這樣他們總是在三四天以後才來拆信。在我們中間，也有跟這個類似的情形，譬如樂巴丁，要是他在飯前接到一封信，他總是把它放在一邊，不讓它敗壞他的胃口，他認為信裏一定有什麼不愉快的消息；他吃過了飯，還是不去讀信，免得它妨害他飯後的休息。自然，我們裏面也有人並不是像他這麼鎮靜地敏感的。

究竟我們的親屬給我們寫些什麼呢？他們的信裏沒有一句關於公衆事務、社會生活的話——那是警察總署不許可的。在這些信裏面唯一的例外就是那封最先寄到牢裏來的信函。那是我最小的妹妹阿爾加寫來的十六頁的長信。這信裏並沒有什麼問好、關切、感傷、解釋一類的開場話，那樣的話會使我興奮感動的；她跟我講話，就好像我們姊妹剛剛在極尋常的情形下面分別一樣，也可以說，好像在我們分別了的十三年中間，她已經寫過了很多的信，這不是第一封，這至少是三百零一封了。她描寫着一八九六年下諾弗哥羅的俄國工業展覽會，以及在同時舉行，而且引起了當時一般人非常注意的「大會。」由這一點，我的妹妹又講到威特●的財政政策，以及由它產生的俄國工業的發達。她又講到社會民

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由於俄國工業的進步，而受到很大的鼓舞；她又講到民粹派和馬克思派的鬭爭，馬克思派這時正經過了他們的最初的狂飈時期；她又講到在文學中，在家庭的圈子裏，經濟的唯物論引起了意見分歧，引起了論辯，而且幾乎引起了爭吵，使得我們的年青人中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和熱烈的爭辯。這封信的內容不像是私人的，它完全帶着一種社會的性質；我們在信中感到了生命的呼吸，我們聽到了年青的挑戰的聲音。這封信傳遍了整個的監獄，我們每個人都帶着絕大的關心讀了它。然而，我已經說過，這第一隻燕子，就是它這一類的唯一的一隻。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得到過這類的信函了。這一封信之所以逃過了警察總署的關口，不會引起注意，完全是因為我的妹妹很巧妙地將社會事件織在普通的家庭生活以及家庭中關於馬克思主義的閒談這一類的場面的中間。

我們親屬的來信通常總是講些關於天氣的話；什麼天旱啦，暴風雨啦，冰雹的損害啦。他們還講些麥子的收成，菓子的收穫諸如此類的事；還有不少的篇幅便讓家庭中的記事佔了去，像什麼結婚、生產、死亡等等，都詳細地記錄着。不管這些信的內容是如何地單調，它

● Sergey Y. Witte (1849—1915) 俄國政治家。在一八九二到一九〇三年中間他是俄國的財政

大臣。

們仍然傳遍了監獄；我們熱心地讀着它們，就像我們在頭幾年中間那樣，不論抓到什麼東西都拿來反覆誦讀，連那份毫無價值的神學刊物『進香客』我們也仔細讀着，我們總想在什麼地方，哪怕就是一行一句也好，找到一點與生活、與時事有關的暗示。

這些信雖然不會滿足我們那個想知道在外面世界裏發生的事情的願望，但是那唯一的可談的話題——家事，却給我們不少的同志帶來悲哀和痛苦；這方面有時候是很悲慘的。有一個同志得到信說他的孤寂的年老的母親連一個住處也沒有。她顯然是得了憂鬱病；她常常在夜裏離開家毫無目的地在街上蕩來蕩去。有一次她把她所有的東西全堆在一塊兒，她正要放火燒掉它們，却給人發覺了。大概那些跟她同住的人因為時時都要看住她，覺得太麻煩了吧，這位老太太便不得不搬到另一個城裏去住。可是在那個城裏她沒有親戚，又沒有熟人，也沒有任何的進項可以過活，她只好到孤老院去。誰都知道孤老院是一種什麼樣的組織。這母親是一個平常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女人，她有她的自尊心——她一輩子就討厭那些給無家的人居住的慈善的收容所。我們的同志要求准許他把在監牢裏掙的錢給他的母親寄去。警察總署不答應，不過警察總署自己寄去了五十盧布。然而錢給退了回來，警察總署通知兒子：錢到時，他的母親已經死了。

在另一個人的家裏，情形變得更壞，招致了破落的結局。母親早就精神失常，已經在精神病院裏住了好些年了。父親是一個地主，孤寂地住在一個單調無味的外省小城裏自己的莊子上，害着重病快要死了。一些陌生的人圍着他，在計劃分他的家產。他的兩個妹妹吵得厲害，居然到了彼此不講話的地步，第三個妹妹被他們疏遠了以後，墮落到社會的最下層裏去了。這許多事情是在好些年裏面一件一件地發生的，可是現在它們却像鐵鏈的一擊似的，一下子全打在那個囚人的頭上來了。

安托諾夫的不識字的母親的來信是簡單而懇切的：自然這都是她口述而由別人寫下來的信。她抱怨她的寂寞，傷心跟她兒子分開不能見面，又說到她晚年的孤苦無靠，在悲痛的句子之後她一定要添加一句：「可是上帝啊，求您的意志實現吧。」

可是我們呢？我們應該寫些什麼呢？我們不可以寫我們的同志的事，也不能說到監牢房屋的構造，建築的式樣，連我們住的監房的情形，監獄的管理條例等等也都不能寫出來。警察總署的檢查員老是用一種猜疑的眼光去讀我們的信，而他的猜疑已經到了可笑的程度。有一次樂巴丁寫信給他的弟弟，信裏講到失眠症時，他引了一句普式庚的詩：『半明的月在哨兵的槍頭刺刀上發光。』警察總署把信退了回來，要他重寫。一個守衛在要塞的

圍牆上走來走去，在要塞的上空就跟在整個大地的上空一樣，照耀着一輪明月！無怪乎警察總署的檢查員會在普式庚的詩裏面找出暗示着牢中監房的構造的意思了。事實上，警察總署在規定我們只能抒寫個人自身事情的時候，倘使他們盼望着在我們信裏看到我們心境的反應，發見我們見解的改變的話，那麼他們就失望了；我們一點兒也沒有談到我們自身的經歷。

既然我們這個生存的外表是這麼貧弱，而我們的內在的生活被我們密密地封閉起來，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可寫的呢？既然我們都盡力避免把我們靈魂的任何一個角落打開讓外人看見，既然他們不許我們提這個說那個——那麼在我們的信裏難找到自由、親切的調子，也是很平常的事。信裏的話多半是勉強的，不自然的；我們常常不得不化費很多的功夫寫信，只是爲了勉強湊成夠多的材料去填滿大幅的信紙。不用說，我們不能夠讓半張信紙空着就寄了出去！幸而這些檢查員讀長信讀得厭煩了，即使規定一年只寄發兩次信件，他們也嫌檢查起來麻煩，不久他們就改發普通的信紙了。

在過去的十三年中間，親戚的關係疏遠了，記憶淡了，對於親屬的感情改變了，也可以說是有點變怪了。當我知道我所喜歡的舅舅已經死了時，我也只是覺得難過而已。我不好

說這是一種冷靜的、純粹有理性的難過！可是那隻跟我一塊兒住在我監房裏的小鳥發了一陣痙攣死去時，我却感到真正的大的悲痛。那隻鳥已經養馴了，牠坐在我的肩頭啄食我手裏的花椒菓。我能夠用我的手掌蓋住牠的柔軟溫暖的身體；牠站在我桌子上愉快地叫着，牠在通着水管的淨水盆裏洗澡的時候，牠高興地拍着翅膀往四面八方濺起水花。牠死後我整整哭了兩個星期。我一看到牠平日棲息的那隻木釘，我就止不住我的眼淚。爲了制止我的悲傷，我不得不要求督察長給我暫時換一個監房。不，我無意寫語短情長的信。

有一次莫洛左夫爲着確定他給母親和妹妹寫的信裏並沒有犯忌的話免得讓檢查員退回起見，在我們一塊兒散步的時候，他特地把那封長信唸給我聽。等着他唸完了，我便說：『好，這倒是你的計劃的好材料。』我們兩個都笑了。在本來是應當哭的地方我們却笑了起來！我在一八九七年到一九〇一年中間寄回家去的那些信裏面也盡是這一類的缺乏自然和坦白的、苦心寫出的文句。只有在一九〇三年，我的麻木的靈魂纔給喚醒了，那時在我被強迫着長期地中斷了通信之後，我忽然得到消息說我母親在生病，快死了，我纔明白我是永遠，永遠再見不到她了。

不錯，信函不是一件快樂，它却是一個負擔。警察總署並不明白他們做的是什麼樣的

事。那些官員們以爲他們減輕了我們的痛苦，可是事實上這安慰也只是是一種嘲弄。要是獄吏們在允許我們通信之前，先來問我是否願意，我一定回答一聲：『不，』不過同時我得請求他們不要對我母親提起我的這個答覆，免得傷了她的心。

潘克拉托夫和帕立瓦諾夫

一八九八年潘克拉托夫離開了席呂塞爾堡，一九〇二年帕立瓦諾夫的刑期滿了。

瓦西里·潘克拉托夫是一個職業的細木匠。他小時候很窮苦，他的父親死得很早，遺留下一家人，都是些小孩子。『我們真是很窮，要不是我們鄰居的農人們幫忙我們的話，我們已經餓死了。』潘克拉托夫有一次對我談起他這時期的生活情形時，他這樣說。

潘克拉托夫在彼得堡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革命黨。後來他的一個同志向官廳自首了，他因此不得不躲藏起來。一八八三年他同工人馬爾地諾夫、安托諾夫參加了民意社的軍事組織。

那時我們的黨已經到了衰落的時期。潘克拉托夫在基輔的時候，他實行武裝抵抗，打傷了一個憲兵。他因此被判決了二十年的懲役罪，跟老羅夫和馬爾地諾夫一塊兒給送

到席呂塞爾堡裏來。在基輔的監獄中，人們把他們當作普通徒刑犯那樣剃成光頭，這個辦法曾經引起他們的堅決的反抗，這反抗還得到其餘的囚犯的支持。

潘克拉托夫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了席呂塞爾堡，那一天我是值得紀念的，因為看守把他帶進了我隔壁的那個監房，他算是我被捕以來的第一個鄰人。在彼得保羅要塞中我是完全單獨的監禁着，以後就來到了席呂塞爾堡，我一個陌生的囚人，不懂得監獄裏談話的方法，也不知道敲壁的技術。我們許久都無法交談，只好失望地、困惱地離開我們中間的那堵牆壁。後來我們終於學到了敲壁的方法，我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潘克拉托夫關進席呂塞爾堡的時候，他只有二十歲。他這樣年青就結束了他的自由生活，這情形喚起了我對他的深切的同情。我比他大十二歲，我覺得像他這樣一個充滿新鮮力量的年青人，應該比我更難忍受我們的這種生活。所以我懷着母親般的慈愛對他，在我爲他寫的詩裏面，我也曾表露過這種感情。

潘克拉托夫性情急躁，又激烈，不肯向人低頭，又不能忍耐，可是他對我却不是這樣。他憎恨憲兵恨到徹骨，連極尋常的事情，他也歸咎於他們，其實據我看來，這些事跟他們沒有什麼關係。我常常安慰他，解除他的病態的懷疑，設法避免他的發作，我知道他的病態的憤

怒一旦發作，他就會陷入不幸的處境中了。督察長沙科羅夫知道他拒捕的情形，也知道在基輔的獄中剃頭時他發狂的情形，便非常小心不去激怒他，也不像欺負別人那樣去虐待他。因此潘克拉托夫在席呂塞爾堡中還過着平平常常的日子，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故。在我們頭幾次的敲壁談話裏，我就知道潘克拉托夫很想專心研究科學。我便鼓勵他研究，並且盡力給他幫忙。事實上他在席呂塞爾堡中的漫長的歲月並不是白白地浪費了的，等到他出獄的時候，他已經有了極豐富的學識，這使他後來在西伯利亞能夠參加科學的探險，並且在地質學上有了新的發見。

一八九六年的大赦把他的刑期減去了三分之一，他本來應當在一九〇四年出獄的，却在一八九六年就離開了我們。

帕立瓦諾夫一八八二年被關進亞歷克賽半月堡中，兩年後纔移到席呂塞爾堡裏面來，一九〇二年他服滿了二十年的刑期，被釋出獄，流放到阿摩梭斯克去。帕立瓦諾夫從那裏逃到了外國；然而一九〇三年他在一種神祕的情形裏面在法國用手槍自殺了，當時他正在跟阿柴夫商談什麼事情，並且後來我聽見人說，他正準備着跟阿柴夫合作在俄國內幹一樁恐怖主義的暗殺事件。

彼得·帕立瓦諾夫是薩拉多甫一個闊地主的兒子。他是革命陣營中最富於同情心的人。他還是在中學校的時候就已經表現了他對人民的熱誠和信心。他的浪漫的血液鼓動他一八七八年到西伯利亞去做義勇軍，參加西伯利亞的獨立戰爭。一八八二年他已經加入了民意社，他計劃把他一個同志諾維次基從薩拉多甫監獄中救出來。他實行這個計畫時殺死了一個警察。然而計畫却失敗了：他們逃走時坐的車子翻了；諾維次基，帕立瓦諾夫，和另一個同志拉伊可被追趕的人捉住，並且受了酷刑。拉伊可因傷重死去了，諾維次基和帕立瓦諾夫被判決死刑；被告們遞了請求減刑的呈文上去，於是兩個人的死刑減成了終身懲役。帕立瓦諾夫解釋道，他希望由這請求減刑的呈文減輕諾維次基的惡運。他對我們說：『我相信他願意活下去，可是沒有我他不會遞什麼請求減刑的呈文的。』

在亞歷克賽半月堡中帕立瓦諾夫受了很多的苦，使他幾乎自殺。不過他寫下了一部藝術價值很高的回憶錄，這是在席呂塞爾堡中開頭寫起，出獄以後憑着記憶修改、續完的。他的神經衰弱是很厲害的，並且還要連帶地發覺鬱病，這使我們大家非常耽心。他在發病

① Y. Azef 是俄國革命黨中的一個奸細，他是德加葉夫一類的人，不過比德加葉夫更能幹。他的秘密

後來被蒲爾切夫揭露，但他本人却逃掉了。

的時期中竭力避免跟同志們見面談話，他整天不肯離開監房，就在裏面不停地走來走去。這時候他的心境很鬱悶，充滿着疑惑和猜忌，跟他平日那種和善的性格完全不合了。

帕立瓦諾夫非常愛讀書，他是用了快得令人不能相信的速度在吞食書本。有一次我對他表示我的驚奇，他便回答道：『我同時看讀十五行。』我記得我在什麼地方讀過一則記事，說只有著名的小說家左拉讀書時候是這樣地快。帕立瓦諾夫讀書並非隨便流覽，我們有好些證據證明他把他所讀過的東西記得非常清楚。例如他有一次對着我們把很厚一本倫敦泰晤士報的週刊幾乎一字不差地背了出來。他的非凡的記憶力使他能夠在席呂塞爾堡中積蓄了很豐富的知識。他最感興趣的是政治史和社會科學。除了他那部亞歷克賽半月堡中的回憶錄外，他還寫了一本監獄生活的故事。這兩本書表現了他那卓絕的文學才能。在我們大家熱心寫詩的時期中，帕立瓦諾夫也寫了些俄文詩和法文詩。

在我們中間，帕立瓦諾夫得到不少的朋友；我們不能不愛這個聰明而又和善的同志；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豪俠的氣概，同時他又有着單純的孩子氣。

當他得到了自由，有機會從事廣泛的活動並且滿足個人的抱負的時候，他却在國外自殺，我們這些跟他一塊兒度過陰暗愁慘的獄中歲月的人聽到這個消息，不由得不大大

地吃驚了。

工場與花園

在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四年中間，牢裏開設了很多的小工場，因此凡是願意作工的人都有使用那些工場的權利，在那時候，體力勞動在我們的生活中就佔着一個重要的位置。在這方面我們現在還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政府支付購買各種材料的花費倒很慷慨，我們便開單購買了很多的木板，木塊（留待車旋後使用），鑲蓋板（而且常常是很貴重的木料的鑲蓋板），漆，薄紙板，厚紙板和紙。我們中間有的人做了精緻的傢具，有的人却做一些粗的用具，譬如衣櫃，書物架，安樂椅和普通椅子之類。有幾個人擅長用楓木，胡桃木，栗木等等材料做匣子，或者車出菜盆，花瓶，碟子之類來，這些是司令官和獄吏們定下來給我們自己使用的。我們的工作因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做的，所以出品的第一個特點就是美觀，而且常常是很雅緻的。其實我們中間只有三個同志是工人出身的（就是潘克拉托夫，

馬爾地諾夫和安托諾夫，此外誰也沒有拿過鑿子、鉋子，我們全是從那本涅基次的手冊裏學到的。我們試過各種不同的方法，並且有過一些小小的發明，這在那班爲了餬口而工作的人是辦不到的，我們有時候居然完成了一些使我們自己得着不小的審美的愉快的傑作。那些特殊美觀的出品常常要陳列在走廊上，讓所有的人都能夠看見它們。例如安托諾夫花了半年功夫雕刻出來的碗櫥就這樣地陳列過。他爲了這件工作得到二十五個盧布，他把這筆款子分給我們大家。

安托諾夫多年來就想着弄到一個鎔鐵爐來做鎖匠的工作。後來在一九〇〇年得到了『皇帝的恩准』可以安置這個鎔鐵爐了。爲着這個目的，我們一班同志自己動手在衛城的大院子裏建築了一大間房屋，提到這個院子，我們都會記得，我們中間有好些人（連我自己也在內）曾經穿過它走到懲戒室去，懲戒室就在那個極像拷問室的神祕的古建築物裏面。可是從一八九三年起情形就不同了，現在在這個舊拷問室的十個監房裏面，每天總有十五個到二十個人快活地在工作；到後來這些人在工場裏工作的時候，憲兵們也難得把門鎖上了。那個老監從前總是帶着極荒涼、可怕的样子，現在它的寬闊的走廊却給細木工使用的各種木板堵塞住了。在鐵匠舖裏我們的同志們自己造了一個鎔鐵爐，於是

工作開始了，各種各樣的東西給製造了出來：剃刀，小刀，本匠器具，糖鉗，小斧子。安托諾夫帶着自信地對我說，他能夠造一架汽船的發動機，還能夠給我製造一架鋼琴。

我們的園藝也很發達。我們根據目錄開單買來了各種蔬菜和花卉的種子。我們培養了四百五十種不同的花。在這方面魯加雪維奇特別擅長，他從小孩時候起就是一個植物學的鑒識家和愛好者。至於蔬菜呢，我們甚至挑選了一個園子作為展覽蔬菜的地方。在一個用罩布裝飾着的寬闊的壇上（罩布是用一些彩色蝴蝶結繫住的）陳列着魯加雪維奇的大蘿卜，安托諾夫的大洋蔥，我自己的草莓，瓦西里·伊凡諾夫的薔薇，帕坡夫的番茄等等東西……參觀者中除了囚人外還有司令官韓加爾特和醫生。魯加雪維奇開單選購種子時，他記起那班抽烟的同志，（他們在席呂塞爾堡中很感到沒有烟草的痛苦，）他便寫上一個拉丁名字 *Nicotiana*，這樣居然讓他弄進來了一種上等的烟草，後來又弄進來了馬珂爾加[◎]的種子。我們下了種，等到葉子長大，我們便把它們採下來，曬乾，於是我們的一部分同志便抽起烟來，起初只是祕密地抽，後來就索性公開了。我們沒有火柴，只好設法找火種，這樣我們就經過了人類在製造火種的歷史中所經歷過的一切的階段。諾瓦魯斯

基想出一種摩擦的方法，用一根旋轉的金屬桿，結果牠只冒烟，不發火，一個火星也沒有。[V. 蘇洛夫柴夫提議用火石和鋼的辦法；他把爛布燒起來了，拿朽木給抽烟的人引火；在我們花園的土壤中有不少的火石，他甚至用硫磺同木屑製造了一些硫磺火柴。煙草的烟霧和氣味很使獄方耽心，他們便打算索性使抽烟成爲公開許可的事。一八九六年內務大臣郭列米金視察監獄時，柏茲洛得諾夫醫生便向他要求允許我們抽烟，說煙草可以預防壞血病，郭列米金居然答應了。可是火柴的分配量很少，許多抽烟的人都把一根火柴分作兩根，這樣滿足了他們的嗜好。

我們多數的同志對種花種菜的事情都非常熱心，非常愛好，所以單是那六個指定種菜的園子和那六個我們在監禁期的第二個十年中間種花的「籠子」似乎太小了。我們後來得到韓加爾特的許可又開闢了兩個園子，算是第七園和第八園。以後那兩個熱心家弗洛林柯和帕坡夫居然又弄到了舊衛城的那個大院子。他們跟別的同志們一塊兒把它耕種起來，從前我給他們帶到懲戒室去的時候，我見過的而且使我感到大的喜悅的那塊原始的草地現在給他們破壞了，但他們也毀掉了那個淒慘的刑場的一切嚴酷兇殘的痕跡，在那個刑場上曾經槍決了我們的同志密拉科夫和麥秀根，後來在一八八四年拉加切

夫和席特龍堡又死在那兒，以後在一八八七年烏利安諾夫、謝威列夫、安德烈尤席金、阿西潘諾夫、節涅拉羅夫全在那兒受刑。至於那個歷史的監牢，現在那裏面開設了好些小工場，就在那個歷史的建築物前面，我們的同志們種了一大塊地的烟草，一大塊地的番茄，一大塊地的胡瓜，並且還開闢了許多的溫床，在溫床裏連甜瓜也給他們培養出來了，他們還給甜瓜起了那麼響亮的名字：金善。愛好園藝的弗洛林柯在園子和「籠子」的每個角落裏都種了菓樹和草本菓子。當他爲了購買插枝需要錢時，他向我們的共同的團體請求允許他個人單獨種一塊地，那麼他便能夠掙來他所需的款子（十個盧布）。可是這個要求却牽涉到「主要的問題」了：它是不是跟集體主義的精神相衝突。我們辯論了許久最後纔決定不讓弗洛林柯單獨種一塊地，不過他所需要的錢（就是超過了他所要求的十盧布，也無妨）可以在公共的基金中支出。

就靠着這些小工場和這些分給我們耕種的地，我們的監獄纔逐漸進步（不過進步得很慢）而變成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工作社會，跟一個正在忙碌勞動的蟻塚倒有點相像。我們中間大多數人對於既沒有確定的目的又沒有系統地讀書的事情都感到了厭倦；我

們對於研究學問而沒有希望把所得的知識拿來應用的事情也都感到了厭倦；還有，繼續不斷地想着那些同樣的思想和同樣的夢，永遠因為那些同樣的愁煩而痛苦；這類的事也使我們生厭了。我們既不能夠獻身於社會工作，也不能夠創造或生產一件於別人有利的東西，而體力勞動倒使我們緊張的神經得到了弛緩，我們的精力找到了一條出路，並且只有在這一個範圍裏面我們纔能夠主動地使用我們的勞力。因此，用我們的勞力把這個不毛的岩石的土地改變成柔嫩的草木場，把這荒涼的沙漠變為菓樹園的一角；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找到了一個真正的目標了。有時候我們的同志們在這方面居然造出了奇蹟。瓦西里·伊凡諾夫在他那塊小小的土地上把各種的薔薇，全培養出來了。他這兒有月季花，苔狀薔薇，愛爾蘭薔薇，黃薔薇，處女紅薔薇，還有些名字我已經忘記了。魯加雪維奇和諾瓦魯斯基做了一些洋鐵管，把水引進他們的園子裏去，他們在園裏造了一個五尺高的噴泉。噴泉的細流落進一個小小的圓池子裏面，池子是用雜色的石子鑲底的，四周種了一圈水草，十字花和別的東西。當細股的水噴在空中，往四面射出水花的時候，池裏的水也靜靜地在飛濺，並且發出啾啾的低語。我常常叫這個做「巴克齊沙烈噴泉」。

諾瓦魯斯基跟魯加雪維奇兩人特別熱心美化我的環境，諾瓦魯斯基沿着「第一號籠子」（大家都把這塊地看作我的私產）的籬笆種下了常春的牽牛花。每年夏天牽牛長得極繁茂，它那沿着籬繩盤旋纏繞的籬子，爬滿了整個籬笆，造成一面厚密的綠牆，牆上點綴了一些大的白色鈴子，這是新開的花。空氣裏只要有了一絲的風，這面活的牆就會像一幅可愛的綠寶石的籬子搖動起來。諾瓦魯斯基又用一根洋鐵管子把水引到「籠子」中央那個三角形的花壇上，在那兒給我也造了一個「巴克齊沙烈噴泉」，跟我以前讚美的他和魯加雪維奇兩人種的園子裏面的那個噴泉完全一樣。這一面完全掩蓋了監獄籬笆的綠牆和那個在牢裏很少見到的低語着的噴泉，把這個我最初幾年散步的地方完全改變了。那時候這是一塊光禿的不毛之地，連一片草也沒有，地就像岩石一樣堅硬，平滑，淒涼，這塊地是給人處了死刑，照字面的說法和照比喻的說法都說得通，在這種被強迫的不生產的狀態中它死了而且堅硬了。

鐵絲網

我們的農業家雖然得到了兩個新的園子，並且開墾了衛城裏老監前面那一片大院子，可是他們並不滿足。他們就跟托爾斯太的故事一個人需要多少地裏面的農人一樣，只想着把自己土地的範圍繼續不斷地擴大，永遠沒有停止的時候。他們只要看見一塊荒地就得想法把它弄到手來種。他們想起老監後面的空地上長滿了野草，而其實那塊地很可以變爲一個花樹雜生的園子，蘋果樹，忍冬，丁香……按照季節開花。他們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他們的積極的固執的努力終於在一八九八年或一八九九年得到了成功。「好，幹吧！你們工作吧，把地種起來；只要牢裏安安靜靜不出事就行。」監獄當局的想法好像就是這樣。

老監後面的那塊空地其實只是一塊毫無價值的荒地，地長而窄狹，三面是要塞的高

牆，地上長滿了極繁茂的蕁麻和牛蒡，中間還雜亂地放了一堆樹皮，那是我們從車牀上需用的木料上面剝下來的。土地的上面一層約莫有三尺深，都是些夾雜着石灰石和小石子的土塊，因此在那裏只能夠生長最普通的植物。在一個角落裏長着一株百年的山樗，它跟老監前面院子裏的那株是一樣地可愛，在這滿目荒涼的景象中它是唯一的悅目的東西，而且更令人感到這個可惜的地方的荒廢了。我們那班園丁們就看中了這個地方，決意把它改變成可愛的天堂的一角。

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他們須得把他們幽禁生活中的全部精力花在這件事上面。他們把這塊空地的整個地面都翻了過來，石頭全弄乾淨了；小石子也搬開，拿去鋪砌花園和「籠子」的地面。要種樹栽花，必需先得到肥沃的土壤。我們的同志們挖了一個又深又寬的坑，一直挖到藍色的志留亞紀的黏土，把這種土挖出來，拿它跟沙粒和鋸屑、樹葉等混合在一起，做成一種上等土壤，至於那些石灰石、小石子以及這塊荒地上堆積的垃圾，我們的園丁們就拿它們來填洞穴。

這種真正艱苦的初步工作做完以後，他們節目中的創造的部分就開始了，他們不肯讓我去看他們工作的情形；我的同志們想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時候到了，他們喚道：「薇

「娜來」

看守們把我帶到那裏的時候，已經逼近黃昏了。我記得上一次看到那個地方，它還是在一種極混亂的情形裏面。現在我走進去，不由得我不驚訝地站住了。在山樛的近旁我看見了一個花園，一個裝飾着灌木和花壇的美麗的小花園。花正在開放。高高的百合展開了它們的黃色的扇形杯子；耬斗菜打開了它們的中凹的紫冠；白色烟草花的旁邊燃燒似地開放着深紅的荷蘭石竹，一株漂亮的大利花垂下它的覆盆子顏色的頭。在好些地方忍冬的暗綠色葉子遮住了丁香的深綠葉，可是老山樛的可愛的羽毛般的樹葉和大串的紅果，卻像華蓋似地罩在整個園子上面。啊，這真是奇蹟！跟一個真正的花園一樣，這塊小地方有一道鐵絲籬笆跟其餘的地面分隔起來。

在這傍晚的柔和光線中，我站在那兒，帶着沈思看望四周，溫暖的空氣輕撫着我，木犀草的芳香從我的鼻孔沁入。這多美……多可愛！我眼前有一個花園，有花，有一道鐵絲籬笆，還有要塞的高牆圍在四周。一陣漠然的感情在我心上湧了起來，從我的眼裏意外地淌出了淚水。「這些眼淚從哪兒來？爲什麼我要哭？」我不由自主地問着自己，我看不出有什麼悲哀的理由。我問着，却得不到回答。

等我回到「家」裏（我已經習慣了把監房叫做「家」了，）稍微靜下心來的時候，我明白了。我那班同志在要塞的圍牆內用勞力創造出來的有花有灌木的小園，和那道囚人們用自己不熟練的手簡單地編成的網格不勻整的籬笆，使我記起了另一些花園和另一些籬笆。過去的圖畫早已被我用意志的力量埋藏在我記憶的深處，可是現在它們却浮起來了。這些久已埋葬了的景象現在却又從它們埋葬的地方出來了；現在是它們用眼淚來表示抗議，它們責備我不該把它們看成了已死的東西。

視 察

在最初的十年裏面，每隔半年總有一位聖彼得堡的高級官員到我們這裏來視察一次。來的總是內務大臣、警察總署署長或者一位將軍。所以在我們的長時期的監禁中我們已經看見了一大串交替地担任着國家要職的大人物。

這類大人物中的第一個，就是一八八五年來我們這裏視察的阿爾測夫斯基，他是當時的內務部次官和憲兵司令。提到他的視察，不由我不想起下面的一件事。

當時我隔壁的那個監房是空的，再隔壁的一個監房裏面却住了人。起初每到晚上我總聽見沈重的脚步聲：向前五步，又退後五步！我反覆地在猜想這究竟是誰呢。過了幾個星期，脚步声停止了；在散步的時間內那個監房的門也不再打開了：囚人生病了。現在不論白天或夜晚我老是聽見一個人的幾乎是不間斷的低聲呻喚，這聲音引起了我的不安：在我的

近旁就有人在受苦。這是誰呢？我認識他嗎？我屏住氣靜聽着每一個聲音（這聲音在走廊上是聽得清楚的，）想認出那個囚人是誰。

我的左邊隔了一個監房也住着一個垂死的病人。這便是離我最近的兩個鄰居。所以當阿爾測夫斯基從那裏走到我的監房裏來，問我有沒有什麼不滿意的時候，我便要求他給我免去這無謂的痛苦，我受不了這種終日終夜不間斷的病人的呻吟的確這種呻喚聲整日整夜都不肯放鬆我。我問他：是不是可以把那兩個病人搬開，離我稍為遠一點。阿爾測夫斯基默默地聽完我的話，並且默默地走出了我的監房。

我的左右兩邊的患病的鄰人仍舊住在原地方沒有移動。我們向阿爾測夫斯基提出的其他的申訴也是一樣地毫無結果。

瓦西里·伊凡諾夫控告憲兵們在押他到懲戒室去的途中打他，他說沙爾克維奇醫生可以作證。阿爾測夫斯基便把醫生找來問詢。這個卑怯的人却證明並沒有這樣的事，然而事實上在伊凡諾夫挨了打暈過去以後出來救活他的正是這個醫生。因此阿爾測夫斯基對伊凡諾夫的控告，只聳了一下肩頭，作為答覆。

一個害肺病的人訴苦道，他的虛弱的身體受不了囚人的飲食，黃芽菜和粗麥粉，阿爾

測夫斯基帶笑回答說，粗麥粉是上等食物，他自己就很喜歡吃它。

在最初的幾年中間天氣老是冷得很。我當時正患着貧血症，也許我的冷的感覺是從這個病來的，總之我在監房裏面得穿着我出去散步時候穿的半皮衣服。所以一八八五年秋天警察總署署長杜爾諾渥帶着他的隨從走進我監房裏來時，我也穿着半皮衣服。他臉上現出滿意的笑容。「您爲什麼現在就穿半皮衣服呢？」他向我問道。

「我冷，」我回答。

「奇怪，我一點不覺得這兒冷，」他接着說。

他的兩頰通紅，從他的口中發出葡萄酒的氣味。我們看得出來，他在司令官那裏吃過了一頓極豐富的早飯，司令官現在還陪着他在各處視察：他不冷，這倒是容易了解的。

「冷熱的感覺完全是主觀的，」我冷冷地回答他道。

約莫兩三年以後杜爾諾渥還來看過我一次。他仍舊跟從前一樣帶了一大羣隨從，諸如司令官，督察長，以及要塞憲兵隊的好些軍官全在裏面。

這是高官們視察席呂塞爾堡時通常有的預防的手段。「您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健康狀態怎樣？」總是這種官腔的問句。過後他們馬上就走開了。

突然間我監房的門又打開了，杜爾諾渥一個人走了回來。我當時正站在房裏，背靠着牆，人很激動。（這是每次我們的孤獨生活給人擾亂了時都有的情形。）他邁着快步向我走來，信賴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膀上，親切地看着我，小聲問道：「您在這兒住得不討厭嗎？」

我的眼睛表露了我的心意，可是我說了一句：「不！」那隻放在我手膀上面的手立刻抬了起來，他指着桌上的一把菜，用了完全不同的官腔問我道：「這是從園子來的嗎？」話一說完他馬上就走出去了。

杜爾諾渥的成績很不錯，他顯然很想跟席呂塞爾堡裏面所有的囚人暢談，樂巴丁居然跟他大談要塞裏的生活情形。

這些先生們從來就不會對囚人隱瞞着什麼不好的消息。雅諾維奇關進要塞以後大約五年的光景，他們告訴他，他的七個近親的死訊。杜爾諾渥又把他的妻子改嫁的消息對他說了。

至於其餘的到過席呂塞爾堡來視察的官員，我們要是一一描寫起來，便有了各種性格的典型了。

有一次來過一個粗魯傲慢的軍人馮·瓦爾將軍。他看見我的監房裏沒有一幅聖像

大爲吃驚，便問督察長這是什麼緣故。督察長回答說：「囚人把它拿掉了。」我不想找麻煩尋架吵，所以一聲也不響，其實是憲兵們把它拿掉的，他們大概帶回自己家裏去了。

謝別科將軍到我們這兒來過三次。在一八八七年，我提出過一次控訴。在這以前不久他們發下了紙和鉛筆給我們，我用一張很小的紙條寫了幾句問好的話給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利·波格達諾維奇。我把這字條藏在一本書的封皮裏面，我先把封皮弄開，然後再用黑麵包把封皮黏好。這個辦法居然成功了，這鼓勵我再試一次。可是這一次却失敗了。憲兵們發見了字條。督察長沙科羅夫氣沖沖地跑進我的監房裏來，粗暴地向我叫道：「我們把你一直當作男子漢看待，你却不懂得愛惜這個。你再要寫字條，我就給你顏色看！」後來謝別科到這兒來視察，他問我有沒有什麼控訴，我向他說明這件事情，我還說，倘使沙科羅夫不改變他對我們的態度，我便要實行自衛。他的那種粗暴的方法和舉動我們實在不能忍受。謝別科用同情的聲調回答我：「您不幸給關在這個監牢裏面；每次的反抗只能夠使您的處境更壞。」

似乎只有我一個人才有這個幸運，謝別科對我倒很溫和。可是在雪巴林的監房裏他問督察長道：「這種無禮的怪相算什麼？」特利哥尼的控訴中提到人民的權利，他用粗話

回答說人民的權利應該全部取消，他走的時候還吩咐督察長說：「鞭子，督察長先生，鞭子。」他在另一個囚人的監房裏也說過跟這類似的話。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挨了他一頓罵，說是態度不好，他並且恐嚇她說「獄規上有體刑的一條。」

我們決定，要是他下次再來視察，我們一致抵制他，對他的問話我們概不回答。過了一年或一年半光景，他又到席呂塞爾堡裏來了。他最先到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的監房裏去。「您的母親」他開始說，他分明有什麼關於她母親的消息要告訴她。魯特米娜到席呂塞爾堡以後還沒有得過她母親的消息，這是第一次。可是她打斷了他的話：「我不要聽您的話，就是說到我母親的事，我也不要聽。」謝別科也不再訪問任何人，就走了。顯然是他從憲兵那兒得到了我們決定對他抵制的消息。

施威亞托頗克—米爾斯基的視察，在我的記憶中，是跟下面一樁有特性的事情關聯着的。施威亞托頗克—米爾斯基根據賽爾該·伊凡諾夫的要求，允許我們把各人勞動的生產品送給自己的親屬。我們中間每個人都想拿自己的美術細工給家屬送去。我也給我母親做了一套很漂亮的海草和苔蘚的標本，還做了一個核桃木的小匣子，上面印着我母親名字的縮寫字母。可是我的家屬並沒有收到。警察總署的人對我家屬解釋道，他們

不願意讓這些東西成爲「遺物。」

書籍和雜誌

我在前面已經提過，我們初到席呂塞爾堡的時候，監獄圖書館裏並沒有幾本可讀的書，然而在當時讀書便是我們的唯一的消遣。我們住下來以後，圖書館的藏書也漸漸地增加了。除開韓加爾特買給我們的全部圖書外，憲兵們還拿了一些雜亂的材料給我們裝訂。這些材料中間主要的還是他們訂閱的廉價雜誌的增刊：書名極時髦動人，而內容全是浪漫故事、犯罪故事之類的荒唐小說。他們利用免費裝訂的規定，常常送來大堆這類的無聊東西，終於使我們不得不拒絕再去裝訂它們。在起初的十年裏面我們白白地開了好些張書單，我們希望圖書館能夠把它們買來。監獄當局把我們的書單送到警察總署的首腦們那兒去，那班高級官員不是不理會我們的要求，便是譏諷地批駁說我們這種非分的要求得花費一兩百盧布。有一次一位高級官員來視察我們的監房，我們裏面有人向他要求給

我們一些非硬性的讀物，他回答說，上面不准給我們讀文藝書籍，怕我們會受到刺戟，然而在莫洛左夫向那些視察的「大人物們」提出要求以後，我們的科學方面的資料也逐漸增加了。不過大批好書的購進却是一八九五年以後的事，那時在韓加爾特的管理下面，我們開始用工作換錢，並且可以拿這筆錢給圖書館購買新書。我們積起了一筆相當數目的錢的時候，我們就把我們需要的書籍開列在一個單子上送給監獄當局，只要經過本地的和中央政府的檢查員的批准，書籍便可以買進來。在這方面，也常常發生奇怪的事。有一次他們不准購買麥爾特瓦戈的不在踏壞了的路上——他們不知道這是一本農業的著作。另外一次他們在我們書單上刪去了柯林士版斯賓塞社會學簡篇，然而他們在這時以前却把他們在一八八九年沒收了的斯賓塞的社會學退還給我們。後來他們又禁止我們讀高爾基和契訶夫的作品。

一八九六年郭列米金到這兒來視察過以後，警察總署答應我們每年撥款一百四十盧布給我們的圖書館添購新書，讓我們自己開列書單，不過自然得經過檢查員的審查和批准。當時我們一共有二十個人，那麼問題就發生了：我們根據什麼來選擇書籍呢？有的人認為最好是憑多數人的表決。可是這樣一來，像魯加雪維奇，莫洛左夫和雅諾維奇那樣的

專家少數個人的需要就會完全給忽略了，因為只有多數人要讀的書才有機會開列在書單上。另外的人提議把一百四十盧布分成二十份，這樣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名下那份錢購買他需要的書；倘使他那份錢用去買他要的書還嫌不夠的話，他可以找別人合作共同購買。這種辦法使我們可以放棄個人自己的一份錢，或者只放棄一部分，去幫忙那些需要購買售價特別高的著作的人；我們辯論了許久，終於決定採用這個計畫，於是我們把錢積在一起，互相贈送書報。我們爲着莫洛左夫訂了一份理化學會會刊；後來又訂了一份英文雜誌；化學新聞；我們也爲着雅諾維奇訂了一份很好的英文年鑑。我們又合起來訂了一份德文的自然科學週刊，和一份英文雜誌知識，還有別的刊物。我得承認我們大家對於科學界的新奇的事都感到很大的興趣。我們讀到鐳和氣的的新聞的時候，整個監獄都騷動了，我們不停地談論着有放射性的物質。以太究竟存在不存在呢？關於這個問題莫洛左夫和魯加雪維奇兩人抱着不同的見解，而且這個問題引起了大家熱烈的爭辯。●關於飛機的最

● 我們散步的時候會談到航空術未來的發展有大的希望。看守們聽見這樣的話大爲吃驚，他們連忙通知督察長，督察長立刻將觀察界雜誌的副刊收回，因爲那本副刊上面登載了一篇關於這題目的論文。憲兵們以爲我們要飛出去了。——著者。

初的消息得到了我們大家熱烈的歡迎。莫洛左夫在席呂塞爾堡中寫成的論文雷和風暴的啓示是根據天文學的天體圖來解釋啓示錄的著作，它使全監獄大爲激動。樂巴丁搖着頭憐憫地問道「莫左洛夫是神志清醒的，專心在研究聖經和神父們的著作嗎？他不是在發宗教狂吧？」可是安托諾夫非常高興地說，莫洛左夫是一個天才，他將來會成爲一個全歐洲的著名人物。

在各種期刊中我們也接到「俄國財富」「上帝世界」和「俄國思想」●都是在出版以後一年光景才見到，至少也得讓他們先把「國內政治的記載」剪掉才拿給我們。只有一次我接到一本本年的「歐洲使者」。有時候我們也得到一些別的刊物。所以我們在一九〇〇和一九〇一年中間居然也知道當時俄國的覺醒，學生運動，一般的不安和遊行示威等等了。

還有兩種刊物對我們的精神生活也有大的影響，一種是「經濟家」●這是地主們的刊物，另一種「財政使者」是專門替威特的財政政策和商業政策辯護的刊物。「財政

●譯者沒有見到這些刊物，不知道它們的適當譯名應該是什麼，在這裏只好按字直譯。

●這恐怕不是適當的譯名。

使者」由警察總署自動地按期送來。從這兩種刊物我們得到了關於俄國經濟問題和工業發達的全部知識。我們對這些問題極感興趣，並且發生熱烈的辯論；我們中間多數人的興趣都接近農業，同時也有人擁護威特的政策。

在一八九五到九六年的冬天司官韓加爾特送了新字。來叫我們裝訂新字！在我們跟外面世界逐漸隔絕的整整十五年中間，我們從沒有聽到任何新的東西，我們最後一次得到「新的消息」還是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八年關進要塞裏來的那些人帶來的。現在從這雜誌的篇頁上許多新的思想像一陣雪崩似地對着我們傾注下來，把我們這種消極的被動生活擾亂了。年青而熱烈的思想向我們所極寶愛的民粹派的思想挑戰。農民公社被人攻擊了，他們主張自由的、個人的發動力。那些作者讚美着由節儉獲得的資本作為不可避免的高利貸和剝削的例證時之有益的影響。農民被看作小資產階級；但是農民得變成無產階級，那麼他們「在工廠的大鍋裏煮過之後」就會變做社會主義者了。那個新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這一切的「新語」像一個思想的炸彈似的在我們中間爆炸了。社會民主主義潮流的最初的根在一八八四年還不容易見到，連俄國資本主義的發

達在當時也還是一個疑問；對於俄國資本主義發達的可能性，一般革命青年所持的見解倒還是否定的。然而現在這個已經變成強大的新傾向却突然出現了，它要來爭取勝利。問題起來了，都是些精確的、明白的問題……我們要塞的高牆外面，在整個革命陣線中間正發生着一種激烈的論爭，可是連一個戰鬪的回聲也沒有傳到我們這兒來。現在一本雜誌到了我們的手裏，它很技巧地、很出色地反映了當時正在進行的鬪爭。說是農民應當在那裏面「給煮過」的「工廠的大鍋」在我們的頭腦中沸騰起來。有許多地方傷害了我們，惹怒了我們；有許多很厲害的地方就好像是對我們的抱負的一個侮辱，我們尊敬我們所愛的思想和人物，可是我們這份尊敬也像是給它侮辱了。這份雜誌給我們留下一種深深地擾亂的印象；它的內容打擊了我們最寶貴的理想和信仰。我們中間立刻分成了不同的陣線：有些人感到勝利了，有些人受傷了。魯加雪維奇和諾瓦魯斯基這兩個企圖再來一次「三月一日」的一八八七年的恐怖主義者宣佈他們是社會民主黨，雖然他們也贊成民意社的戰略。他們得着雪巴林和雅諾維奇的支持；莫洛左夫後來也參加了他們的陣線。其餘的同志，連我在內，都是土地與自由社和民意社的社員，我們這班人民主義者（即

指暗殺沙皇的事。亞歷山大二世是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被暗殺的。

民粹派）却反對他們。於是開始了討論和激烈的爭辯，這等於小規模地做造了當時監獄外面的那個大論爭。每個人替他自己的見解辯護，並且在這場論爭中使用了惡毒的辱罵，和自負的挑戰語：相信着自己主張的勝利，相信着自己主張會得到現實生活的支持。奇怪的是，我們那位學者，我們那位客觀的、勤苦的博物學家魯加雪維奇却是一個最厲害最好吵的戰士。這論爭愈來愈激烈，後來實在吵得太厲害了，我不得不出來講話，我說：「同志們！在我們大家過的這種生活裏，和平地相處倒比學理的爭論更重要。我們從此就停止我們的論爭吧！」這些話究竟是成了我們那個小小的浪濤洶湧的海上的一滴油呢，還是我們已經明白，目前我們誰都不能說服對方，最好讓那份刊物給我們帶來的新思想在我們心裏安靜地經過一番時間的考驗再說，這個我不知道；不過從這時候起我們的爭論就漸漸地緩和了，雖然我們意見的爭執仍舊存在；可是戰鬥的心境却消滅了。魯特米娜·亞歷山德洛夫娜和我兩人在第五號、第六號「籠子」裏常常跟我們那班社會民主黨人發生爭辯，這樣的爭辯同時在獄中別的地方也發生着。後來我們想起當時我們怎樣爭得面紅耳赤，並且魯加雪維奇因為我主張土地公有怎樣猛烈地攻擊我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好笑。

我們圖書館的書已經增加了不少，特別是科學的書籍添得最多，因此，他們從一八八

七年起發給我們的紙張現在也有了更重要的用處了。起初它被我們用來排遣寂寞，使我們能夠寫詩表白自己。現在那班選了專門學科來研究的同志有機會積蓄起必需的科學資料並且把它記錄下來，然後利用着他們蒐集的論料完成一部有創造性的著作。

莫洛左夫有系統地一天一天地工作，他終於完成了他的一部傑作物質的構成，這部書寫得很生動，叫人讀起來非常愉快。他用了一大堆紙寫出許多篇論文，記錄下許多條筆記，並且作了許多很出色的物理學，化學，天文學方面的推測、假定；他出獄的時候，他把這些材料全帶走了。至於席呂塞爾堡中其他的學術性的活動，我還可以提出雅諾維奇那些關於經濟問題的有價值的統計表，這是他犧牲了自己的健康、熱心地做出來的。魯加雪維奇在著述一部關於『科學的哲學之基本原理』的大書，他出獄以後曾出版過兩卷大地的無機的生活，還得到地理學會的金牌獎，後來又得過科學院的阿黑瑪托夫獎金。

當上面這幾個同志在從事科學的工作的時候，其餘的人便埋頭於文學方面的著述。我早已提過了帕立瓦諾夫那部美麗的亞歷克賽半月堡中的回憶錄，弗洛林柯在寫他的童年的回憶，帕坡夫在整理他在加拉曠山中寫的回憶，他又寫了一些描繪各種農民典型的短篇故事。賽爾該·伊凡諾夫寫了一些西伯利亞生活的故事。尤可夫斯基在寫他的長

篇小說恐怖主義者之家；莫洛左夫也寫了他的美麗的『我的生活的曙光』在這特寫裏面他把兒童的天真和青年的浪漫調合在一塊兒，我們都高興讀它。我寫過一篇文章，講到文學對於七十年代青年的主要的精神的影響，諾瓦魯斯基寫了一篇辯駁的論文將那些引起農奴解放喚起革命運動的經濟的條件作了一個有趣的分析。我們裏面還有人幾次想出版一種『刊物』計劃在嚴肅的討論中攪進幽默的成分去。

人通常總不重視健康和光明，除非到了他失掉它們的時候；在平常的生活裏人隨手都可以得到紙張，因此也沒有人會看重它。可是一個熟悉監獄史的人就會知道，好些年裏面得不到一張紙，沒有機會寫下自己的思想，無法消愁遣悶，不能記下或許會得到的知識，那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我們在席呂塞爾堡中的生活沒有任何的變化，沒有任何歡快的鼓舞；我們同志們的贈品，例如安慰、鼓舞的詩，批評，或者喚起新思想的嚴肅的論文——都是受歡迎的禮物，而且是沒有紙和筆就不能完成的東西。

我們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是極其貧乏可憐的。當魯加雪維奇繪他的最初幾幅地質學圖的時候，他用他所點的燈上的煤烟做黑色，用監房牆壁的灰泥做藍色，還用了自己的血做紅色。

我們的本哲明

布烈特·哈爾特在他的小說熱鬧帳幕中的好運中，描寫着在一羣淘金者的帳篷裏有一天一股山洪沖下來一個母親和一個小孩，母親不久就撇下那個孩子死了，那個孤苦無靠的小孩却成了這羣挖金人的意外的快樂和幸福的泉源。當卡爾帕維奇關到席呂塞爾堡裏來的時候，他也成了我們的這樣一種幸福和快樂的泉源。我們非常喜歡他，馬上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做「本哲明。」

他的事情一般人都知道，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二日他從柏林回到聖彼得堡，兩天以後在教育大臣波哥列坡夫的客廳裏，他開槍打傷了這個摧殘大學青年的人的頸子。在波哥

● F. Bret Harte (1836—1902) 美國小說家。小說原名 *The Luck of Roaring Camp*。譯者

未讀過原著，不知道這是否適當的譯名。

列坡夫做教育大臣的時候，一九〇〇年發生了學生的暴動，這個風潮被壓服了以後，好些大學生被強迫服兵役作爲懲罰，並且根據教授們的判決，一百八十三個基輔大學學生和二十七個聖彼得堡大學學生被送進軍隊充當普通士兵。這種辦法，再加上幾次罰服兵役的學生的自殺事件，激起了所有的知識分子和大學青年的憤怒，自然在卡爾帕維奇的心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印象。卡爾帕維奇在去柏林之前曾經親身參加大學的暴動，並且兩次得着開除的處罰。因爲自己參加了學生們反對歷屆教育大臣在學府中維持的那種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的鬭爭，因爲自己承認他們的目標相同，命運相共，因而跟學生團體的關係非常密切，同情十分深厚，並且自己相信學生運動有着重大的政治意義，卡爾帕維奇便下了決心，他要對那個學生處罰事件的第一負責人表示一次武裝的抗議。他從沒有加入過任何的革命團體，他決定一個人單獨行動。他連忙從外國趕回來，他並不找任何一個人幫忙，就單獨地完成了他這件英雄的事業。波哥列坡夫傷重不治而死，卡爾帕維奇在一九〇二年三月被判決二十年的懲役罪，給人押送到席呂塞爾堡裏來。卡爾帕維奇的這行爲，~~保護了一般的~~保護了一般的大學青年，他的行刺事件發生以後，大學生便不再被強迫服兵役了。~~保衛隊~~舞着一般的年青人，他們稱他做「勇敢的鷹」並且在他們中間也出現了巴

爾馬雪夫。這個青年在一年後用社會革命黨的名義做了一件同樣的犧牲自己的行爲。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八年的那些審判以後的十三年中間，就再也沒有一個人從外面世界給帶到我們這個要塞裏來過。到了一九〇一年我們留在這兒的人就只剩下寥寥的幾個——我們一共只有十五個人，其中有九個是被判決終身監禁的。我們被判定了生活在這個小圈子裏面，長久沒有一個新人加進我們裏面來，我們只是在我們生活環境的窄小範圍以內，永遠思索着同樣的思想，發生同樣的感情，經歷同樣的心境，始終找不到一條通自由世界的出路。在這灰色的監獄生活中，一年一年地希望消失了，期待死去了，連記憶也漸漸地消滅了。我們曾經希望過讓一些新的年青的同志來接替我們，然而沒有用——並沒有新的戰士出現。

在我們這種普遍的絕望的心情中，在一九〇一年三月的末尾，有一天安托諾夫來報告我們說，要塞的大門打開了，一個新人給帶了進來，現在正在辦公室裏面，這天上午十點鐘敲過以後不多久，我們還在散步，憲兵中間忽然起了一陣騷動。他們走來分別地通知我

● 巴爾馬雪夫 (Stepan Balmashov) 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殺死了內務大臣西皮雅金，五月三日受

絞刑。

們每個人，說要是有人想回到監房或者去工場工作，那就得馬上去，因為過一會兒我們就不得離開天井了。我們推測大概是那個新囚人就要給人從要塞押到牢裏來了，那些想從自己監房的窗戶看到新囚人的同志便連忙回到自己的監房裏去。我沒有去。我覺得難過，好像我在參加一個對我很親近的人的葬禮一般。說真話，難道這不是一個葬禮嗎？他們正是在這兒埋葬一個年青的生命，一個充滿着未花費過的精神和未使用過的力量的一年青的生命。十七年前我們走進這個要塞時，我們就得長年累月地忍受這種自知光陰虛度的痛苦感覺。他現在也得忍受這種痛苦的自覺了。

根據安托諾夫的報告，這是一個高個子而身材合度的青年，他邁着輕快的脚步走進我們這生活裏面來。他不像我們那樣進監獄時戴着手銬，他也沒有穿那種背上縫着類似紙牌紅方塊形△的黃色標記的囚衣；他微笑着揮着他的帽子向囚窗的方向行禮招呼。

卡爾帕維奇的出現使我們大家非常激動：我們舊一代的人現在得第一次跟一位新青年的代表面對面地相見了，而這一代的新青年却是在我們跟生活隔絕了的那些年中間長成而且發展起來的。我們怎樣相見呢？我們彼此在對方的身上會找到些什麼呢？這個從遠方來的使者給這個監獄的沙漠帶來的是什麼？什麼消息，什麼心情呢？我們在他身上

找到的又會是什麼呢——一個真正的兒子，或者一個外來的寵兒？

在一九〇一年監獄的管理情形已經跟一八八四年的不同了。卡爾帕維奇既然關在我們近旁，要想把他跟我們隔離，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們走過他的監房或者他散步的『籠子』時，很可以站住，交談幾句話。這幾句話很容易延長為時間較久的晤談，並且我們馬上利用一切的機會引入親密的談話。我們由於敲壁通話和由門縫裏交談的辦法，開始知道了一些外面世界裏發生的事情。可是我們渴望更多知道一些，因此我們便要求他把那許多的消息寫下來，等他散步的時候把它埋在地裏，那麼會有人挖它起來，拿它傳遞給大家閱讀。我們想知道每一件事情，俄國國內生活的一切詳細情形以及在西歐發生的一切大事事件，我們全都想知道。對這個工作，卡爾帕維奇倒很能勝任，因為他做學生時候就非常活動，他到過好些地方，並且在國外住過一些時候。

他帶來的好消息使我們的靈魂復活了。照他說來全俄國已經活動起來了。在八十年代中人們很難看出勞動階級的存在，可是現在俄國的勞動階級却變成跟西歐那種工業的無產階級一樣的了。他們團結起來，堂皇地進入公共活動場，要求經濟情形的改善，組織幾萬工人的大罷工，並且在大街上遊行，顯出他們的正在生長的力量。大學青年的數目比

從前更多，並且不再像七十年代那樣地散漫無組織了，現在他們在全俄國結成了一個整體，一致地起來反對俄國的警察統治（當時各大學都是捏在它手裏的）。學生運動的浪潮遍於全國，結果幾百學生遭逮捕，幾千學生被開除。在每個都市裏都有祕密的印刷所，出版了不少革命的小冊子和報紙，並且散佈了很多的宣言。要是某一處的印刷所被查封沒收了，馬上就有一處新的建立起來代替；遭了一次挫折以後，他們會用更新的精神和力量再來工作。卡爾帕維奇預言道：『五年裏面俄國一定會發生革命，』他說錯了，只是時間，因為革命在四年裏面就發生了。然而我們當初進監獄的時候並沒有聽見羣衆的聲音，一切社會份子都沈默着，所以我們現在也不敢馬上就相信這樣一個預言——我們怕相信它。在我們的那個時候社會是停滯不動了；除了我們自己的抗議外再沒有抗議的聲音。一切都睡着了。難道真的能夠醒起來嗎？那麼爲什麼就讓我們孤寂地呆在我們這個活葬墓裏面呢？要是戰爭真的打得厲害，要是人民真的覺醒起來正在爭取勝利，那麼爲什麼他們不送些新的同志來呢？我們監牢裏面還有很多的空地方，的確多得很！我們的死者也留出來了空地位。爲什麼就不見有人來遞補呢？卡爾帕維奇不是在說大話嗎？他不是讓他的幻想鼓舞着他忘記了現實呢？這種情形在一個剛剛給人從政治鬭爭裏活生生地抓走

的青年，倒是很平常的事。

我們的全心靈都被他的這一番話深深地震動了。他的到來把我們的監獄生活整個地翻了起來。卡爾帕維奇現在應當在這兒身受的生活條件，跟我們在前十年中所身受過的比較起來，已經是好多了，可是他仍然不肯忍受那些壓在他身上的獄規的限制：他因為是新來的囚人，不能夠在工場裏工作，也不能跟一個同志結伴散步。卡爾帕維奇對這種種的限制開始有系統地反抗起來。我們知道這種反抗不會產生改革，因為這兒的管理制度是由聖彼得堡規定的，要想強迫督察長接受任何改革的條件，那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卡爾帕維奇還想用絕食的辦法來爭取他所身受的種種限制的改善。他第一次的絕食，由於他相信了從聖彼得堡請來的軍醫的欺騙的許諾而終止了。第二次他實行絕食，那是因為獄方禁止我們在散步的時候停留在他的「籠子」門口跟他講話的緣故，我們也從此拒絕出去散步，算是參加他這次抗議的一個表示。過了五六天以後，我們大家爲着卡爾帕維奇的命運開始感到不安了。同志們推舉我去找司令官交涉。司令官堅決地不許我們去跟卡爾帕維奇談話。可是我隨後問他：『要是我們不顧禁令去跟他談話，我們會不會受到體刑呢？』『不，』司令官答道。這樣一來我們便取消我們的抗議，都出去散步了。我在卡爾帕維

奇的「籠子」門口站着跟他談了一個多鐘點的話，事情就這樣地結束了。

有一次警察總署根據我們幾個同志的要求派了一個牙科醫生到牢裏來。我們怕他回去會做什麼對我們不利的報告，所以在事前就商妥大家好好維持着秩序。可是卡爾帕維奇却忽然想起要唱歌，他拚命提高聲音唱着，整個地方都充滿了他的歌聲。督察長卜洛瓦托洛夫走去請他不要唱，一共去過兩三次，都沒有用。卡爾帕維奇並不理睬。督察長便把他帶到老監裏去，他在那兒住了兩三天。

兩年以後他所受的限制大半都取消了；他現在是我們這個監牢社會中享受同等權利的一份子了。卡爾帕維奇並不是一個專門從事用腦力工作的人，他不能夠把自己的精力單單用在這一方面。他非常熱心地去做體力勞動，起初他在細木作裏面作工，後來他又在鐵工場裏勞動。他變成了安托諾夫的分不開的同志；在安托諾夫的指導之下，他成了一個精巧的鎖匠，他們兩個人一塊兒做出了各種漂亮的東西。

卡爾帕維奇對待我們的態度就跟兒子對待長輩的態度一樣，他那向下的睫毛表示出他跨進這個「俄國的巴斯底」時，他對我們這班囚人所抱的親切的尊敬，我們這些席呂塞爾堡的老居民都是卡爾帕維奇的長者，有的大他十歲，有的大他二十歲，或者更多一

點，單是這個就決定了我們跟他的關係，一種朋友而兼父執的關係。我們非常渴望着新的同伴，我們待他特別地慈和。我們這位本哲明常常連睫毛也不動一下就急躁地把我們牢裏的規矩攪亂了（有一次他像一隻貓似地爬過籬笆，跳進隔壁一個「籠子」裏去。）巴丁稱他這種急性做「青年人的敏捷。」事實上他這「青年人的敏捷，」在我們看來有一種特殊的動人處，這是我們對於他這種孩子氣的惡作劇，這種向我們忍受慣了的一切拘束阻礙的挑戰的一個響應。並且我們非常高興地知道在我們（一班老革命者）和他（一個新的一代革命者的代表）之間並沒有一條鴻溝，我們對彼此的心理並沒有什麼不了解，這都是我們當初知道一個新囚人意外地來到席呂塞爾堡的時候所耽心過的，可是現在我們高興地發覺這種耽心是多餘的了。

● 卡爾帕維奇一九〇七年從西伯利亞的放逐地逃出，去英國。以後的十年中間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英國度過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發後不久，他從英國搭船回俄國。這隻船被德國潛水艇擊沈，卡爾帕維奇也溺死了。

十八年後

跟從前一樣，席呂塞爾堡的白牆同它們那些角上的高塔立在那兒，很像一些做得不好的復活節蛋糕；跟從前一樣，席呂塞爾堡的大門緊緊地關着。跟從前一樣，河水有時平靜得像一面鏡子，有時却帶着怒吼衝向在涅瓦河源頭的我們這個小島的平平河岸。然而在監獄裏一切都改變了。從前這裏有過不少的「居民」，可是到了一九〇二年終光景，就只剩下十三個人了。●多數的人死於壞血病和肺病；另一些人服滿了刑期，還有幾個遇赦出獄，至於那三個精神錯亂的病人則在一八九六年給人送到醫院裏去了。爲着這最後的

● 弗洛林柯，莫洛左夫，瓦西里·伊凡諾夫，阿新布倫勒爾，安托諾夫，樂巴丁，S·伊凡諾夫，斯塔洛得伏爾斯基，帕坡夫，魯加雪維奇，諾瓦魯斯基，卡爾帕維奇和我自己。特利哥尼在一九〇二年春天出獄，帕立瓦

諾夫在這年秋天出獄——著者。

十三個人，監獄裏仍然維持着像從前那樣多的人員。平均有二十到二十五名看守照料一個囚人，那麼每一個囚人一年的費用不會少於七千盧布，這在當時確實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不過對於我們這十三個人，嚴格管理的方法後來終於緩和了。囚人們用了頑強的攻擊的戰略，一步一步地爭到了各種權利，並且逐漸使這些權利擴大。雖然上了子彈的來服槍仍然像從前那樣地掛在走廊裏架子上，可是嚴格管理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在好些監房裏仍舊掛着一八八四年的獄規，然而在實際上早已沒有人談起『良好的品行』和對它的獎勵——如結伴散步和使用花園與工場之類的特權了。這一切的特權已經成了人人享受的權利；過去的種種的差別完全消滅了。在我們那次爲了爭取圖書的同盟絕食之後，他們改善了我們的伙食，好像他們想用肉體的食糧來代替我們的精神的食糧似的；他們開始供給我們的茶、糖和白麵包，並且把我們每天的伙食費從十戈貝增加到二十三戈貝。

從那時候起就沒有人因營養不良而死去了，我們這班剩下來的的人的健康也有了顯著的進步。散步的時間，以前只限於四十分鐘，現在也逐漸地延長了。我們可以差不多整天地待在室外，只除了到工場去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夏天，我們就是在吃過晚飯以後（我們

在七點鐘吃晚飯，還可以待在外面。在我們這班久已忘記夏天夜晚是什麼的人，這是多麼大的快樂！雖然我們只能多待半個鐘點，可是這是多麼美的傍晚！從近旁河上吹來的涼而濕潤的風溫柔地拂着我的臉，我的胸膛微微地起伏着……天空佈滿了星星；太陽帶着火光西沈；監獄的輪廓，那些石牆的輪廓已經不很顯明，並且在黃昏裏逐漸褪色，也不像在眩目的白日光線中那樣損害我們的眼睛了。我那久已忘記的感觸又給喚醒了，周圍的一切對我變得極其生疏。

我們監房的內部設備也改善了。牠們不再像先前那樣地陰鬱了，並且房裏有了充分的陽光和空氣。窗戶的上層可以整日打開。我常常傾聽着單調的浪濤擊岸聲，我覺得好像看見了浪花擊着要塞石牆而破碎了……

從前那種只能用讀書排遣寂寞的單調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我們整天有種種的事情，我們可以從格子籬笆看見同志們的面容，聽見他們的聲音，我們還可以一塊兒在戶外工作，並且輪流替換着做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我們的圖書館當初只有一百六七十本書，但在十八年中間圖書却增加到二千冊，一部分是科學書，另一部分是純文藝的書籍。

除了馬爾地諾夫和拿哥夫斯基兩人在九十年代初期還跟督察長費多洛夫衝突外，

囚人們所受的待遇也比較合乎人情了。到了一九〇〇年光景聖彼得堡的高級官員好像忘記了離那首都三十五公里以外，還有一些重要的政治犯給監禁在一個要塞裏面；他們的事情太多了，沒有功夫來想到我們。社會民主黨運動的迅速活躍的發展，學生中間不斷的風潮，最近組織起來堂皇地宣稱它的存在的工業無產階級之出現於政治舞台——這幾件大事把政府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去了。革命已經公開地出現了，在俄國大城市的廣場上公然地升起了革命的紅旗。那麼他們怎麼還能夠想到寥寥幾個八十年代初期的革命者——民意社的黨員呢！

自從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以來，差不多過了二十五年了，以前那種死一般的平靜是沒有了，現在生活裏有的是一天天地高漲的浪濤。一種活動的抗議的氣息已經傳遍全國。聖彼得堡的高級官員來視察要塞的事也停止了。從亞歷克賽半月堡調來的憲兵都已陸續離職，他們得到了恩俸，至於留下來的那些全是又老又聾，已經在牢裏住慣了……因此也變得相當溫和了。

以前他們總是在督察長沙科羅夫巡視監房的時候呆呆地板着臉站在那兒。他們從沒有離開過督察長單獨跟我們在一塊兒。現在他們有時候也對我們講話了。他們也不再

害怕負重大責任了，他們不怕反抗，也不怕逃獄；架子上貯藏的槍好像已經起銹了。既然聖彼得堡的高級官員已經把我們忘記了，那麼監獄當局也沒有理由要在席呂塞爾堡的高牆裏面來壓迫我們。嚴格的管理放鬆了。只要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發生就成了！只要不驚動聖彼得堡的高級官員，只要沒有什麼會引起他們責斥的事傳到他們的耳朵裏就成了！在監獄裏，在我們的圍牆裏面，我們是暫時的主人。要是如今在監牢裏響起了什麼聲音，一聲叫喚，或者偶然的一句罵人的話，它們都不是從獄吏口中發出來的，却是某一個囚人的聲音。叫喊的並不是督察長，却是囚人在對他叫喊！

我還記得特利哥尼出獄前不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們裏面沒有一個人能夠長久支持一次激烈的抗議的。」他的話當時引起了我心裏痛苦的反應。

是的，疑惑可能已經偷偷地進了我們的心中，那就是對於我們的精神逐漸變成遲鈍這件事的疑懼。然而我們怎麼能夠表示這種反抗壓迫的戰鬥精神呢？我們應當抗議什麼呢？我們應當要求什麼，應當爲什麼戰鬥呢？我們的生活並不會供給我們這一方面的任何的藉口。我們在監獄裏面能夠用我們自己的力量，靠時代的力量爭取的並且得到的一切，我們都已經爭到手了。我們的敏銳的痛苦感覺已經變成遲鈍的了，我們就像一些坐船過

險陷在大洋中一個無人島上的人。我們這幾個失去了跟其餘的人類重聚的希望的新魯濱孫。現在只有一樁可做的事情：儘可能地維持我們的精神力量，耕種一個和平的工作園地。遺忘的幕下垂在我們的心上。

到了一九〇二年，我們中間多數人差不多都是在二十年前被捕的，我也在內。有的人還不只監禁了這麼些年。倘使這時候我們的記憶還是像它們在二十年前那樣的敏銳，那麼我們一定不會活到現在。我們的精神爲了自保生存的緣故已經漸漸地適應着環境了。然而那個長而痛苦的適應的時期也已經結束了；凡是不曾在這時期中病死、自殺、發狂的人已經達到了均衡。時間使他那流血的傷口結了疤。過去的事都被忘記了，沒有被忘記的也被我們用意志的力量壓抑住了。劇烈的痛苦也被鎮壓下去了。我們的心已經靜止，遺忘也已佔着優勢，因此看起來好像整個的宇宙都忘記了我們。不僅是首都的官員們，連地上的每一個人都把我們忘却了。我們不能夠相信我們的親戚還記着我們，因爲連我們也把他們忘記了。要說追隨我們的理想却並不認識我們個人的另一代人心裏還記着我

●英國著作家狄福（D. Defoe, 1659—1731）的小說魯濱孫漂流記中的主人公魯濱孫航海遇險，一

個人漂流在孤島上，過了許多年。

們的名字，這是無法令人相信的。在給人監禁了二十年之後，我們已經失去了對任何人的記憶，連一個名字也沒有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我們被風暴趕出來，被一切的人忘記了……

外面新的一代人已經起來了；

他們記不起我，他們笑着。

是我給了他們的火，

我給他們點燃了太陽，

我自己今天却在黑暗裏，

呻吟，永遠，永遠呻吟。

(巴爾蒙特) ●

肩章

在一九〇二年我們的監獄裏已經是很清靜而且非常安靜的了，可是就在這一年突然間發生了一件事情，我們那些一點一點地爭來的特權本來好像已經變成了一個堅實的結構，現在却像一件破玩具似地打碎了。

三月二日這天我們在傍晚五點鐘光景散步回來，關在各人的監房裏面。過後我聽見每個監房的門帶着大的響聲依次地打開了，這表示有什麼不尋常的搜查舉動了。我的監房的門上也響起了鑰匙的聲音，督察長帶了兩三個憲兵走進來。

「司令官不滿意牢裏的混亂，」他帶了嚴重的表情，聲音低沈地說。「這種混亂的情形應該終止了，從今天起獄規應當嚴格地遵守，」他說完了，正要走出去。

「究竟出了什麼毛病？究竟是什麼一種混亂呢？」我問道。「並沒有誰來責備過我們。」

我一點兒也不明白你這次通告有什麼理由。」

「司令官不滿意。獄規從今天起就得遵守。」他重說了一遍。「上面不許我多講話。」

「是不是監牢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又問他，我知道外面發生了事情照例會使監牢裏採取壓制的手段。

「我不知道。」

「可是這命令是從什麼人那兒來的：從聖彼得堡，還是從地方當局呢？」

「從地方當局，」督察長答道，他轉身向門走去。

「我們不能夠服從獄規，」他離開時我對他說。「他們縛住我們的手腳。他們甚至不讓我們呼吸；我們不得不違犯獄規。你們馬上就得準備好懲戒室。」

「我們會準備的，」督察長靜靜地答道。

在別的監房裏面也發生了這同樣的短短的對話。我們又激動，又憤慨，又驚惶。這個災禍是從哪兒來的呢？監獄裏的情形使人一點兒也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一個災禍。我們和平地過着日子，並沒有煩擾過誰，也沒有誰來煩擾過我們。那麼爲什麼他要來恐嚇我們，說要恢復舊的管理方法，要廢除我們這許多年來一點一滴地從官方手中爭取來的一切小

的改革呢？我們已經在牢裏住了十八年或二十年了，有的人還住得更久。我們在這兒已經倦了，老了。他們似乎應該讓我們休息一下，給我們做點和平的工作。可是他們並不這樣做；他們又想尋事生非，要我們再跟他們發生衝突和鬭爭。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舊的獄規。我們已經不是新來的人了；我們的心境早已改變了。我們的神經完全沒有掩護，遇到任何事情都會止不住要起強烈的反應。那天晚上我們很煩惱不安。有的人激動地在監房裏踱來踱去；另一些人却躺在吊床上動也不動一下；我們不能夠讀書——書拿在手裏會自然地落到地上去。有些人便按照傳統的老方法敲着牆壁跟鄰人們輪流地談話。我們的神經很緊張，就像拉緊了的弦一樣。我們會遭遇到什麼呢？他們因為什麼要實行這種壓制呢？現在我們又感到徬徨不定了。我們又變成梅特林克的那羣盲人。

十點鐘光景，我們的靈敏的耳朵聽見在走廊的另一頭，樓上一個監房的門上小窗打開了，過後又砰的一聲關上了。大約在十分鐘以後我們又聽見了這同樣的響聲，還有人說了兩三句話。第三次又是同樣的情形。樓下的一層忽然起了一陣騷動；隨後樓上那個監房的門被打開了，憲兵們從監房裏拖出來一個重的東西。他們明明是在抬一個人的身子；一

羣憲兵搶着一個人的手腳在拖他出來。我們聽見了一聲沙啞的呻吟。一忽兒的功夫，全監牢的囚人都站到監房門口側耳傾聽。大家都以為有什麼人自殺了，每個人都在叫看守，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個憲兵聽見叫聲，走過來打開了門上的「洞眼」看了一下，可是一句話也不說。

突然響起了司令官的聲音，他叫着：「放開他！」

那麼一定有人上吊了……所有的囚人都用手、腳、布帶等等打着門，一面大聲叫着：「出了什麼事情？」

司令官的聲音回答道：「二十八號犯了獄規。」二十八號就是賽爾該·伊凡諾夫。什麼！一個人要自殺，他們却說是犯獄規！所有監房的門全大聲地響起來。有人大聲地叫「救命！」整個監獄，左右上下都是震得人耳聾的打門聲。監獄騷動起來了。

司令官阿布珂夫的威嚴的響亮的聲音第三次響了起來：「去找醫生來！」
一陣暴怒的瘋狂抓住了我們；監獄變成了瘋人院了。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我們又疲倦，又激動，却照常出去散步。賽爾該·伊凡諾夫的最近的鄰人對我們說明了昨夜的事情。伊凡諾夫討厭督察長常常從他門上的「洞眼」監視

他的行動，他便貼了一張紙在「洞眼」的玻璃上面，不肯扯掉。督察長勸他不要這樣做，也沒有用。伊凡諾夫不肯依從。督察長叫伊凡諾夫到懲戒室去。伊凡諾夫連動也不動一下。於是督察長叫憲兵們給他穿上「緊背心」，縛住他，在司令官說着那幾句類似挖苦的話的時候，他們就把他帶到隔壁一間沒有人住的監房裏去，就把這個監房作為臨時的懲戒室。憲兵們弄他出去的時候，他忽然發了癩症，這是獄醫到了以後斷定的。當時司令官便叫着：「放開他！」而我們却認為有人上吊了。賽爾該·伊凡諾夫失去了知覺地躺在那兒，憲兵們想把他弄醒轉來，然而試了幾次都沒有用，因此司令官不得不嚷着找醫生了。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醫生並沒有馬上來，他來了以後也沒有能夠立刻把伊凡諾夫弄醒。伊凡諾夫暈過去了有四十分鐘的光景。

我們懷着悲憤的心情聽完了這個故事。我們能夠做什麼呢？像這樣的情形在明天，後天都可以再發生的——我們實在忍受不了。我們既無體力，也無精神力量來忍受它們。我們應當抵抗，可是我們應該怎樣地抵抗呢？要白白地放過這件事一點也不抗議，這是我們想也沒有想到的。我們可以被他們壓倒，悶死——但我們必須行動，就是要付出任何的代價也得行動。一個苦痛的日子過去了。每個人都在苦苦地思索着一個問題：還要發生什麼

事呢？我們要怎樣辦呢？到了傍晚我想着寫一封短信給我的母親，這封信的內容要使得警察總署絕對不肯把信交到我母親那兒。不過他們一定會關心要塞裏最近發生的事，並且他們不會不派人來考察這件事情。

我寫着：

「親愛的小母親：我正要給你寫回信，可是牢裏發生了一件事情，把一切都弄亂了。去請求內務大臣或警察總署署長馬上派人來調查詳情。」

你的薇娜 一九〇二年，三月三日。」

我把這信的內容告訴了幾個跟我最接近的同志，這天傍晚我便把信交給督察長了。『他們不會把你的信送到署裏去的，』莫洛左夫說。別的人也懷疑。只有我一個人相信着他們會把這信送去。

在第二天早晨大多數的人都待在監房裏，只有兩三個人出去散步，我也是出去了。他們把我帶到第六號天井裏去，那地方一向是被看作我自己的。隔壁那個第五號天井裏

也有人在散步，那是帕立瓦諾夫。我們的四周非常靜，聽不見一點人聲。我們愁煩地站在格子籬笆前面，小聲地談話。一個憲兵站在守望塔裏注意地聽着。

「這樁事情倒值得用薇娜·沙蘇麗奇的抗議對付，」我提高聲音說。「這個抗議是值得犧牲一個人的性命的。」我又接着說下去：「死並不可怕，可怕的只是跟所有的人隔離。要是他們把我關在老監裏面，永遠關下去，怎麼辦呢？單獨……單獨跟憲兵們在一塊兒……沒有書唸……那比死還可怕。我們不能夠再過我們在最初幾年裏面過的那種日子。我們的生活力不再是從前那樣的了。我一定會發狂……瘋狂，瘋狂——使我害怕的就是這個。」然而薇娜·沙蘇麗奇的面影始終在我的眼前徘徊着。

我對帕立瓦諾夫談起我交給督察長的那封信的內容。他用他那雙瞪羚眼似的悲哀的大眼睛望着我。

「要是你的信他們不送出去，又怎麼辦呢？」他問道。

● 俄國少女沙蘇麗奇 (V. Zassulich) 因聖彼得堡警察總監特別頗夫視察監獄，鞭打政治犯，特地從南俄趕到聖彼得堡，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以遞呈文為托辭，她見到了特別頗夫，向他開槍。特別頗夫

夫受傷未死。

然而我想都沒有想到這一層。

「那是不可能的。」我氣惱地叫起來。「督察長不敢扣留我的信；他不敢不把信送到聖彼得堡去。我連想都不願意想到會有那種可能性，我也不願意談它。」

帕立瓦諾夫走開了，我還留在那兒。我不能夠離開新鮮空氣，它使我陶醉了，現在比任何時候都使我覺得我需要它，可是我不久就應該放棄它了。我的同志們都放棄了散步的權利，這時候我還能夠一個人再去散步嗎？我們現在應當過多久沒有新鮮空氣的日子呢？一個月，或者更久一點，也許永遠吧？

當我最後打定了主意，帶着積雪的田野、潔白的雪花的淒涼的詩意，回到我的監房的時候，督察長跟着就走了進來，對我說：「你的信不能夠送出去。另外寫一封。」

「爲什麼呢？」我生氣地問道。「你必須送出去。檢查是警察總署的事，並不是你們的事。」

「在你的信裏面你只可以講你自己的事。獄規是那樣的。」

「我知道獄規。你把信送出去。」

「按照獄規，我不能夠讓它送出去；我會把條例拿給你看的。」說完他就出去了。

我非常相信自己是對的，因此我認爲我一定會得着勝利，我安靜地繼續脫我的外套。督察長又回來了，手裏拿着政府法規，翻到有關於一段對我讀出來。我提高聲音命令般地說：「夠了！我知道——所有的信都得送到警察總署去；至於應當扣留或者應當送出，那是他們的事。」

「不要嚷，」督察長抗議地說。「我客氣，你也應當客氣。」

「你扼住我們的頸子，可是你却要我們對你客氣，」我氣憤地說。「你把我的信送出去！」

「請你不要嚷，你另外寫一封信吧；我會給你送出去的。」

「我不寫！」

「那麼我們就要取消你寫信的特權了。」

只有在這時候我才明白情形的嚴重了。我得動作。我必需立刻，就在這一分鐘，定下決心，然而我還不會決定，我也沒有想到這種時候居然會來了。我得爭取一點時間來鎮定自己，恢復心境的平和，然後……我自然地拖長了爭論的時間，我帶着鄭重的口氣問道：「你怎麼能夠取消我通信的權利呢？我並沒有犯什麼錯過。」

「你不肯把那封信重寫過，因此我們要取消你通信的特權。」

這時候我的思想迅速地流動着：「那封信不會送出去……警察總署不會知道。獄規要被強迫遵守。舊的管理方法要恢復了——我們會受不了。我那些同志——他們會怎麼樣呢？」於是我的思想又轉到我自己身上。「我會受得了那一切的後果嗎？軍法審判和死刑呢，還是寂寞的恐怖，瘋狂和死亡……我不會惋惜嗎？我不會追悔嗎？我會有充分的力量忍受這一切嗎？」我故意放慢聲音，爲了要弄明白督察長並不只是在威嚇我，我問他道：「那麼你要禁止我寫信嗎？」

「不錯，」督察長堅決地答道。

一個思想像電光似地打從我的心上掠過，推開了一切的疑惑：「只有在行動裏你才會知道你的力量。」

我立刻舉起一雙手；我抓住他的肩頭，用盡氣力扯掉他的肩章。肩章向左右兩邊落下來。督察長尖聲叫道：「你在做什麼？」便跑出監房去了。那個驚呆了的看守長爬在地上拾起了肩章。

我想他們馬上要帶我到老監裏去，便連忙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同志們。整個監獄都騷

動起來了。可是我要求他們給我幫個忙。我需要絕對的自制。我要做到完全的自制，必須請他們保持着安靜。他們不能夠做一點事情——所有的事都已經做過了。『我只要求一件事：讓我安靜。』

四周靜下來了。是一片鬱悶的靜寂。每個人的靈魂給深深地震搖了，驚恐抓住了所有的囚人。徬徨不定的感覺緊捏着我們的心。從走廊的另一頭時時傳來帕坡夫的可怕的叫聲：『薇娜怎樣了？』他是在問着：我是不是已經給人帶到老監去了。這不是叫聲，這是一種獸的怒嘯。它擾亂了我的心，快把我弄到發狂了。

死的威脅

三天過去了。他們並沒有把我帶走。監獄顯得死氣沈沈的，使人想起從前它還在沙科羅夫的鐵腕下面的情形。

最後那個担任在窗口守望的安托諾夫告訴我們說軍法官已經到了，並且在辦公室裏把憲兵們個別地審問過了。

過後這一行人便到我們這兒來。

司令官、督察長和好些憲兵陪着一個身材很高、面貌聰明而帶嚴肅表情的年青人走進了我的監房。

「我們可以給您幫點忙嗎？」他問我道。

我在前幾天就仔細地想過了：我在審問的時候應當抱着怎樣的態度。我害怕他們會

設法把這事情弄成純粹個人性質的事件，解釋作因停止通信而引起的激動以致發生衝突，他們會設法來掩飾這事情。然而我却要盡力避免一切會使我那行爲的判決減輕的機會；現在應當不談我已經在監牢裏度過了二十年長歲月的，一切個人的動機都得撇開，這事情應該被看作整個監獄的有意的抗議。

我便對他敘說三月二日那天的傍晚和夜間的實在情形，我說到督察長的巡視，說起他並不對我們說明理由就宣佈從現在起要嚴格地應用舊的獄規；我又描寫我們的驚惶，以及我們怎樣耽心因爲以前沒有遵守獄規現在會得到報復；我再說，在那天夜裏憲兵們並不回答我們的問話，突然把某人拖了出來，使得我們大家非常激動，過後我們聽見了那個同志的喘氣咳嗽聲，又聽見司令官的激動的命令：「放開他！」……「找醫生來！」

我又說起那封信，督察長並沒有權力扣留我的信。不管我那信的內容是什麼，他都應當原封送到警察總署去，警察總署負着檢查它的責任，並且我很清楚我那封信並沒有給送到警察總署，只是在牢裏讀過就算了。

「大概是督察長對您的行爲粗暴，因此引起了您這個舉動吧？」檢查官問我道。

「不，他並不粗暴。他通常對我們還溫和，並不是他，倒是我提高了聲音講話。」

「那麼也許是督察長對您說明他們要取消您的通信的特權，使您不高興發脾氣吧？」

「不。我已經不再關心通信的事情了。要是他們在頭幾年就讓我有通信的權利，那麼對我會是一個大的幸福。可是現在，在這麼多年以後，通信只給我帶來痛苦。」

「那麼您是要把這件事情公開嗎？」

「是的，」我答道。

我愈說下去，問話人的臉色愈是溫和和可親。後來他鞠了一個躬，說聲「再見，」就走出監房了。

過後他就到帕坡夫那兒去。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對我們採取那種報復手段的原因。前些時候帕坡夫曾設法想經過一個年青憲兵的手偷偷送一封信出去。這封信是給他母親的，信裏並沒有違礙的話。我們中間只有賽爾該·伊凡諾夫知道這件事情。

那個憲兵是一個臉頰紅紅的年青人，我們出去散步的時候，就由他來打掃監房。有幾次帕坡夫居然找到機會單獨跟他在一塊兒待一兩分鐘。那個年青人每次都對他表示同情，並且說早就願意給他盡一點力；只是耽心會被發覺受到懲罰，所以至今不敢說出來。要

是他早知道，自己接觸的是「政治犯」，事情就兩樣了。

帕坡夫決定利用這個朋友的一番好意，便把寫好的一封信交給他，請他代投到郵筒裏去。可是就在這一天裏信落到司令官的手裏去了，那個憲兵並沒有出賣帕坡夫，却是他的愚蠢誤了事。

那以後發生的一切事情現在倒是容易明白了……

於是開始了徬徨不安的日子。這種對於我們以後的命運的徬徨不安網似地將我們緊緊包圍住。誰都不肯離開自己的監房。我們想出了種種的假設。

事情並沒有決定。我們的假設顯然都是沒有根據的。司令官阿布穴夫要我們把我們使用的銳利的器具全交出去。他還說他在一個星期內就要離開我們，督察長也要走。因此我們知道監獄裏人事上的大變動就要實行了。這就表示我們的事情順利，會得着完滿的結果。

在三月的末尾安托諾夫告訴我們說新的司令官到了。果然他不久就來看我們。這是一個熟人，軍官雅科夫列夫，從前我們關在彼得保羅要塞裏面，接見家屬時，就是由他在旁邊監視着的，他曾經押送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到絞刑台，他又是沙科羅夫在亞歷克賽

半月堡服務中時的同事。

他交了一份文件給我們，這裏面並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從這文件看來，他們好像要多多少少限制一點我們的自由，取消一點我們的權利，並且還要處罰我們。然而事實上重要的措施只是：夜裏監房得點着燈，不准我們房裏有一件玻璃製的東西。

他們取消了帕坡夫的結伴散步的權利，期限是一個月；對我却沒有取報復手段，只是從前那個不許我通信的命令仍然有效。

同志們很高興，他們認為事情就是這樣地結束了。

第二天我們又出去散步了。我也走進了我一個月前在那兒散步的「籠子」。可是我這時的心情是怎樣的呢？在過去四個星期裏面我已經體驗了那麼多的事情，這種體驗是很痛苦的，很銳敏的。我一個人關在監房裏面，抱定了決心要正面地跟這個命運對抗；或是死亡或是永遠單獨地關在某一處暗炮台裏面。應當使自己心硬如石，甚至就變成一塊石頭。此外我什麼都不想。我也沒有想到同志們的同情。主要的是，不要讓我那班同志和我自己給軟弱征服——凡是一切可能引起動搖和軟弱的，都得盡力壓住。

在我入獄以後最後幾年中間折磨我最厲害的那些可怖的夢，現在又來了，不過換了

另外的方式：我不斷地夢見監牢裏的騷動和鬪爭。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帕坡夫把督察長打了一下。帕坡夫跟憲兵中間發生了一場厲害的格鬪，他們打了他；然後又是麥秀根的情形，一八八四年聖誕節那天的情景又在我的眼前重現了：這是晚上七點鐘，傢具翻倒的響聲，嘈雜的人聲，腳步聲，和一個人的哀叫：「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殺了我吧，只是不要打我！」

不然我就夢見魯加雪維奇站在我面前，那個可愛的，溫柔的，身材魁梧，却有着純淨，清明的兒童眼睛的魯加雪維奇。他寫過一封關切的信給我，信裏充滿了敬愛和忠誠的友情。現在在夢中我却看見這個溫和的人爲着我的緣故發動了激烈的抗議。他暴怒地撲到他的對手的身上去；一羣憲兵把他推倒在地上，用腳踢這個漂亮，強壯的人。我恐怖地醒了過來。彷彿有一根鋒利的針刺進我的喉嚨裏似的。我覺得呼吸困難，賽爾該·伊凡諾夫的頸部痠疼現在讓我也得到了。●

再不然我就夢見我死了；沈重的墓碑壓在我的胸上，石頭的寒氣從我的四周襲來。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我的器官逐漸在死去，我的內部慢慢在麻痺。最後我帶着一聲痛苦的

● 許多年以後只要我受到較大的驚恐刺激，這種頸部經絡馬上就會發作，它好像是我在牢裏經歷過的

大約恐怖刺激的一個遺留物——原註。

驚呼醒了過來，眼淚像泉水一樣不停地從我的眼睛裏流出……就是這些苦悶的白天和痛苦的黑夜；以後又是這些痛苦的黑夜。

在我恢復散步的第一天，魯加雪維奇就在我隔壁的「籠子」裏散步。我並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但事實確是這樣，我希望最先看見的同志就是他。他是單獨在那兒。要是遇到兩個人倒更困難了。我簡直講不出一句話來；我的聲音又變成尖銳而微弱的了，就跟我現在最苦悶的時期中有的那種聲音完全一樣。只有短短的幾句話很艱難地從我的嘴唇裏吐了出來。

我默默地在籬邊我臨時安排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我們兩人都不作聲。

我在這些日子裏就一直等待着軍法裁判，我覺得死亡就面對面地站在我跟前。我一直在等着它，準備着去迎接它。因爲我得事先準備好，不要到了那個時候胆怯。這四個星期的等死在我的身心兩方面只能引起毀壞的作用。

可是我也感到了大的快樂；我暗自慶幸我居然找到了發動這一個強硬抗議的力量。在我看來與其永久關在地牢裏，還不如死在絞刑台上。死在監牢裏……白白地老死，這不是可怕的事嗎？

要是有人堅決相信嚴格的監禁有助於自由思想，那麼這也只是一種消極的、無力的情形。一種怎樣的固定不變，怎樣的麻木僵硬！人身上最好的品質都深深隱藏起來，不肯顯露了；它似乎躲藏着，被窒息着，就像已經消失了一般。於是疑惑來了，懷疑自己，同時也懷疑同志們，人類的種種優良品質都已失去，只剩下小小的一堆東西，例如崇高、美，以及對於偉大性的感受如今都不見了。愛和熱誠並不會得着培養，也沒有一條出路，現在被人連根截斷了。而生活，這種痛苦憂鬱的生活仍舊沒有終結地慢慢拖下去……一直拖到死在監牢裏吊床上為止。不，我寧肯死在絞刑台上！爲着朋友，爲着同志發動抗議，這時候並沒有痛苦……

可是現在怎樣呢？他們又把這個死的可能性給我搶走了！他們逼着我準備去死，折磨了我，宰割了我，然後却又讓我活着……

現在再回到生活裏來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日子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了。一切似乎已經定局了。獄規也不再應用了。

有一天在我們中間傳遍了一個消息：憲兵們搬了好些木條和木板到老監的院子裏去；他們正在那裏建築什麼。忽然間一個消息傳來：佛洛林柯從窗戶裏看見憲兵們抬了一

部分絞刑台的架子進來。整個監獄都給驚動了。安托諾夫說：『我們得向薇娜告別了。』

在監獄的暗霧中一切都帶着一個誇張的、走了樣的形狀；生活裏充滿了幽靈——我們的生活便是獨一無二的幽靈。現在又是彷徨不安了；我們又成了『一羣盲人』沒有一個嚮導，閉着眼睛，伸出雙手，飄流着，摸索着，每走一步，我們的腳都會踏進一個深淵。

不錯，憲兵們搭了一座絞刑台，沒有人知道這，是爲着誰搭的。不過既然有了一座絞刑台，就得有一個人被處死刑。誰要被處死呢？這絞刑台是爲着誰搭的呢？這種彷徨不安的情形一直到五月四日的黎明才算是消滅了。

絞 刑

五月三日早晨七點鐘過後不久，我的鄰人安托諾夫給了我一個警戒的信號：「你看！」我連忙跑到窗前。一羣穿軍服的人從監獄的大門口走進來，他們揆得緊緊的，在他們中間走着一個穿羊皮短上衣的人。●我們明白了。一個囚人給帶進要塞裏來了。

我同時起了兩種感情：悲哀和快樂的期待。我悲惜一個年青的生命現在被他們埋在我們這個共同的墳墓裏面；我感到近於喜悅的興奮，因為一股新鮮空氣，一股從那個在獄牆外面進行着的戰鬪中傳來的空氣就要吹到我們身邊來了。雖是這麼說，然而為着那個陌生人的痛苦還是要比為着我自己的快樂來得強些。不過這個囚人並沒有帶到我們的牢裏來；他們把他引到要塞的院子裏那個辦公室去了。

● 這是司節濟·巴爾馬雪夫，他因刺殺內務大臣西比雅金被處死刑。

我們吃過午飯以後安托諾夫嚴肅地說：「院子裏有一個牧師……」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不明白，便問道。

「要執行死刑了，」安托諾夫憂鬱地解釋道。

自從一八八四年以來在衛城的大院子裏已經不止一次地執行過死刑了；密拉科夫和麥秀根死在這兒，隨後又是斯特龍堡和洛加切夫，在一八八七年魯加雪維奇和諾瓦魯斯基的案子中有五個人在這兒被處死刑。然而這些死刑都是祕密執行的。他們祕密地進行這個工作，不讓我們看見或者聽見什麼。

不透明的玻璃窗，厚的牆壁，絕早的時刻，趁大家都在睡眠的時候，使人完全想不到在近旁發生了一樁不尋常的事情。

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玻璃窗是透明的；我們看見有人被帶進要塞裏來，他們要把他帶到監牢的院子裏去，一定要經過我們的窗下；我們應當看見他的。

等待一次死刑的執行，這感覺是多麼可怕！這是對於另一個人的逐漸逼近的，完全確定了的死期之一種肉體的預感。……他是早晨七點鐘光景帶進來的，他現在沒有二十四點鐘可活了。……現在只剩下二十點鐘，現在是十五點鐘，現在是八點鐘……五點鐘。每過

一點鐘，生命的線又縮短了一些，就像一根伸縮自如的帶子在我們的眼前伸開，又漸漸地縮短，變成了一根不停地在縮短的東西。鐘點過去了，可是分和秒却好像停住不動了一樣；它們是那麼沈重，那麼難移動，這些分鐘是太長，太緊張了。

看守長輕輕溜過監牢的窗下，手裏拿着一根繩子，他把身子緊緊靠住牆，怕被人看見。一個憲兵跟在他後面，也偷偷地走過去了，他衣襟下面藏着一把鋸子和一柄斧頭。從遠處送來了絞刑台搭成時最後的一些響聲。「他」一定會由他們帶着在黑夜裏走過我們的窗下，不過我們都不肯睡覺，我們至少可以用我們的眼光伴送「他」。

然而我們大家的警醒還敵不過憲兵們的聰明：我們中間並沒有一個人看見在黑夜裏那個定罪的人怎樣並且什麼時候被他們押出去了。

五月四日三點鐘，天剛發亮。在要塞的院子裏白色的建築是看得見了；一排軍官們的住宅，前面有一條寬而光禿的小路，在小路的另一邊是一座白色教堂和一些沒有葉子的黑色樹木，牠們這時候在微光中顯露了出來。這個院子在晨光中顯得荒涼、死寂，晨光給這個陰鬱的地方染上了一層淡黃色。可是看，已經有人影在動了：督察長，他的副手，司令官，衛兵隊長，醫生，牧師，憲兵們一個一個地出現了。他們排成一個單行沿着褐色的小路向監獄

院子的大門的方向走去。一個衣服穿得厚厚的工人模樣的強壯漢子走在另一邊，他好像是一個無賴漢和癡瘋病人似地單獨走着，前後都有一個憲兵——這是劊子手那一羣人走過了我們的窗下，這一個人也過去了，他們都在衛城的大門裏面消失了。在這黎明的黃色的微光中，一切又成了荒涼、死寂。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慢慢捱過去——這是一個人的生命中最後的四十分鐘了。

穿着黑衣服的牧師的寂寞的影子又出現了，他拖着緩慢的、疲乏的腳步走來，他的背大概被他所看見的一切壓駝了，他愁煩地落坐在教堂旁邊的一隻長凳上。

四周又是一片靜寂和淒涼，在這中間還埋伏着那個逼近的死亡的威脅。

事情已經完了！司令官回來了，隨後是督察長，憲兵，還有一個穿着司法部制服的人。那個衣服穿得厚厚的強壯漢子又出現了，仍然像是一個無賴漢和癡瘋病人的樣子。他們走出我們院子的大門時，裏面有一個人避着劊子手，不願意同他走在一塊兒，這個人佩着司法部的證章，這時便把頭掉向着我們，望着我們的窗戶，他當然會看見了我們那些貼在玻璃上面的蒼白色的臉。他掉過來他那張光滑紅潤的寬臉微笑了——他厚臉地、得意地、挑唆地微笑着。

然而一個憲兵（他的職務逼着他護送官員們到行刑的地方去了的）正要跨過大門的門檻時，忽然抓住自己的胸膛結結巴巴地說「大人，我不能夠……放我去吧！我受不了這個……我不能夠……」

違約

在一九〇二年三月和四月裏那些騷動不安的日子以後，差不多又過去了一年了。這三百天的灰暗的日子已經把那些痛苦的經驗給我們抹掉了。到了一九〇三年正月十三日那天，我平靜地坐在我的監房裏，一點也沒有想到命運邁着沈重的脚步走到我身邊來了。

走廊上響起了脚步声；門門在響，鎖也在響，於是門開了，司令官帶着幾個憲兵走了進來。他演戲似地舉起手提高聲音慢慢地加重語氣地通知我說：「皇帝陛下因你母親的哀求……開恩將你的終身懲役罪減為二十年徒刑。」然後停了片刻他又接下去：「你的刑期到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為止。」

我起初聽到他用莊嚴的調子說出的「皇帝陛下」幾個字時，我想：「這是對於「肩

章事件」的過期的處罰吧。」其實這比我接着聽見的後面的話要好多了。我呆呆地站在那兒，我以為這裏面一定有誤會的地方，因為我母親知道我的思想，她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去要求赦免我。我便發出一句愚蠢的問話：

「這是一個普通的勅命，還是單爲着我一個人呢？」

「單爲着你一個人！」司令官不高興地，短短地回答，他又添說一句：「現在你可以寫信給你家屬了。」

可是我並不想寫信。我生氣，我覺得受了侮辱；我的第一個衝動便是跟母親斷絕一切的關係。跟她斷絕關係，跟她，我所愛的人！跟她斷絕關係，我跟她的分離已經使我受了那麼多的痛苦了！我已經有一年半沒有寫信給她了，不會接到她的信也有一年了。在這時期中間家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我被禁止通信的這一年半的長時間裏面，我母親知道我一些什麼事呢？我還不明白真實的情形，我便勉強鎮靜地答道：「等我的家屬先寫信來吧——我會回答的。」

我懷着痛苦的憤怒把我遭遇不幸的消息用敲壁法通知我的同志們（因為我的恩赦對我是一個不幸的災禍。）這災難是從哪兒來的呢？我的母親，我那個堅決而勇敢的母

親怎麼能夠替我「哀求」恩赦呢？她先後送走了她的兩個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女兒，她都不會流過一滴眼淚，甚至不會表示過一點軟弱，而且當她跟我告別的時候，她不是答應過我不代我要求減刑嗎？我相信她就跟相信我自己一樣，她出了什麼事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什麼事情逼着她違背了她跟我分別時候莊嚴地給我的諾言呢？

母親去要求皇帝開恩，她是違背了我的意志的，我不要誰開恩；我願意跟我那班民意社的同志們一塊兒忍受艱苦，支持到底。現在母親不先問我，不讓我知道，也不徵求我的同意，她就毀壞我的生活。難道還有更大的侮辱嗎？她怎麼能夠這樣做呢？她素來尊重別人的信仰和別人的個性，而且她還教我也尊重這些，那麼她怎麼能夠做呢？這麼粗暴地，這麼專斷地毀壞別人的生活！摧毀別人的意志！皇帝的特赦使我蒙受恥辱。是誰使我受辱的呢？我的母親，我親愛的，我非常尊敬的母親……她使我受了辱，可是她也叫她自己受辱。同志們安慰地對我說：「這不是你的錯！」我聽見這句話，心裏多難過啊！

這個痛苦的思想不斷地苦惱着我：我母親究竟會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她那顆母親的心爲什麼忽然變軟了？難道她以爲在十八年前判了罪的我現在還得再判一次罪嗎？難道她以爲他們在十八年前判了我死刑，現在還要再判我一次死刑嗎？好像她真正是這樣想

的——所以她變軟弱了。是不是她因了我們長久的分別和對我的命運的疚心而變得軟弱了？是不是她忍受不下去，而且忘了我們分別時她給我的諾言呢？

在監牢裏的孤寂中毫無頭緒地胡思亂想，這實在是難堪的痛苦。我不得不以為，她對自己不忠實，她出賣了自己，而我又是在遠處看不見，不能夠對她叫聲「止住！」我不能夠攔住她那隻哀求恩赦的手。

三天以後解釋來了。這是母親的一封信，一封告別的信：她快要死了，她已經病了三個月；她開過了兩次刀（我的妹妹們附筆說，是割治癌症。）我會經氣得那麼厲害；我會經準備跟我這個世間最親愛的人斷絕關係，——我不知道她已經站在死亡的門檻上了！我能夠做什麼呢？難道一個女兒還能夠對她那個患病垂危的母親說些責備抱怨的話嗎？我得回答她，我的回信也許就是她活着見到的最後的一封信了。

我的殘忍的心軟化而謙卑了。在我的記憶中抱怨和責備全消失了，代替它們的是我所做過的一切對不起我母親的事情，和她對我的的一切的好處。我記起了我的童年，她在什麼時候就建立了我的人格的根基；在我被捕以前的恐怖的時期中她又給了我以道德的支持；我在監牢裏候審的時候我們難得有的一次的會面使我得着莫大的快樂，在那些關係

生死的審判的日子裏我們的會見又給了我無限的安慰。我記起了一切。她給了我的真是太多，太多了。而我呢，我又給了她什麼呢？起初是我的早婚使我跟她分離了，隨後就是革命的活動與這活動的結果分開了我們，我究竟給了她什麼呢？就只有哀愁，而且是那麼多的哀愁！冷淡，自私，這是年青人對待父母常有的態度；缺乏了解，偶爾說一兩句辛辣的話，露一下不愉快的微笑，或者由於我那年青人的自負而來的小小的責備……我全記起來了，並且這些醒了轉來的記憶使我痛苦。在這一生中我所給她的除去哀愁外，什麼也沒有，真是一點也沒有。現在結算的日子來了，我所能做的只是懷着悔恨的心記住她對我所做過的一切，跪下來；跪着用我的眼淚洗那一雙親愛的手，求她寬恕我……我的確在懇求她的寬恕了！在她的回信中來了這一句我永不能忘記的話：『母親的心是記不得任何悲痛的。』

生活的恐懼

那麼我就得在二十個月裏面離開席呂塞爾堡了。從被捕到出獄我一共在監牢中度過二十二年的長歲月。我還有二十個月的時間讓我思索，讓我想到將來。在我的面前發生了一個倫理的問題，這問題廣大得就像一個無邊無際的平原。命運給了我一個難得的機會，一個第二次的生活，不過我進到這個生活裏面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知識和經驗的嬰兒，也不是一個前面有着種種的生活的可能性的小孩；更不是一個後面不會留下什麼前途却有着萬事萬物的青年。我有過一個長的、複雜的「過去」；我的肩頭壓了一副重担；一條短的燒紅的革命鬪爭的路，然後是一條長的使血凍結了的監禁的路。我現在得挑着這樣一副担子重新走進生活裏去。我已經五十歲了，也許還要再活二十年。我拿它們來做什麼呢？我用什麼來填滿它們呢？我用什麼來開導它們，照亮它們呢？想着這些問題是

很苦痛的、可怕的，然而我的內心的聲音却不分晝夜地反復唸着它們。沒有人能夠幫忙我解決這些問題；書也不能夠，同志也不能，朋友也不能。它們必須由我自己來解決，我一個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聽見。我的前面就是生活，可是在我四周却沒有堅實的土地；在過去二十年中間我每踏一步，土地就從我的脚下退去，原先是土地的地方，這時却變成了一片空虛。最近二十幾年中間生活是朝着什麼方向走的？在這些年裏面死了些什麼，壓下了些什麼？什麼給排斥了，什麼給毀掉了？什麼又生了芽，長起枝，發育起來，或者偶爾還成熟了呢？究竟是什麼呢？

我的處境就像一個必須游泳而自己却不會游泳的人；又像是一個人：在過去有一個時候是會游泳的，可是已經忘記了，現在却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辦了。在這個人的前面和四周都是汪洋大海，而且海水慢慢地浸蝕着他站立的一塊小地方。不管他會不會游泳，他却必須游泳。要是他還有時間的話，他會趁着這時候考慮一下他應當怎樣並且用什麼方法去游泳。他考慮身體的動作，他應當怎樣運用手脚，朝什麼方向游去，大陸在哪兒，以及他的氣力究竟有多大？他害怕自己，並且也懷疑自己，他又害怕海會起大浪，遲疑着：他應當做什麼，他應當怎樣辦？沒有人能夠幫忙他，給他貢獻意見，告訴他，應當怎樣提防免得落在水

裏。

現在在我的面前也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出了監獄以後我會遇着些什麼事情，我以後應當怎樣生活……

在那時候，他們讓我們讀着契訶夫●的全部著作。他已經死了，所以他們把他的書拿給我們讀，可是在他活着的時候，他的書是不許讀的。我開始讀他的書，我貪婪地一本一本地讀下去，到後來我悲痛地對自己說：「不，我不能夠再讀一個字了。」我這樣地站在一個第二次的生活的門檻上，却看見一大羣意志薄弱甚或缺乏意志的人，失敗者和憂鬱病患者接連不斷地走過我的面前。一頁接着一頁，契訶夫的作品中所描寫的都是些不和諧的生活的場面，以及人們不能過正常生活的可悲的情形。「三姊妹」●沒有目的地在生活，中徬徨，希望搬到莫斯科去就會得着救星。然而事實上一個人有腐蝕心靈的憂鬱或者創造生活的愉快精神都是他自己的內部裏面；那些「姊妹」在莫斯科也會毫無結果地憔悴下去，就跟她們在外省時完全一樣。

● A. Chekhov (1860—1904) 俄國小說家和劇作家。

● 這是契訶夫的一個劇本，主角是三個姊妹。

我知道有些人，他們並不積極地工作去改善生活，他們並不爲着這個目標奮鬥，他們却在躺椅上坐下來，一面說：『我們來討論一下兩百年以後會發生些什麼事情！』他們沒有播種，可是他們却要收穫，他們夢想着這收穫，好像並不要靠他們自己和大家的努力，這收穫就會自己來的……這種消極的『爲人類追求一個快樂、幸福、美滿的生活』的夢想便是在他們整個生存的黑暗中閃耀着的唯一的火花了。

難道我們的現在這一代人能夠是這樣的嗎？難道生活真的是這麼無聊，不活動，死一般的嗎？倘使真是這樣的話，那麼走出這兒到生活裏去，又有什麼好處呢？倘使生活就是這樣的話，那麼在牢裏憔悴和在牢外憔悴又有什麼分別呢？人不過從要塞的牆後面走出來發覺自己是在一個更大的監牢裏罷了。要是這樣，還用得着出來嗎？爲什麼要拿確定的沈悶無聊去換來不確定的沈悶無聊呢？不錯，在一九〇一年我們這兒來了一個送好消息的信差——卡爾帕維奇。不錯，他是勇氣的化身，他給我們保證：我們的母國正在經過一個重要的『前夜』時期。他說，全俄國都充滿了爲着爭取自由，爲着根據新的主義改造生活的年青而奔放的熱情。一切都在騷動，沸騰，不安靜。他對我們講起了城市無產階級的覺醒，他們階級意識的成長，以及他們在政治舞台上面的現身；又講起那些覺悟了的大學青年怎

樣叫出了爭取權利與自由的勇敢的口號。他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了西部份的匠人的組織作爲例子。看來好像有一種新的精神在俄羅斯平原的上空飛翔，而當初我們進監獄時，俄羅斯平原却是十分沈寂，沒有定形，而且受着壓制的。二十年過去了，俄羅斯現在却像一口大鍋，裏面裝滿了煮沸的濃濃的液體，滿到鍋邊了；它已經開始在起泡了，一股股的熱汽正從鍋底升到面上來。不久，不久整個鍋裏的東西就要動起來並且要沸騰了。

我沈思着。卡爾帕維奇對我們講的果真是事實的正確估計嗎？難道他沒有把現時的革命活動估計得過高嗎？卡爾帕維奇，那個送信人，他到我們監獄裏來用活的水給我們的水給我們的死了的靈魂施洗禮，難道他沒有生活在一個抱着過高的、熱烈的希望的特殊圈子裏面嗎？也許這個圈子就是在全國的蓋着冰的表面上一股小小的熔岩的熱流吧？農民在哪兒呢？那八千五百萬的農民在哪兒呢？那些落後的鄉村地方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契訶夫現在就是這種沈悶無聊的外省生活的描繪者。卡爾帕維奇却畫出了革命運動和工業中心的生活，在這些工業的中心生命的脈搏，知識階級和城市工人的脈搏，跳得非常厲害。他只畫出他們的普通的面貌。而契訶夫却繪出了一大堆人，並且是活的、有人性的個人，這些個人都是從極深處，從俄國的主要地層掘發出來的。就是這種平常人，這種普通的俄國典型人。

物，他們在日常生活的醜醜雪水中間，却在輪椅上坐了下來，去『談兩百年以後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我倒願意不住在契訶夫所描寫的未墾地上，跟它那些醫生、農業家和愛說教的教授們一塊兒生活，却寧願住在一個真正的、毫無希望的洞子裏。我會被他們送到薩加隣島去，或者送到雅庫次克省去，因為以前凡是服滿刑期離開席呂塞爾堡的人都會給送到那邊去的。我得住在那個可詛咒的島上，（在那兒虐待、凌辱、甚至笞刑等等都是天天有的事情，）生活在一羣法外之人、罪囚的中間。在那個島上一方面是兇殘嚴厲、無法無天的行政措施，另一方面是因了貪慾、謀殺、搶劫以及各種強暴行為被社會逐出的人們，要我在那地方生活實在是件可怕的事……或者他們會把我送到北極圈附近積雪的荒原裏去，住在一個雅苦特人的遊牧村子裏，在那兒只有寥寥幾所雅苦特人的小屋，並且除了那些未開化的土人外再也找不到一個可與談話的人。

在這樣的一種生存裏還有什麼意義呢？爲着這樣一種生活就值得離開席呂塞爾堡嗎？我怎麼能夠在這些獄牆外面生活呢？靠着什麼生活？而且爲着什麼？

母親

這一類的思想正噬着我的腦子的時候，我的母親去世了。我的妹妹們已經得到了許可，每隔三四個星期給我送來短短的消息報告母親的病狀。一直到她的死期爲止，（她死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整整有十個月裏面，我都是生活在一種可怕的神經緊張中。來的消息常常是衝突的：她的病一時好了一點，接着又加重了，這消息使我感到說不出的焦心和痛苦。我一直想念着垂危的病人，我的妹妹們相信從聖彼得堡來的消息會使我心安，其實却相反，這消息却只有增加我的不安和痛苦。

我覺得好像有一根祕密的帶子把席呂塞爾堡中我的監房跟聖彼得堡的我母親的病房連接在一塊兒；要是我一時高興起來，我就寬慰地想到，母親的病有起色了；要是我感到非常的不安，我便相信我母親病到臨危了。

她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永閉了眼睛。那些照管我的憲兵們不願意叫我受到刺戟（據督察長後來向我解釋，）沒有把妹妹們報告母親死訊的那封信交給我，却讓督察長口頭告訴了我母親病故的消息，這樣他好一件一件地把所有的事全講了出來，他並且對我說，我母親要葬在聖彼得堡。

我知道聖彼得堡對我母親永遠是陌生的地方，除了她兒女的教育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作為她跟這首都中間的聯繫了。她所愛的，所寶貴的倒是加善省的尼基佛洛渥村，我們的「老屋」在那兒，並且那地方的一切景物都使人記憶起她的童年和我們的兒時，以及我們共同生活裏的種種悲歡。她願意安睡在那兒，在我父親和我們的保姆的旁邊……

我還會看見她嗎？……不，我不會看到她……不會看到……不……我會看到……這就是我在那十個月裏面不間斷地想着的問題，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活到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獄的那一天。現在我用不着再耽心了。母親等不到我的釋放了，她再也看不到我了。

也許這樣倒反而好一點：否則她會看見我變得像當初我們分別時她那樣地老了。並且她也不會再是我在一八八四年最後一次擁抱她的時候的那種樣子；我見到的會是另

外一個人，一個完全變了樣子的人，二十年的長期等待和那可怕的疾病一定把她磨得不一樣了。

緊張突然間鬆了下來；我是整個地破碎了，我落在這樣一種心境裏：我不想看，不想聽，也不想說；我再沒有一句話了，只有無窮無盡的身體的虛弱，和極端的心靈的癡癩……

十二月這樣地過去了，一月也過去了，來到了三月。

這年三月，聖彼得堡的天氣是往年少有的。天天晴朗，太陽晒得特別熱。我整天躺在那班照料我的同志照原始人的方法給我做的躺椅上。沒有人來打擾我；在無雲的春日天空的下面，我的周圍非常安靜。太陽向各處放散牠的炎熱的光，疲勞衰弱的身體和心靈在微睡了。

二月裏我收到了去年十一月他們扣下的我妹妹們的來信。她們寫着全家伴着母親的遺體回到了尼基佛洛渥，把她安葬在那兒，這是遵守她的遺命做的。三月九日我給她們寫了回信：

「我親愛的！我現在不想跟你們談我們母親的事，也不想談我自己的心境。我爲

什麼要來苦惱你們呢？至於我的心境，我可以用兩個詞兒來形容：悲痛和疲乏。悲痛，因為這二十一年來她一直是我的感情的中心，疲乏，因為整整一年裏面我一直懷着驚惶、不安和恐懼站立在她那未封閉的墓前。我想到是你們大家一塊兒伴送她到她的永久安息地，想到她並不睡在寒冷、生疏的聖彼得堡，却葬在她生前那麼喜歡的尼基佛洛渥，那地方原是我們大家素來就熱愛的，現在它對我們是更接近、更親愛了。我常常想一個人要是有一個跟自己兒時的回憶相聯的特別喜愛的地方，那是多麼幸福的事；在那個地方我第一次學到愛天空和田野的廣闊；在那個地方發生了我們家庭中種種大小事情，並且我們親愛的死者也就安睡在那兒。

『我常常想起你們，我常常想像着你們回到尼基佛洛渥的旅行，我這樣一想，眼淚就淌了出來。也許你們護送母親回家的那一夜，就是我做了一個使我非常感動的夢的那夜晚。我夢見我們四姊妹坐在一輛雪車裏面，路上沒有一點雪，而且非常黑，我們的雪車經過一個村子，時而上山時而下山地跑着。我們走過一排排漂亮的農家房屋，到處都是爲着步行者造的微斜的石級，長着無葉樹的廣場，和蓋着金黃色屋頂的涼亭。在這村子的中心，在一座小山上，聳立着一座白石的教堂，這教堂有着不少優美

的金色圓頂。當我仰起頭朝上看的時候，我看見從天空懸垂下來一個水晶的華蓋罩住了教堂和整個山，這華蓋美得叫我驚奇，而且它使我想到了北極光。我們離開這村子時，看見前面是一片無邊無際的綠油油的田野，上面藍天裏照耀着一輪火熱的太陽。因了某種緣故，這使我想起了我以前見過的一幅圖畫：一羣進香者徒步走着；在他們的前頭遠遠地現出了一座城市的輪廓，這好像是掛在雲裏似的，畫上面題着一句：「歡迎你們找尋主的城市的人！」我醒過來時，有着一種非常興奮的心境。現在，我在二月十一日接到你們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寄來的信函，讀到你們怎樣護送母親的遺體回到尼基佛洛渥去時，我發覺你們的描寫跟我的十一月裏的夢境多少相合，我真願意相信在你們護送母親的那一夜我的靈魂也在旁邊伴着你們……」

前 夜

時間不停地過去。我生活中一個大變更的日子，我離開席呂塞爾堡的日子愈來愈近了。

我想到那個時候，我並沒有一點兒快樂。一點兒也沒有，一點兒也沒有！

我問一個應當跟我同時出獄的同志，他是不是感覺到了就要來的自由的氣息，他不是覺得自己站在生活中一個可喜的大轉變的邊界上？

「不，」他回答我說，「我什麼也不覺得，我就像木頭一樣。」

另一個關了二十二年現在也應該出獄的同志對將來也不抱一點希望，他也不感到絲毫的快樂。自由來得太遲了。

我那位隣人兼朋友的不同囚者對我談起廣闊無垠的天空，談起夜晚的星星，談起跟自

然界的接觸以及由這種接觸而得到的快樂。

然而我那時候並沒有想到無垠的天空，也沒有想到星星。我正在思索着生活的目標與意義……當我還不知道怎樣去生活的時候，天空和星星怎麼能引起我的興趣呢？

我還記得在最初的幾年裏面，我多麼渴望着「自由的」天空和它的星星呢！現在連這個渴望也死了。心靈麻痺了，凍僵了，一切對於美，對於活動世界的渴望都消滅了——留下來的一只是一片無限的空虛……

只有一次我起了一下顫慄，這是一種模糊的自由的預感，生命的脈跳。那是在晚上，十點鐘光景。我坐在桌前，臉對着窗；我像往常那樣拿背朝着門，避免碰到從門上「洞眼」望進來的憲兵們的討厭的眼光。這是七月的末尾，離我出獄期只有六十天。在陰暗的監房裏，我明白地感到從外面吹進來的潮濕空氣的新鮮氣息。突然間我聽見了船輪的擊水聲，不多久就響起了一隻小火輪的汽笛。

我打了一下顫。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一次伏爾加河上旅行的回憶。天色陰暗中我站在甲板上，我努力想看出水跟岸分界的地方，却看不出來。只有在很高的地方，一些小屋的窗戶裏射出來的孤寂的燈光，在陰暗中閃爍。山上散佈了很多很多小小的光亮……

咳，這個伏爾加河上的黑夜，我站在小火輪的甲板上！船輪的響聲，汽笛聲……燈光和樹林的聲音……自由……自由的生活……

一陣顫慄通過我的全身……過去的回憶，和對未來的希望與疑懼——伏爾加，小火輪，夜和燈光，以及人們渴望船靠碼頭的心……是的，暢快地呼吸大口的自由的空氣！渴望……

於是一切又回到靜寂裏了，在我心裏，在我四周都是靜靜的。好像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

七月裏我在獄中最後一次收到我妹妹的一封信。我回答她們說：

「這的確是你們的最後的一封信，可是我讀了它，我仍然跟往常一樣，不能不感到悲哀和痛苦……你們說我上次的信很使你們耽心。然而我有什麼辦法呢？要是我不給你們寫信，你們一定會着急起來。又要到官廳去質問了。所以我無論如何總得寫完它。並且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

你們告訴我，母親墳上的碑要做成神龜的形式。我要添一個十字架和一道圍籬。

……可是照我的意見，主要的裝飾物應該是花木。往常在冬天，月光總是照進我的監房裏來，使我常有一種特別的心情，這是我從前在鄉間度夏時的那種愉快的散步的回聲……然而在這一個冬天一切都改變了。月光也特別顯得毫無顧忌地亂闖進來，我總是看見積雪的田野和我們尼基佛洛渥村的墓地：一片冷雪發着寒光，雪風咆哮着，天空中高高地掛着同樣的一輪明月，它就是照進我的監房裏來的那個月亮。我看見那兒一切都是多寂寞，多荒涼，多寒冷，多淒慘……隨後我想起了，要是在這裏地上新種上一些樅樹，那是多麼地好，不論在夏天冬天樅樹都是常綠的。那麼看起來它也不再是那麼淒涼的了，並且這個給綠樹環抱着的小島使得整個地方都顯得好看多了。樅樹又是那麼細長，那麼漂亮，看起來使人的眼睛非常爽快。就是在瘦瘠的土地上它們也會謙虛地長得很茂盛；我以為它們是我們那地方的植物中最美的一種。我們母親在克利斯托弗洛夫加，在那條到涼亭去的路上種了兩排樅樹，這美麗的樅樹蔭道使我自小就愛上樅樹了……

在契訶夫的一篇小說裏，主人公是一個卑鄙無聊的人，作者責備他的最後的一個缺點是他一棵樅樹也不種，一株小花也不栽。我們母親在這方面却佔着很高的地

位：她總是在想法使大地美化，尤其是她住過的地方；她把它裝飾得比她初看到它時美得多了。

你們一定會奇怪，在我生活中這麼一個重大的轉變的前夕，我給你們寫信，竟然沒有關於未來的話。可是我的頭腦裏只有一片空虛，在我身上一種內心的工作完成了，但我不能夠把它具體地寫出來。一個人跟生活的程序完全脫了節，就會讓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抓住。生活變成了謎一樣地難解，而且複雜……人本來也可以正視未來，理解命運，向它索取答覆，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用。問題仍然原封地擺在那裏；一切都給包圍在霧裏，未來的事情一點也沒有給透露出來……

我的外表的生活並沒有一點改變，我仍然像往常那樣地忙着，可是我也漸漸在清理我的事務，把一切逐漸地整理清楚。

「再見，我吻你們大家，大的小的都在我的念中。要來的事終歸是要來的。」

信件的焚燬

離我出獄的日期只有四天了。我坐在我的監獄裏桌子前面對着面前一堆信件，我不能百感交集，我輪流地在哭，笑。

司令官剛纔還對我解說過，凡是我帶走的抄本，都得先送到警察總署給檢查過纔能夠帶去。『關於席呂塞爾堡，不許提到一個字。等到檢查過後會退還給您的。』我也跟着機械地說道：『不許一個字提到席呂塞爾堡。以後退還給您！』

我最後一次翻閱我的舊稿，我動手毀滅那些曾經給過我很多的安慰和快樂的東西。我的手顫抖地燒燬我的同志們的寶貴的字跡，它們也會不只一次地使我感動過，又使我歡欣過。我永遠不會再看見它們了，並且得由我自己一個人來做這種毀滅它們的卑鄙的工作。我把每一張字條重讀了一遍，我始終記着：這是最後一次在讀它們。

這是一大堆東西，有懇切的，有談諧的，有悲痛的。我所經歷過的獄中的歡樂，誤會和解，感謝，以及我們生活中各種值得紀念的時刻，在它們裏面全都反映出來了。這裏是些漂亮的文雅的字跡：樂巴丁的全部文學論文都在這兒。那裏是魯加雪維奇的筆蹟，那個親愛的魯加雪維奇！他是那麼了不得，那麼好——單看他那對深透的孩子般的眼睛。就是放在一千個人的筆蹟中間，我也會認出他的字來。這一幅地質學的圖是他送我的禮物。又有一張他的字條上面還留着一九〇二年三月的日期，它曾經使我非常感動，而且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真的應該把它也燒掉嗎？淚水從我的眼睛裏流出來。那是帕奇托諾夫寫給我的一張字條，當時他還沒有發狂。這一張是——瓦西里·伊凡諾夫的字條，因為他開了一個不適當的玩笑說拿哥夫斯基給人搬走了，我責備他，他寫這字條向我解釋。接着是一張樂巴丁的畫：畫裏一根圓柱，圓柱上面有一隻小老鼠（就是我），下面有一隻獅子（這是樂巴丁自己），還寫上一句格言：我服務，我却不同候人。啊，你這隻驕傲的獅子樂巴丁！又是魯加雪維奇發行字和一隻彩色小鳥的畫。諾瓦魯斯基的詩和字條。帕坡夫的一張英文字條。我讀着，實在不能夠止住笑；他帶着滑稽的筆調叨嘮不休地爲了我送給他的我花園裏的菓子向我道謝。莫洛左夫的詩。還有很多很多別的。懇切的和談諧的——溫和的和親切的！

我讀着，我心裏充滿了快樂和感激，我感激這班跟我一塊兒受苦的同志對我表示的愛。我覺得奇怪，像我們所處的這種生活環境很可能使人變壞，使人心腸變硬，然而我那班同志在這樣的環境裏面，居然能夠保持着那麼多的永不竭盡的愛和溫情，並且拿來跟他們那永不消滅的熱情和精力一塊兒傾注在我的身上。我拿他們跟我自己相比較：這比較對我多麼不利！我常常覺得好像我什麼都不再愛了似的。我痛苦地感到，我缺乏着那種德行，那種德行在任何情形裏面都是一個人四周的熱情的泉源。

我把我的全部的寶物——地檢視過了。牠們已經被我撕毀了；我擦燃了火柴，剩下來的一只是一小堆紙灰。

我失去了一些東西，我埋葬了一些東西。這是一些男性的忠誠的靈魂，他們慷慨地把它交付給我，我現在把它焚燬了。

再見吧，親愛的友人！你們，再見吧，你們給我的是那麼多；你們，再見吧，我所給你們的很有限，而你們回報我的却是你們的無限的愛，你們再見吧。

「帕龍德拉」

在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受審訊被定罪以後已經過了二十年了，我應當就在這一天離開席呂塞爾堡。然而在二十七日的晚上本地官吏來通知我，我的出獄期不是在第二天，却已改爲二十九日。而我在二十七日準備着第二天動身，就已經向留在要塞中的九個同志辭過行了。一切想說的話我們全對彼此說了，一切的祝願也都說過了，一些小小的請求和委託也都記在心上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來了一個延期：整整二十四小時，我們除了忍耐地等待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來填滿這一段時間。

我們在二十七日告別的時候，各人極力鎮定、自持，雖然明知分別以後永無重見之日，可是大家都不願意在離別時現出十分傷心的樣子。有的人眼裏含淚珠，有的人聲音嘶啞。「不，不，你們不要這樣！」我說，連忙掉開身子，爲的不使自己哭出來。

在我臨行前幾天一個同志對我說：「你離開呂塞爾堡時，一定會哭。」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熱烈地抗議道。「哭！爲什麼離開這個地方還要哭？」

啊！不是在動身的時候，而是後來，在小火輪上，當呂塞爾堡的圓塔和白牆看不見了的時候，我真的絕望地哭泣了。我向着同志們說那句話時，我祇想到那個地方，我祇想到那個把我活埋了許多年的石棺，却不會想到那些仍舊被埋在那裏面的活人。我不會想到那些我不願意離開而不得不離開的同志們。我的思想一轉到他們身上，我對於那個摧毀精神的堡壘的反抗感情立刻就消滅了，憂愁與絕望代替了它；我替那些仍舊留在要塞中永無希望出來的人憂愁；我因爲我自己遭受的無限的損失而感到絕望。不錯，我就要失去二十年來在非常的環境中跟我親密地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受苦的人們。這二十年來祇有這些人是跟我一塊兒處在平等與團結、愛與友情的地位中的。我只有從他們那兒得着了幫助、安慰和快樂。全世界把我關在門外，所有人間的聯繫都斷了，可是他們，只有他們，代替了家庭、社會、黨、祖國以及全人類。非常的環境用非常的連鎖鎖住了我們。然而現在，在目前這種對我們的黨特別艱苦的環境裏，這些連鎖都被弄斷了。我的眼淚，我的絕望，我的哭都是有原因的。

「那些別的人」仍舊留在這兒，在絕望中消磨光陰，也許會死在這兒，然而我——我失去了精神方面的一切，正在走進一條生活的路，這條路可以稱爲「解放」或「復活」，可是在它那來遲了的偏頗的快樂中有着諷刺、譏笑的意味。

九月二十九日四點鐘，看守長打開了我的監房的門。我最後一次跨出了監房的門檻。我帶着嚴肅的神情，非常緊張，沒有快樂，也沒有悲哀，我沿着走廊走去，它那繩網和露台的佈置，我當初剛進這要塞裏時還不能夠瞭解。我走過了那道架在繩網上面將這建築物分爲兩層的橋——嘆息橋。這橋通到二十六號監房，我一進要塞就給人關在那裏面，從那時候起我在這橋上不知走過了千百次。後來我每天被帶出去散步時，也要經過它，現在我是最後一次走過這橋了。小小的一方天井和那座看守們駐紮的建築物便是我們這個死國的境界線，許多年來都是一樣的情形，只有死去的人給人抬着跨過了這境界線出去。

我邁着平常那樣的堅定的脚步走過那些熟習的地方，就跟我以前千百次走過那裏一樣。我走着，好像我是去作向例的散步似的，或者是到工場裏去作工，並不像去迎接我生活中的一個大變動——回到「世界」中去的大事……可是我一跨過境界線，進入一個新的陌生地方時，我感到暈眩了；我的身子失去了它的平衡，地板像棉花似的在我的脚

下退去，我用手去扶牆壁，牆壁也像舞台佈景似地一下就逃開了。「我不能再往前走！」我抽泣地說，「我不能再往前走——牆壁在動！」

護送我的憲兵們抓住了我，不讓我跌下去。「這是新鮮空氣的作用，」看守長安慰地對我解釋道。他這句關於新鮮空氣的話是在一間永遠不通風的屋子裏說的，這屋子裏駐紮着十二名衛兵，不分晝夜，不分年月，永遠不會空着，而現在他們就列成一排站在這兒，可是他這話却使我馬上清醒過來。

再過一會兒我們就走到外面了。我轉過身去，朝着監獄的方向最後一次鞠一個躬。我的同志們靠着窗戶的鐵格子，這些鐵格子窗支持着他們的身子，他們也揮着手帕，一邊說：「再見再見！」那隻要載我去聖彼得堡的小火輪還不會到，所以我不得不不在一間不通氣的辦公室裏等待着，司令官和他的下屬們匆忙地而且毫無必要地跑來跑去。

「您要喝點茶嗎，薇娜·尼可拉也芙娜？」司令官問道。

薇娜·尼可拉也芙娜，不錯！這二十年來，對於這班人我是沒有名字的。二十年來對於他們我只是一个號碼。第十一號，他們總是這樣叫我；十分鐘以前我還是第十一號……現在突然間我就變成薇娜·尼可拉也芙娜了。不，我並不要他們的恩惠。

一個鐘點過去了，或許時間還長一點。後來督察長出現了，這是一個叫人討厭的又卑鄙又頑固的人，我們大家都不喜歡他。「請來吧。」他說，於是我們一小羣人便向着要塞的大門走去。只要再走幾步，我那些同志們還留在裏面的這個監獄就會在我的眼前消失了。然而我並不會回過頭去——我害怕回過頭去；我要控制我的感情，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也成。

走出大門朝右便是拉多加湖。●落日正照在湖面上，湖水映着霞暉發出眩目的光，彷彿一隻淺碟子上面塗着的水銀似的。在島的盡頭處那個小岬的頭上，涅瓦河的水燦爛地發亮，有無數的鉛色漣漪在那兒打漩。一隻小小的白色輪船靜靜地停在中流，對岸淡紅色的薄霧中隱約露出一個村落的模糊的輪廓。一切都是安靜而美麗的。我知道這種美，可是我却感覺不到，它並沒有使我快樂，我並不會讓它迷住，我奇怪我自己怎麼這樣冷靜，而且只是眺望着。太陽在一個自由的、廣大無垠的地平線上徘徊着。然而這個美景並沒有給我什麼深的印象。暗雲在向西方移動。我想：這雲像哪一種顏色呢？我斷定：天然色的墨水。我仰望著浮雲，忽然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這景致跟我在某一份刊物上看見的一幅插圖相像，

● 一半在俄國西北部，一半在芬蘭東南部，歐洲最大的湖，約七千方哩。

但這是哪一幅插圖呢？

督察長和幾個憲兵一塊兒押送我上了一隻小艇，開到小火輪那兒去。輪船上沒有一個人。「帕龍德拉！」我唸着這個名字並且牢記在心裏。「帕龍德拉」在水手們的隱語中是「當心」的意思。這是幾天以後我會見我弟弟尼可拉的時候，他告訴我的。這個字後來常常折磨我的心。我在經歷了那一切的痛苦以後，現在站在一個新的生活的門檻上，迎接我的並不是一句鼓舞的祝語，反而命運威嚇地站在我面前，惡狠狠地吐出一句「當心」來！難道它是在警告我：「不要存着任何的幻想」嗎？難道它是在說：「你還沒有受夠苦！以後還有多的」嗎？這個不祥的警告折磨着我，使我想在獄牆以外還有麻煩和苦惱在等候我。

小火輪離聖彼得堡不遠了，我問督察長，他帶我到哪兒去。

他答道：「昨天我把您的兩個同志送到了拘留所去，可是您却是到彼得保羅要塞去的。」

我的心緊了。還是到一個要塞裏去！

涅瓦河畔的華麗碼頭上燈火輝煌，晚上十點鐘光景，帕龍德拉在彼得保羅要塞附近

靠了岸。

「上岸吧，」憲兵指着平常安放跳板的地方對我說。可是我什麼都看不見，我站住動也不動一下。

「您爲什麼不上來呢？」督察長催促道。

然而我的眼睛看不見東西。「這兒什麼都沒有，」我答道。

「您是什麼意思，您說什麼都沒有！跳板明明在這兒，現在上來吧。」

「不，不，那是水。我怎麼能夠走那兒呢？」我堅持地說。

兩個憲兵攙着我的膀子，引我上岸去，一輛馬車等在那兒。彼得保羅要塞的除伯次奎側廳的鐵格子門對我是熟習的。二十年前，我「拋開一切的希望」走出了這兒，那個「保證」看守的憐憫的眼光同情地送我出去，我的身上穿着灰布囚衣，背上纏着紙牌方塊形△的標記。階段和走廊也是我非常熟習的。每隔一個星期我要走過那裏一次，去接見我的母親和妹妹。這就是四十三號監房，我在候審期中在這兒關了差不多整整兩年。可是現在我們走過了這個監房，並沒有停留下來。這次他們給我換了一個地方，是在另一道走廊上。監房大，可是天花板低。房裏燃的是電燈，不像從前那樣點石油燈了。

新的環境常常是不舒適的。我剛剛在吊床上坐下，正要集中我的思想，忽然聽見門鎖響，一個上了年紀的高個子軍官邁着快步走了進來。他的臉瘦削而無血色。他有一對叫人討厭的突出的灰色眼睛。

「您會高興在這兒住下的，」他開始稱讚我這個新居，並且做出得意的樣子誇耀監房。「現在什麼都兩樣了。電燈和衛生設備，」他說時，指着燈和沒有蓋子的抽水馬桶，我後來才知道蓋子是他們取掉了的，他們害怕囚人們在表示抗議的時候打着蓋子響。

他這是什麼意思呢？我不安地問自己道。我驚慌起來了。他分明是準備着我在這兒住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的。難道他們不送我到西伯利亞去，却把我留在這兒，他們不過是把我從一個要塞送到另一個要塞就算了事嗎？這真是可能的嗎？然而他却拿了種種關於席呂塞爾堡的問題盤問起我來。我在那邊的生活是怎樣的？我有書唸嗎？我可以接見家屬嗎？最糟的是，他沒有得到我的許可，就不客氣地在吊床上坐下來，翹起二郎腿，坐在我身旁。受不了這個。我在監獄裏變得非常容易害臊，不慣於跟人接觸，而且從來沒有跟一個男子單獨在監房裏待過。我害怕這個翹着二郎腿坐在我吊床上的沒有禮貌的陌生人。

『出去！出去！』我提高聲音帶怒地說，同時站了起來。

督察長顯然沒有想到會受着這樣的接待；他從吊床上跳起來，立刻就見不到了。現在我終於是一個人屋子裏了，然而我還是不能夠靜下心來。我這一天的經歷已經是夠多了，並且還有更多的焦慮在等着我！他們會把我送走嗎？或者就讓我待在這兒？我怎麼跟我的家屬見面呢？母親已經死了——她不能再等待了。這樣倒好一點。不然我們母女的相見會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啊？她躺在死床上；我讓憲兵們押着走到她的床前……我們能夠對彼此說些什麼呢？一個患病垂危的母親和一個關了二十年才從牢裏釋放出來的女兒！沒有人受得了這樣一次的會面的。一定還有憲兵們站在房門口……我還是不能夠靜下心來。我有什麼辦法從這些思想的圍攻中脫逃呢？只要我有一本書也好，那麼我就可以用別人的思想來壓住我自己的思想了！

我敲着門：「看守，請給我找點什麼東西來讀。我換了個新地方就睡不着。」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憲兵答道，「圖書館關了，不過我會去找找看。」

一刻鐘以後一個細長身材的下士出現了，他有一張漂亮的、有相當教養的臉孔。他遞了一本書給我，一張單頁從書中落在了在地上。我把它拾起來。啊，奇怪！我面前是一張印得漂亮的納特孫●的像。我翻開書頁。我不滿意納特孫的詩。我十分覺得他是一個講話的人，不

是實行的人，這使我不喜歡。可是我的心境却改變了，納特孫的軟弱的意志反而喚起了我的力量。

我不再害怕了，恐懼已經離開我了。今天不會再有什麼事了，明天呢——我用不着去想明天的事。

我把納特孫的像放在我面前桌子上，就靠着水瓶；有一個朋友跟我在一塊兒，我並不是孤獨的。

彼得保羅要塞的鐘響了起來，它們唱着二十年前唱過的同樣的調子……我睡着了。涅瓦河的黑浪在叫吼；一隻白色小火輪向着未知的地方急急駛去。船的名字是「帕龍德拉」。然而我那時並不知道「帕龍德拉」的意思就是「當心」。

第一次重逢

三天過去了，他們還不許我接見任何人。

「在所有別的囚人接見親友的那一天，您會看見您的家屬的，」督察長說。

這是殘酷的，但也是聰明的辦法。不論是多麼急切的盼望，它總不能夠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那種使人倦怠的緊張終於寬鬆了；到了第四天我的心差不多完全平靜了，我也不再等待了。我專心地讀着喀萊爾①的英雄與英雄崇拜。就在這一天下午一點鐘光景督察長走進我的監房裏來。

「快準備好，」他說，「您的弟弟和妹妹們都已經到了，您馬上就要給帶出去接見他們。」他看見我的臉色發白，臉上露出驚恐的表情，便添加了一句：「我告訴他們要做出好

①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英國的散文家和歷史家。

像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的樣子。」

「好像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的樣子！」這是殘酷的，但也是聰明的辦法。這好像是一份節目單，不僅是爲他們，爲我弟弟和妹妹們安排的，並且也是爲我安排的，我應當照着節目單去做，可是我一點兒預備也沒有。這份節目單說：裝假。大家一塊兒演喜劇。「好像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的樣子！」不要撲倒在地，不要拿頭去撞地板，不要渾身打顫地涕涕哭哭。戴上一個面具！弄熄你靈魂裏所有的火焰！

他們領着我經過一些走廊、樓梯，和陌生的過道，我的脚步又有些不穩了，我想找一個東西來支持我，便伸了手去扶住牆壁。一道門開了。

我的弟弟和妹妹們坐在那兒。我的弟弟是一個強壯的中年人，一個漂亮的工程師，他已經給他自己造了一條寬大的生活的路，我離開他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沒有鬍子、臉頰紅紅的青年。我的妹妹們現在都是健康、端莊的太太，家庭中的母親了，她們都已經有了二三十年的生活經驗了，我當初跟她們分別的時候她們都還是柔嫩的少女。他們全坐在那兒，我站在他們面前，好像狄更斯●的小說中的那個女人一樣，那個穿着破爛的結婚服的瘋狂的老婦人在許多年前她的婚期中知道自己受了騙，她的新郎不會到場了，她便把鐘

停止在那個時候，就是那一天的正午十二點。我的生命已經在二十年前停止了，我也是靠着那個瘋狂的幻覺生活下去的，我始終以為生命的鐘仍舊定在正午十二點上。

我的弟弟扶我坐在他對面一把椅子上。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中。他就這樣一直握着它們。我害怕動，所以我只顧朝他看：他改變得不多，我盡力去找尋從前那個臉頰紅紅、沒有鬚鬚的彼特亞。●我得在這改變了的陌生的面貌上逐漸找出一點熟悉的東西。遙遠的「過去」的纖弱的面容漸漸地透過了「現在」的厚的面幕顯露出來。我開始認出並且找到我所尋求的東西。這好像是我在陌生的遠地，在混亂不明的暗霧中居然找到一個不結實的路標，我正在努力把記憶的線團繫在它上面，為着想拉長那線團，一直長過二十年的距離，這樣纔把「過去」跟「現在」這不幸的時刻連接起來……

我們談了些什麼呢？我記不起來了。沒有內容的空虛的話接連地從我們的嘴唇上落下來，就像一些僞幣接連地落在大理石的桌面上發出那種響聲似的。腳燈打起來了，我們

●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國小說家，這裏提到的那本小說是他的晚年的作品。大的期

● (Great Expectation)

● 彼得的愛麗。

在做戲，「好像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的樣子。」

「接見的時間完了！」督察長說，他站了起來。

那天晚上，我睡不好覺，時常醒來，我覺得快要發狂了。我的腦子裏裝滿了激烈的、不能控制的話語，就像是一大股激流，都是沒有意義而且並不連貫的話。物件的名字——名字和名字。它們大量地傾倒出來，就像一堆白色碎紙從一個正在給人震搖着的口袋裏滾出來一樣；它們落下去，就跟一個人猛然挨了一下拳頭以後看見的火星一樣地快。同時我的知覺又像一個外界的觀察者似的帶着驚恐和焦慮地問着：發生着什麼事？難道這情形要繼續下去，並且我會發狂嗎？……

後記

一九二七年我曾發願要把俄國革命者薇娜·妃格念爾 (Vera Figner) 的『回憶錄』全部譯成中文。那時我曾在一本書裏寫下這樣的話：『實在這部書像火一樣點燃了我的獻身的熱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讀一遍，總感到勇氣百倍，同時又感到十分的慚愧。我覺得在這樣女人的面前，我實在是太渺小了。』

現在，雖然是在寫了那樣的話的二十年以後，但我終於把『獄中二十年』的譯稿交出去了。這是『回憶錄』的第二卷，它還有一個名字：『生命的鐘停了的時候。』第一卷還在翻譯中。第一卷，依據德譯本叫做『不自由毋寧死』；依據英譯本叫做『一件完成了的工作。』我決定給它換上一個題名：『俄羅斯的暗夜』，那是德譯本的『回憶錄』的總名，原文是『籠罩着俄羅斯的夜』。

德譯本「回憶錄」的第二卷中共有三十章。英譯本比較德譯本少了七章，但另外加了一章，所以英譯本的第二卷只有二十四章。不過我在英譯本中也發見了不少被德譯者刪去的句子。

第二卷是作者的「獄中記」。作者在一八八三年初被捕，到一九〇四年十月出獄，她一共在監獄裏住了二十二年。然而她的「獄中記」却只是她在席呂塞爾堡中的生活紀錄。她是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被押送到席呂塞爾堡要塞裏去的，到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離開要塞（從那兒她又被送到彼得保羅要塞中去，關了些時日）剛巧是二十年。

作者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革命團體民意社的老將。她參加了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刺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事件，因而被捕判刑。關於這一切詳情以及作者的家庭環境和她三十歲以前的經歷，在「回憶錄」的第一卷中均有詳細的敘述。

關於作者妃格念爾，她的友人N·米海羅夫斯基（社會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曾經說過如下的讚美的話：

「她所放射出來而且如此吸引着她周圍的人們的魔力與動人處是由什麼東西構

成的，這不容易說出來。她自然又聰明，又美麗。但是她豈只聰明而已。至於美麗，那是革命團體中所不大注意的。可是此外她又沒有別的特殊才能。她之所以動人在於她整個身心是十分諧和，十分一致，她的一言一動都表現着她的整個自我；疑惑與猶豫是她所不知道的。通常這類的人總是非常刻苦，十分嚴肅的，然而她完全不是這樣。剛相反，當黨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的時候，她便很活潑，很愛戲謔，就像一個小女孩似的。」

她生於一八五二年六月，在一九四二年病故，逝世前曾在莫斯科克魯泡特金博物館裏擔任職務。

巴 金 一九四八年九月